

《心理科学进展》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敬畏的亲社会效应：小我与真我的作用

作者：赵越, 胡小勇, 马佳馨

第一轮

编委初审意见：

请作者就一个问题增加讨论，这个问题是：真我与小我是何关系？作者应在理论高度讨论真我和小我的关系。换句话说，作者现在的表述非常模糊，且没有论据，只有一句话“其中小我属于第一层次的社会角色的自我，而真我属于第二层次的能动自我。”这是断言，需要增加论证。

答：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对于真我和小我的关系，本文认为“其中小我属于第一层次的社会角色的自我，而真我属于第二层次的能动自我。”支撑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如下：

首先，小我研究和真我研究都强调敬畏的亲社会效应的产生是由于它与自我的互动。在其基础上，有研究者认为要真正理解敬畏对自我的影响，需要对自我有一个更细致的定义(Stellar, 2021)。将现有的敬畏研究与自我理论结合在一起将有助于从理论出发，阐明两种自我机制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可以基于 McAdams(2013, 2020)所倡导的心理自我模型来讨论小我与真我的关系。基于人格的三方框架(McAdams & Pals, 2006)，该理论认为，人类的自我倾向于从三个不同的心理角度理解自己：作为社会角色、能动者和自传作者(McAdams, 2013, 2020)。由该模型可知，自我是一个丰富的、多层次的、特异性的结构，那么敬畏很可能对自我的不同层次都产生了作用，这些作用共同促进了亲社会行为(Perlin & Li, 2020)。具体而言：小我属于敬畏对第一层次的社会角色自我的作用结果，而真我属于敬畏对第二层次的能动自我的作用结果。敬畏通过同时影响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自我，最终促进了亲社会行为的产生。

(1)根据 McAdams(2013)的心理自我模型，第一层次的自我是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开始的，即在人类生活的社会舞台中扮演角色，不断地在社会舞台上争取社会认同(与人相处)和社会地位(出人头地)。这是因为人类具有认知天赋和精致的社会性，他们生活在复杂的、具有等级秩序的社会群体中并通过进化获得了社会性(Wilson, 2014)。而对于社会性动物来说，

自我最初是通过在群体中的社会行为来定义的(McAdams, 2013, 2020)。我们提出：小我是敬畏对于第一层次的自我——社会角色自我的作用结果，敬畏促进了人类作为社会角色的自我尺寸减小，进而增加了亲社会性。支撑这一论点的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具体如下：

小我假说以情绪的社会功能框架(social functional approach to emotions)为理论基础。该框架关注情绪具有的社会功能，情绪能够协调个体与盟友、伴侣、亲属和群体成员进行社会互动的方式，具有促进个体适应社会环境的重要功能(Bai et al., 2017; Keltner & Lerner, 2010)。在该框架下，研究者提出了“情绪将自我置于社会道德秩序中”的观点(Bai et al., 2017; Lutz & White, 1986)。这种观点认为情绪能改变个体的自我表征，使其与个体的社会互动相协调；由此，实现促进社会关系的重要功能(Sedikides & Skowronski, 2000)。而敬畏目前已被证明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情绪，它有助于解决一个关键的社会问题，即群体协调(Stellar et al., 2017)；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敬畏被认为具有帮助建立社会集体中的等级秩序，促进个体融入集体并成为社会集体中的有效成员的功能(Keltner & Haidt, 2003)。因此，研究者认为敬畏会以有助于个体在社会集体中存在的方式影响自我表征(Bai et al., 2017)。而融入社会集体需要个人减小在追求自我利益和关注他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这需要个体减弱自己的自我意识(Keltner, Kogan, Piff, & Saturn, 2014; Wilson & Sober, 1998)。在此基础上，小我假说认为自我意识的减弱(即小我)是敬畏促进亲社会行为的核心中介。

那么，小我假说根植于这样的理论假设，即情绪能够将自我置于社会道德秩序中，其对自己表征的改变，将有助于协调自我的社会互动，促进个体的社会关系(Bai et al., 2017; Keltner & Lerner, 2010; Lutz & White, 1986; Sedikides & Skowronski, 2000)。基于该框架，小我是敬畏为了协调生活在社会秩序中的自我(即社会角色自我)所面临的社会互动而促使自我表征产生的一种适应性变化；此外，大量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小我是一种具有社会适应性的自我表征(Keltner et al., 2014)。小我感被发现有助于导致谦卑感的增加(Stellar et al., 2018)、权利感的减少(Piff, Dietze, Feinberg, Stancato, & Keltner, 2015)和面向他人的注意的增加(Bai et al., 2017)，以及更重要的是各种亲社会性(Luo, Zou, Yang, & Yuan, 2022; Piff et al., 2015)，通过这些方式小我促进了健康的社会关系(Stellar et al., 2017)。事实上，小我假说和社会角色自我都被同一论点所指导，即人类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物种(Wilson, 2014)。综上，将支撑小我假说的理论基础、实证证据与 McAdams(2013)所提倡的社会角色自我相结合，我们认为小我可以被解释为敬畏对于社会角色自我的作用结果。敬畏促进了人类作为社会角色的自我尺寸减小，这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在社会集体中存在的自我表征模式(Bai et al., 2017; Keltner et al., 2014)；由此，人们的社会角色自我得以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舞台中更好地与

人相处，做出亲社会行为。

(2)根据 McAdams(2013)的心理自我模型，在社会角色自我之上的第二层次自我被定义为能动的自我，它具有前瞻性和未来导向性，通由许多的个人关注点(包括长期目标、价值观、个人奋斗和具体个人事件等)组成，并会对个体所追求的目标产生强烈的影响。能动的自我会驱使我们做出选择，并根据这些选择以一种自我决定和目标导向的方式在生活中前进(Deci & Ryan, 1991)。我们提出：真我是敬畏对于第二层次的自我——能动自我的作用结果，敬畏促进了人们的能动自我所持有的动机更趋近于真实，进而增加了亲社会性。支撑这一论点的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具体如下：

真我自我以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自我决定理论为理论基础。Maslow (1971)强调人的行为源于内在需要。他提倡人要做真实的自己，以一种真实、自然的表达方式来展现自己的个性、情感和欲望。自我决定理论以动机为中心，该理论认为由内在动机驱动的行为才更符合真实的自我(Ryan & Ryan, 2019)。其他研究者认为，尽管人们可能重视许多东西，但价值观和目标的相对等级顺序对于他们的行为决定至关重要。当人们为那些在目标层级中更高层次的、内部的目标，而不是低层次的目标行动时，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最符合“真实的自我”(Conner et al., 2016; 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 Ryan & Ryan, 2019)。

那么，根据真实自我的理论基础，真实自我被认为是基于个体的高层的、内在的动机产生的一种稳定的体验；而这些动机位于 McAdams 所提倡的第二层次的能动自我(McAdams, 2013, 2020)。因此，我们认为真我可以被解释为敬畏对于能动自我的作用结果。实证证据也支持了敬畏对高层次的、内部的动机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与对照条件相比，通过回忆相关经历激发的敬畏感可以促使那些宗教信仰和精神超越性较高的被试表示自己更愿意去精神性目的地(即西藏)旅行，而不是享乐性目的地(即海地)(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此外，敬畏似乎可以减弱人们对低层次动机的关注，这反过来促进了对高层次动机(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信仰等)的追求(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 Shiota, Keltner, & Mossman, 2007)。在自然环境中体验了敬畏景色的被试报告说，他们对日常烦恼和日常问题(例如，体重、身体外表、放错位置或丢失东西等问题)的关注水平降低了(Bai et al., 2021)。总之，敬畏促进了对个体能动自我中的高层次动机的关注，并减弱了对低层次动机的关注；根据真实自我的相关理论，这种动机的转变过程激发了人们的真实自我(Conner et al., 2016; 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 Ryan & Ryan, 2019)。因此，真我其实可以被解释为敬畏对于能动自我的作用结果，敬畏促进了人们作为能动自我所关注的动机更趋近于真实，

进而增加了亲社会性。

(3)心理自我模型进一步认为不同层次的自我总是同时出现(McAdams, 2013, 2020)。具体而言, McAdams(2013)认为不同层次的自我不能随着环境的提示和条件的变化轻易地被激活和停用。例如, 当我下午和朋友喝咖啡时, 我的社会角色自我被激活, 而当我坐下来制定明天的计划时, 我的动机者自我又取代了社会角色自我。与之相反, 该理论认为不同层次的自我并不是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点上所扮演的不同的自我, 一个在心理上完全成熟的成年人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都是同时作为不同层次的自我而存在的。基于上述理论, 个体的社会角色自我和能动自我总是作为不同层次的自我同时存在, 因此我们预期敬畏会通过平行的路径同时引发了社会角色自我(使其更渺小)与能动自我(使其更真实)的变化进而导致了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初步的实证证据也表明, 敬畏通过平行的路径促进了小我与真我, 进而导致了亲社会行为的产生(Jiang & Sedikides, 2022)。

已在正文对应部分补充了相关理论与实证证据以论述小我与真我的关系, 详细内容见下表, 相应位置在文中用“红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由情绪的社会功能框架可知, 情绪具有促进个体融入集体并适应社会的重要功能(Bai et al., 2017)。敬畏正是一种有助于建立健康社会关系的情绪, 它具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能够帮助个体融入集体并成为社会集体中的有效成员(Keltner & Haidt, 2003)。而融入集体需要个体在追求自我利益和关心他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即减少对自我利益的关注并优先考虑他人的利益, 这都是由降低自我重要性的过程所促成的(Keltner, Kogan, Piff, & Saturn, 2014; Wilson & Sober, 1998)。 | 小我假说以情绪的社会功能框架(social functional approach to emotions)为理论基础。该框架关注情绪具有的社会功能, 情绪能够协调个体与盟友、伴侣、亲属和群体成员进行社会互动的方式, 具有促进个体适应社会环境的重要功能(Bai et al., 2017)。在该框架下, 研究者提出了“情绪将自我置于社会道德秩序中”的观点(Bai et al., 2017; Lutz & White, 1986)。这种观点认为情绪能改变个体的自我表征, 使其与个体的社会互动相协调; 由此, 实现促进社会关系的重要功能(Sedikides & Skowronski, 2000)。而敬畏目前已被证明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情绪, 它有助于解决一个关键的社会问题, 即群体协调(Stellar et al., 2017);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敬畏被认为具有帮助建立社会集体中的等级秩序, 促进个体融入集体并成为社会集体中的有效成员的功能(Keltner & Haidt, 2003)。因此, 研究者认为敬畏会以有助于个体在社会集体中存在的方式影响自我表征(Bai et al., 2017)。而融入社 |

| | |
|--|---|
| | <p>会集体需要个人减小在追求自我利益和关注他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这需要个体减弱自己的自我意识(Keltner, Kogan, Piff, & Saturn, 2014; Wilson & Sober, 1998)。【3.1 第一自然段】</p> |
| <p>对于敬畏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小我研究和真我研究分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从整体上看，两种机制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依据 McAdams (2013, 2020)的自我模型可知，自我是一个丰富的、多层次的、特异性的结构；其中小我属于第一层次的社会角色的自我，而真我属于第二层次的能动自我。敬畏通过同时影响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自我，最终促进了亲社会行为的产生。</p> | <p>对于敬畏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小我研究和真我研究分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从整体上看，两种机制存在着怎样的关系？研究者认为要真正理解敬畏对自我的影响，需要对自我有一个更细致的定义(Stellar, 2021)。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基于 McAdams(2013, 2019)所倡导的心理自我模型来讨论小我与真我的关系。由该模型可知，自我是一个丰富的、多层次的、特异性的结构，那么敬畏很可能对自我的不同层次都产生了作用，这些作用共同促进了亲社会行为(Perlin & Li, 2020)。具体而言：小我属于敬畏对第一层次的社会角色自我的作用结果，而真我属于敬畏对第二层次的能动自我的作用结果。敬畏通过同时影响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自我，最终促进了亲社会行为的产生。【3.3 第一自然段】</p> |
| <p>根据 McAdams(2013)的自我模型，第一层次的自我是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开始的，即在社会中扮演角色和履行职责。这是因为人类是一种精致的社会性动物，对于社会性动物来说，自我最初是通过在群体中的社会行为来定义的 (McAdams, 2013)。</p> | <p>根据 McAdams(2013)的心理自我模型，第一层次的自我是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开始的，即在人类生活的社会舞台中扮演角色，不断地在社会舞台上争取社会认同(与人相处)和社会地位(出人头地)。这是因为人类具有认知天赋和精致的社会性，他们生活在复杂的、具有等级秩序的社会群体中并通过进化获得了社会性(Wilson, 2014)。而对于社会性动物来说，自我最初是通过在群体中的社会行为来定义的(McAdams, 2013, 2020)。【3.3 第二自然段】</p> |
| <p>根据 McAdams(2013)的自我模型，第二层次的自我被定义为能动的自我，即由许多的个人关注点(包括长期目标、价值观和个人奋斗等)组成，并对个体所追求的目标产生强烈影响的自我(McAdams, 2020)。</p> | <p>在社会角色自我之上的第二层次自我被定义为能动的自我，它具有前瞻性和未来导向性，由许多的个人关注点(包括长期目标、价值观、个人奋斗和具体个人事件等)组成，并会对个体所追求的目标产生强烈的影响(McAdams, 2013, 2020)。能动的自我会驱使我们做出选择，并根据这些选择以一种自我决定和目标导向的方式在生活中前进(Deci & Ryan, 1991)。【3.3 第二自然段】</p> |
| <p>从第一层次自我的角度看，敬畏对小我的促进作用可以被理解为敬畏对社会角色自我的影响。由</p> | <p>从第一层次自我的角度看，小我是敬畏对于第一层次的自我——社会角色自我的作用结果，敬畏</p> |

| | |
|---|---|
| <p>于情绪具有促进个体融入集体并适应社会的重要功能，那么对于作为社会角色的自我而言，可以期望敬畏会以促进集体参与和社会合作的方式影响这一层次的自我表征和社会认知过程。具体表现为，敬畏通过使自我变小，促使注意力从自我转移到他人身上，最终促进集体参与和亲社会性(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 Stellar et al., 2017)。集体参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激励着许多社会进程的发展(Brown, Brown, & Penner, 2011; Keltner et al., 2014; Willer, 2009)。因此，在社会角色自我层，通过使自我减小，敬畏促使社会自我更多地融入社区和帮助他人，从而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p> | <p>促进了人类作为社会角色的自我尺寸减小，进而增加了亲社会性。这是因为，小我假说根植于这样的理论假设，即“情绪能够将自我置于社会道德秩序中”其对自己表征的改变，将有助于协调自我的社会互动，促进个体的社会关系(Bai et al., 2017; Lutz & White, 1986)。基于该框架，小我是敬畏为了协调生活在社会秩序中的自我(即社会角色自我)所面临的社会互动而促使自我表征产生的一种适应性变化；此外，大量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小我是一种具有社会适应性的自我表征(Keltner et al., 2014)。小我感被发现有助于导致谦卑感的增加(Stellar et al., 2018)、权利感的减少(Piff et al., 2015)和面向他人的注意的增加(Bai et al., 2017)，以及更重要的是各种亲社会性(Luo et al., 2022; Piff et al., 2015)，通过这些方式小我促进了健康的社会关系(Stellar et al., 2017)。事实上，小我假说和社会角色自我都被同一论点所指导，即人类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物种(Wilson, 2014)。综上，将支撑小我假说的理论基础、实证证据与 McAdams(2013)所提倡的社会角色自我相结合，我们认为小我可以被解释为敬畏对于社会角色自我的作用结果。敬畏促进了人类作为社会角色的自我尺寸减小，这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在社会集体中存在的自我表征模式(Bai et al., 2017; Keltner et al., 2014)；由此，人们的社会角色自我得以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舞台中更好地与人相处，做出亲社会行为。【3.3 第三自然段】</p> |
| <p>从第二层次自我的角度看，敬畏对真我的促进作用可以被理解为敬畏对能动自我的影响。对于能动的自我而言，可以期望敬畏使目标层级中等级较高的、内部的动机更加显著，从而促进真实性的产生。实证证据支持了敬畏对高层次的、内部的动机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与对照条件相比，通过回忆相关经历激发的敬畏感可以促使那些宗教信仰和精神超越性较高的被试表示自己更愿意去精神性目的地(即西藏)旅行，而不是享乐性目的地(即海地)(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此外，敬畏似乎可以减弱人们对低层次动机的关注，这反过来促进了对高层次动机(价值观、意识</p> | <p>从第二层次自我的角度看，真我是敬畏对于第二层次的自我——能动自我的作用结果，敬畏促进了人们的能动自我所持有的动机更趋近于真实，进而增加了亲社会性。这是因为，真我自我来源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自我决定理论。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真实自我被定义为一种基于个体高层次的、内在的动机产生的一种稳定的体验(Maslow, 1971; Ryan & Ryan, 2019)。尽管人们可能重视许多东西，但价值观和目标的相对等级顺序对于他们的行为决定至关重要。当人们为那些在目标层级中更高层次的、内部的目标，而不是低层次的目标行动时，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最符合“真实</p> |

| | |
|--|---|
| <p>形态和信仰等)的追求(Bai et al., 2021; Piff et al., 2015; Shiota et al., 2007)。在自然环境中体验了敬畏景色的被试报告说,他们对日常烦恼和日常问题(例如,体重、身体外表、放错位置或丢失东西等问题)的关注水平降低了(Bai et al., 2021)。总之,通过减弱对低层次动机的关注,敬畏可能会反过来促进对高层次动机的关注,这将有助于激发人们的真实自我。关注真实性的学者认为,尽管人们可能重视许多东西,但价值观和目标的相对等级顺序对于他们的行为决定至关重要。当人们为那些在目标层级中更高层次的、内部的目标,而不是低层次的目标行动时,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最符合“真实的自我”(Conner et al., 2016; 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 Ryan & Ryan, 2019)。综上,敬畏对于能动自我所持有的动机的作用,似乎能够激励真实自我的产生,并最终导致亲社会行为。</p> | <p>的自我”(Conner et al., 2016; 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 Ryan & Ryan, 2019)。而这些目标与动机正位于 McAdams 所提倡的第二层次的能动自我层(McAdams, 2013, 2020)。因此,我们认为真我可以被解释为敬畏对于能动自我的作用结果。实证证据也支持了敬畏对高层次的、内部的动机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与对照条件相比,通过回忆相关经历激发的敬畏感可以促使那些宗教信仰和精神超越性较高的被试表示自己更愿意去精神性目的地(即西藏)旅行,而不是享乐性目的地(即海地)(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此外,敬畏似乎可以减弱人们对低层次动机的关注,这反过来促进了对高层次动机(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信仰等)的追求(Bai et al., 2021; Piff et al., 2015; Shiota et al., 2007)。在自然环境中体验了敬畏景色的被试报告说,他们对日常烦恼和日常问题(例如,体重、身体外表、放错位置或丢失东西等问题)的关注水平降低了(Bai et al., 2021)。总之,敬畏促进了对个体能动自我中的高层次动机的关注,并减弱了对低层次动机的关注;根据真实自我的相关理论,这种动机的转变过程激发了人们的真实自我(Conner et al., 2016; 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 Ryan & Ryan, 2019)。因此,真我其实可以被解释为敬畏对于能动自我的作用结果,敬畏促进了人们作为能动自我所关注的动机更趋近于真实,进而增加了亲社会性。【3.3 第四自然段】</p> |
| <p>初步的实证证据也表明,敬畏通过平行的路径引发了小我与真我的改变,进而导致了亲社会行为的产生。</p> | <p>心理自我模型进一步认为不同层次的自我总是同时出现,一个在心理上完全成熟的成年人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都是同时作为不同层次的自我而存在的(McAdams, 2013, 2020)。基于上述理论,个体的社会角色自我和能动自我总是作为不同层次的自我同时存在,因此我们预期敬畏会通过平行的路径同时引发了社会角色自我(使其更渺小)与能动自我(使其更真实)的变化进而导致了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初步的实证证据也表明,敬畏通过平行的路径引发了小我与真我的改变,进而导致了亲社会行为的产生。【3.3 第五自然段】</p> |

参考文献:

Bai, Y., Maruskin, L. A., Chen, S., Gordon, A. M., Stelar, J. E., McNeil, G. D., Peng, K., & Keltner, D. (2017).

- Awe, the diminished self, and collective engagement: Universals and cultural variations in the small 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2), 185–209.
- Bai, Y., Ocampo, J., Jin, G., Chen, S., Benet-Martinez, V., Monroy, M., Anderson, C., & Keltner, D. (2021). Awe, daily stress, and elevated lif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0*(4), 837–860.
- Conner, M., Abraham, C., Prestwich, A., Hutter, R., Hallam, J., Sykes-Muskett, B., Morris, B., & Hurling, R. (2016). Impact of goal priority and goal conflict on the intention-health-behavior relationship: Tests on physical activity and other health behaviors. *Health Psychology*, *35*(9), 1017–1026.
- Deci, E. L., & Ryan, R. M. (1991). A motivational approach to self: Integration in personality. In R. Dienstbier & R. M. Ryan (Eds.),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pp. 237–288).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Jiang, T., & Sedikides, C. (2022). Awe motivates authentic-self pursuit via self-transcendence: Implications for prosoci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3*(3), 576–596.
- Jongman-Sereno, K. P., & Leary, M. R. (2019). The enigma of being yourself: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uthenticity.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3*(1), 133–142.
- Keltner, D., & Haidt, J. (2003). Approaching awe, a moral,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emotion. *Cognition & Emotion*, *17*(2), 297–314.
- Keltner, D., Kogan, A., Piff, P. K., & Saturn, S. R. (2014). The sociocultural appraisals, values, and emotions (SAVE) framework of prosociality: Core processes from gene to mem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 425–460.
- Keltner, D., & Lerner, J. S. (2010). Emotion. In D. T. Gilbert, S. T. Fiske, & G. Lindsay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pp. 312–347). New York, NY: McGraw-Hill.
- Luo, L., Zou, R., Yang, D., & Yuan, J. J. (2022). Awe experience triggered by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promotes prosociality through increased feeling of connectedness and empathy.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 Lutz, C., & White, G. M. (1986). The anthropology of emotion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5*, 405–436.
- Maslow, A. H. (1971). *The farther reaches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NY: Viking Press.
- McAdams, D. P. (2013). The psychological self as actor, agent, and author.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8*(3), 272–295.
- McAdams, D. P. (2020). Psychopathology and the self: Human actors, agents, and autho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8*(1), 146–155.
- McAdams, D. P., & Pals, J. L. (2006). A new big five-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an integrative science of persona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61*(3), 204–217.
- Perlin, J. D., & Li, L. (2020). Why does awe have prosocial effects? New perspectives on awe and the small self.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2), 291–308.
- Piff, P. K., Dietze, P., Feinberg, M., Stancato, D. M., & Keltner, D. (2015). Awe, the small self,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6), 883–899.
- Ryan, W. S., & Ryan, R. M. (2019). Toward a social psychology of authenticity: Exploring within-person variation in autonomy, congruence, and genuineness using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3*(1), 99–112.
- Sedikides, C., & Skowronski, J. J. (2000). On the evolutionary functions of the symbolic self: The emergence of self-evaluation motives. In A. Tesser, R. B. Felson, & J. M. Suls (Eds.),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elf and identity* (pp., 91–117).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Shiota, M. N., Keltner, D., & Mossman, A. (2007). The nature of awe: Elicitors, appraisals, and effects on self-concept. *Cognition & Emotion*, *21*(5), 944–963.
- Stellar, J. E. (2021). Awe helps us remember why it is important to forget the self.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501*(1), 81–84.

- Stellar, J. E., Gordon, A., Anderson, C. L., Piff, P. K., McNeil, G. D., & Keltner, D. (2018). Awe and hum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4*(2), 258–269.
- Stellar, J. E., Gordon, A. M., Piff, P. K., Cordero, D., Anderson, C. L., Bai, Y., Maruskin, L. A., & Keltner, D. (2017). Self-transcendent emotions and their social functions: Compassion, gratitude, and awe bind us to others through prosociality. *Emotion Review, 9*(3), 200–207.
- Van Cappellen, P., & Saroglou, V. (2012). Awe activates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feeling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4*(3), 223–236.
- Wilson, E. O. (2014). *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 Wilson, D. S., & Sober, E. (1998). Multilevel selection and the return of group-level functionalism.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1*(2), 305–306.
-

第二轮

审稿专家 1 意见：

《敬畏的亲社会效应：小我与真我的作用》一文系统梳理了敬畏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内在心理机制。此外，文章通过整合小我假说、真我假说与 McAdams 的心理自我模型，尝试厘清在敬畏增加亲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中小我与真我的关系。该文章对了解敬畏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总体而言是一篇不错的综述。但文章还存在以下问题有待思考：

1. 对于敬畏的五种类型，需要重新考虑。文中表述“敬畏有不同的类型，包括美的敬畏、钦佩的敬畏、崇高的敬畏、超自然的敬畏与恐惧的敬畏。”而事实上，敬畏的五大边缘特征应当是：威胁、美、卓越的能力、美德以及超自然。另外，崇高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被认为是从一个安全的位置面对危险。在这里应该被归类为威胁的敬畏，而不应该被单独划分为一个类型。请结合下述文献中的内容，予以修改。Chirico, A., & Yaden, D. B. (2018). Awe: A self-transcendent and sometimes transformative emotion. In H. C. Lench (Ed.), *The function of emotions* (pp. 221 – 233).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Keltner 和 Haidt(2003)确定了敬畏的五大边缘特征，这些主题通常与敬畏的诱发因素有关，可以对敬畏的体验进行调节，从而引起不同种类的敬畏体验(Chirico & Yaden, 2018)。具体来说，基于美的敬畏指的是观看具有美感的事物时所引发的敬畏体验，这些体验带有审美愉悦的味道，例如观看兵马俑、金字塔时的体验(Schindler et al., 2017)。基于能力的敬畏指的是个体被具有卓越能力、天赋和技能的人引发的伴随钦佩感的敬畏体验，例如观看

一个优秀运动员比赛时的体验(Onu, Kessler, & Smith, 2016)。基于美德的敬畏指的是个体表现出美德或品格力量的人所引发的带有提升感的敬畏体验，例如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读到袁隆平的生平时产生的体验(Haidt, 2003)。基于超自然的敬畏指的是个体所具有的带有宗教或精神成分的敬畏体验，常出现在个体感知到上帝或其他超自然实体的时候并伴随着不可思议的感觉(Bussing, 2021; Yaden et al., 2017)。基于威胁的敬畏指的是个体面对威胁和危险时产生的带有恐惧感的敬畏体验，例如面对具有威胁性的自然景象(暴风雨)时产生的体验(Gordon et al., 2017)。

已根据相关文献在正文进行了修改，详细内容见下表，相应位置在文中用“绿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p>具体来说，美的敬畏指的是观看令人震撼且具有美感的事物所引发的带有美感的敬畏体验，例如观看兵马俑、金字塔时的体验(Schindler et al., 2017)。钦佩的敬畏指的是个体被具有卓越能力的人引发的带有钦佩感的敬畏体验，例如观看一个优秀运动员比赛时的体验(Onu, Kessler, & Smith, 2016)。崇高的敬畏指的是个体被慈善和奉献等杰出道德引发的带有崇高感的敬畏体验，例如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读到袁隆平的生平时产生的体验(Haidt, 2003)。超自然的敬畏指的是个体所具有的带有宗教或精神成分的敬畏体验(Bussing, 2021; Yaden et al., 2017)。恐惧的敬畏指的是个体从一个安全的位置面对危险时产生的带有恐惧感的敬畏体验，例如第一次安全地站在大峡谷边缘时的体验(Gordon et al., 2017)。</p> | <p>具体来说，基于美的敬畏指的是观看具有美感的事物时所引发的敬畏体验，这些体验带有审美愉悦的味道，例如观看兵马俑、金字塔时的体验(Schindler et al., 2017)。基于能力的敬畏指的是个体被具有卓越能力、天赋和技能的人引发的伴随钦佩感的敬畏体验，例如观看一个优秀运动员比赛时的体验(Onu, Kessler, & Smith, 2016)。基于美德的敬畏指的是个体被表现出美德或品格力量的人所引发的带有提升感的敬畏体验，例如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读到袁隆平的生平时产生的体验(Haidt, 2003)。基于超自然的敬畏指的是个体所具有的带有宗教或精神成分的敬畏体验，常出现在个体感知到上帝或其他超自然实体的时候并伴随着不可思议的感觉(Bussing, 2021; Yaden et al., 2017)。基于威胁的敬畏指的是个体面对威胁和危险时产生的带有恐惧感的敬畏体验，例如面对具有威胁性的自然景象(暴风雨)时产生的体验(Gordon et al., 2017)。【1的第二自然段】</p> |

参考文献:

- Bussing, A. (2021). Wondering awe as a perceptive aspect of spirituality and its relation to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Frequency of perception and underlying trigger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738770.
- Chirico, A., & Yaden, D. B. (2018). Awe: A self-transcendent and sometimes transformative emotion. In H. C.

Lench (Ed.), *The function of emotions* (pp. 221–233).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ordon, A. M., Stellar, J. E., Anderson, C. L., McNeil, G. D., Loew, D., & Keltner, D. (2017). The dark side of the sublime: Distinguishing a threat-based variant of aw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2), 310–328.

Haidt, J. (2003). Elevation and the positive psychology of morality. In C. L. Keyes & J. Haidt (Eds.), *Flourishing: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the life well-lived* (pp. 275–289).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Onu, D., Kessler, T., & Smith, J. R. (2016). Admiration: A conceptual review. *Emotion Review, 8*, 218–230.

Schindler, I., Hosoya, G., Menninghaus, W., Beermann, U., Wagner, V., Eid, M., & Scherer, K. R. (2017). Measuring aesthetic emotion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a new assessment tool. *PLoS One, 12*, e0178899.

Yaden, D. B., Le Nguyen, K. D., Kern, M. L., Wintering, N. A., Eichstaedt, J. C., Schwartz, H. A., Buffone, A. E. K., Smith, L. K., Waldman, M. R., Hood, R. W., Jr., & Newberg, A. B. (2017). The noetic quality: A multimethod exploratory study. *Psychology of Consciousnes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4*(1), 54–62.

2. 这五种类型的敬畏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是否不同？包括后面谈到的消极敬畏与积极敬畏，它们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一致吗？机制也一致吗？这五种可以归类到积极与消极两大类吗？请作者增加这部分的分析。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1) 这五种类型的敬畏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为了阐明敬畏的本质，Keltner 和 Haidt(2003)开发了敬畏的原型模型，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这种情绪的核心方面——关注“原型敬畏”。原型被认为是某一概念范畴内最典型的成员(Visser, 2002)，一个给定的实例与它的原型越相似，它就越能被视为与该概念相同。就情绪而言，某种情绪与其说是一种明确区分的类别，不如被认为是一种模糊的系统，其中具有细微差别的不同成员在系统中的位置取决于它们与原型的相似程度。具体来说，研究者认为基本情绪应该被语境化为一个围绕中心主题(即一个情绪家庭的专属特征)所组织的群体，而具体的标准将定义一个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一个类别(Ekman & Cordaro, 2011)。就敬畏而言，Keltner 和 Haidt(2003)通过定义其核心特征以及语境变化提供了一个原型分析。他们把敬畏看作是一种边界模糊但具有核心特征的情绪。具体来说，敬畏的具有两个核心特征：浩瀚感和顺应的需要。浩瀚感(perceived vastness)是指对刺激物的感知，认为它在知觉上和/或概念上是巨大的；顺应的需要(need for accommodation)来源于皮亚杰

的认知理论，指的是当所面临的刺激和现存的认知图式不符时，个体根据新输入的刺激来改变原有认知图式的需要。涉及到以上核心特征的情绪体验，都被认为是敬畏家族的成员。此外，Keltner 和 Haidt(2003)确定了五大边缘特征，这些主题通常与敬畏的诱发因素有关，可以对敬畏的体验进行调节，从而引起不同种类的敬畏体验(Chirico & Yaden, 2018)。具体而言，包括基于威胁的敬畏、基于美的敬畏、基于能力的敬畏、基于美德的敬畏和基于超自然的敬畏。

那么，根据敬畏的原型模型，**五种类型的敬畏的联系**就在于它们都涉及到敬畏情绪的两个中心特征，即浩瀚感和顺应的需要，因此它们都被认为是敬畏家族中的一员。**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边缘特征的不同，尽管它们都是敬畏的家族的成员，但它们所关注的主题和诱发因素是不同的，不同的边缘特征可以对敬畏的体验进行调节，从而引起了五种不同种类的敬畏体验。

(2) 五种类型的敬畏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是否不同？

通过对以往关注敬畏和亲社会性关系的研究进行总结(见下表)，我们发现尽管以往研究采取了多种敬畏诱导方法，例如回忆任务要求被试回忆并描述让他们感到敬畏的经历(Yang, Yang, Bao, Liu, & Passmore, 2016)，这使得敬畏的体验可以自由地变化。但是绝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由自然激发的敬畏上(可以被归类为基于美的敬畏或基于威胁的敬畏)。由美丽的自然景色诱发的敬畏通常被认为对亲社会性有促进作用(Guan, Chen, Chen, Liu, & Zha, 2019; Piff, Dietze, Feinberg, Stancato, & Keltner, 2015; Prade & Saroglou, 2016)；而威胁性自然刺激所引发的敬畏则可能会对个体的亲社会倾向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Septianto, Nasution, Arnita, & Seo, 2022; 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其他的诱发因素相对来说还没有被探索。**因此，现有研究的限制使我们无法对五种类型的敬畏与亲社会性之间的关系加以比较。**

但是，就敬畏而言，作为一种自我超越的情绪，它通常被认为可以促进对他人福祉的关注(Stellar et al., 2017)。那么，基于美德和能力的敬畏可能同样对亲社会性有促进作用。例如，Luo 等人(2022)发现由医务工作者无私奉献的美德所诱发的敬畏可以提高进行志愿服务、捐款和献血的意愿。Meng 和 Wang(2022)关注在工作场所中诱发的敬畏，他们的研究要求回忆并写下以前因组织或同事相关因素而产生的敬畏体验。后续的编码分析发现，与组织相关的敬畏激发因素包括美德、能力和成就、组织的地位和权力，以及工作场所的美；与同事相关的敬畏因素包括美德、能力和成就、奉献精神、魅力以及同事的地位和权力。

上述与组织或同事相关的敬畏体验提高了个体的亲社会意向与亲社会行为。

总之，考虑到敬畏的诱发因素是多种多样的(Keltner & Haidt, 2003)，尽管对于不同类型的敬畏对亲社会性的影响目前尚未被系统地探索，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通过对比多种形式的敬畏效应来回答这一问题，以检验敬畏的边缘特征是否对亲社会性的影响有调节作用。

下表对以往关注敬畏和亲社会性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在这些研究中绝大多数的研究集中于由自然激发的敬畏上，其中的例外已用“紫色”标出。

| 文献 | 对敬畏的测量/操纵 | 结果 |
|--------------------------------|--|--|
| Piff et al. (2015) | Study 1: 特质敬畏(测量: 特质性积极情绪量表, DPES) Study 2: 回忆任务(回忆令人敬畏的自然景象) Study 3: 视频诱导(观看了自然图像视频) Study 4: 视频诱导(消极敬畏: 威胁性的自然刺激 vs. 非自然敬畏: 彩色水滴与一碗牛奶的碰撞) Study 5: 现场实验(注视高耸的桉树林) | 在经济游戏中, 具有敬畏特质的个体表现得更加慷慨(研究 1)。实验性地诱导敬畏使个体赞同更多的道德决定(研究 2), 对陌生人更慷慨(研究 3), 并报告更多的亲社会价值(研究 4)。在一个自然的敬畏诱导中, 参与者仰望一片高耸的树丛, 导致了更多的帮助(研究 5)。 |
| Lin et al. (2021) | 特质敬畏(测量: 中国大学生倾向性敬畏问卷, DAQ-CU) | 特质敬畏与在线利他主义呈正相关关系。 |
| Seo, Yang, & Laurent (2022) | Study 4: 图像诱导(积极敬畏: 自然景观 vs. 消极敬畏: 威胁性自然灾害图片) | 在积极和消极敬畏条件下的被试均比在控制条件下分配更多的钱给全球慈善机构。 |
| Li, Dou, Wang, & Nie (2019) | 特质敬畏(测量: 特质性积极情绪量表, DPES) | 特质敬畏与亲社会行为倾向正相关。 |
| Guan et al. (2019) | Study 1: 特质敬畏(测量: 特质性积极情绪量表, DPES) Study 2: 视频诱导(积极敬畏: 自然刺激 vs. 消极敬畏: 威胁性的自然刺激) Study 3: 视频诱导(积极敬畏: 自然刺激 vs. 消极敬畏: 威胁性的自然刺激) | 特质敬畏与更大的亲社会倾向有关; 积极和消极的敬畏条件下比在中性条件下更有可能捐出他们的钱, 而且积极和消极的敬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与消极敬畏条件和中性相比, 在积极敬畏条件下更可能捐出时间, 消极敬畏和中立条件没有显著差异。 |
| Lin, Hong, Xiao, & Lian (2020) | 特质敬畏(测量: 中国大学生倾向性敬畏问卷, DAQ-CU) | 特质敬畏与亲社会行为倾向正相关。 |
| Rudd, Vohs, & Aaker (2012) | Study 2: 书写任务(敬畏: 写下敬畏 vs. | 敬畏条件下比快乐条件下的更愿意自愿 |

| | | |
|-------------------------------|---|---|
| | 快乐的个人经历) | 付出时间；敬畏条件的被试并不比快乐条件下的被试更愿意捐钱。 |
| Meng & Wang (2022) | 回忆任务(回忆因组织或同事而产生的敬畏体验) | 敬畏情绪组的亲社会意向明显高于中立组和愉快情绪组；敬畏组的亲社会行为比中立组和愉快情绪组要高(边缘显著)。 |
| Prade & Saroglou (2016) | Study 1: 回忆任务(回忆令人敬畏的自然景象) | 敬畏的体验增强了慷慨，增加了被试与他人分享假设的倾向(实验 1)；和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意愿(实验 2)。 |
| | Study 2: 视频诱导(观看自然图像视频) | |
| Joye & Bolderdijk (2015) | 图像诱导(敬畏：宏伟和戏剧性的山景图片，也包括一些以雷暴、龙卷风、彩虹和日落为主的宏伟景观图片) | 自然敬畏对捐款/帮助的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促进了亲社会价值观。 |
| Yang et al. (2016) | Study 2: 回忆任务(回忆并写下敬畏的经历) | 敬畏增加了亲社会性(亲社会行为：为 "伙伴"选择的容易谜题的数量和亲社会性动机) |
| | Study 3: 视频诱导(观看自然图像视频) | |
| Luo, Zou, Yang, & Yuan (2022) | Study 1: 特质敬畏(测量：特质性积极情绪量表, DPES) | 特质敬畏可以预测被试是否充当志愿者或捐赠物资，但不能预测他们是否捐赠金钱；然而，具有较高特质敬畏的个体倾向于捐赠更多的钱。 |
| | Study 2: 敬畏的体验(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经历一般的、对医务工作者、对生命和对自然的敬畏频率进行评分) | 在纵向研究中，敬畏感与亲社会性的长期增长呈正相关，其衡量标准是更愿意成为志愿者和捐钱支持抗击 COVID-19。 |
| | Study 3: 回忆任务(回忆并写下他们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由医务工作者的美德所诱发的积极敬畏经历) | 总体上，敬畏增加了对群体内和群体外的亲社会性，但没有增加为内群体捐款的意愿，也没有增加与外群体合作的意愿。 |
| | Study 4: 回忆任务(回忆并写下他们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由医务工作者的美德所诱发的积极敬畏经历) | 敬畏对献血意愿有显著的作用，但对在献血网站上在线注册的意愿没有作用。 |
| Fu et al. (2022) | 特质敬畏(测量：特质性积极情绪量表, DPES) | 纵向研究中，敬畏感(T1)可以正向预测亲社会倾向(T2)。 |
| Jiao & Luo (2022) | 特质敬畏(测量：特质性积极情绪量表, DPES) | 在每个具体的情境中，特质敬畏对亲社会倾向的预测作用都很显著。 |

(3) 包括后面谈到的消极敬畏与积极敬畏，它们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一致吗？机制也一致吗？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基于威胁的敬畏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这背后可能存在两条不同的途

径，每条途径各有不同的运作机制。一条路径及其运作机制与积极敬畏相似，而另一条路径及其运作机制与积极敬畏不同。

具体而言，先前的多数研究都认为敬畏是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Cao, Wang, & Wang, 2020; Piff et al., 2015)。然而，在近期开展的部分研究关注了敬畏的消极方面——基于威胁的敬畏。这是一种带有恐惧色彩的敬畏，通常由自然灾害(如海啸和龙卷风)或专制的独裁者所诱发(Gordon et al., 2017)。基于威胁的敬畏将如何增加(或减少)亲社会性？目前的研究认为消极敬畏与亲社会性之间存在有两条不同的途径，每条途径各有不同的运作机制(Piff et al., 2015; Seo et al., 2022; 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 Wang et al., 2022)。一方面，部分研究主要强调它与积极敬畏的相似性，认为基于威胁的敬畏同样可以导致更高的亲社会性，这种效应同样是由小我感(觉得自己是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并觉得自己的问题和日常关注的问题变得无足轻重)所中介的(Piff et al., 2015; Seo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22)。另一方面，与积极敬畏不同，鉴于这种敬畏的消极变体与恐惧、较低自我控制和较高的情境控制有关(Chaudhury et al., 2022; Gordon et al., 2017)，研究者认为这种感觉可能导致较低的亲社会性，这种效应是由无力感所中介的(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et al., 2022)。较低的控制感可能导致无力感的增强(Gordon et al., 2017; 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这有助于阐明为什么基于威胁的敬畏会限制亲社会性。如果人们觉得他们缺乏足够的效能来改变现状，他们可能不会追求亲社会行为(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et al., 2022)。因此，高水平的威胁敬畏可能会减少亲社会行为，因为个人感到无能为力。

对此，建构水平和内隐理论可能是有效的调节变量。研究发现向被试呈现高建构水平的广告(强调“为什么”)时，经历威胁敬畏的被试报告了更高的捐赠意向(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此外，当面临基于威胁的敬畏时，具有增长(相对于实体)理论的个体认为他们的捐赠有更高的效能，因此做出更多的捐赠(Septianto, Seo, et al., 2022)。自然灾害是基于威胁的敬畏的重要诱因(Gordon et al., 2017; Keltner & Haidt, 2003; Piff et al., 2015)；这些灾害产生了巨大的受助需求。因此，在未来利用调节变量以发挥威胁敬畏对于捐赠等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4) 这五种可以归类到积极与消极两大类吗？

在敬畏的原型分析中，大多数变体在价值上都是积极的，比如基于美、美德和能力的敬畏(Gordon et al., 2017; Keltner & Haidt, 2003)。但是基于威胁的敬畏是消极的，这种更具

威胁性的敬畏变体可能来自于各种刺激，如社会性(如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强大个体)或自然(如闪电)。此外，基于超自然的敬畏的体验往往伴随着一种不可思议感，感知到上帝或其他超自然物体所带来的不可思议感通常被认为是可怕的(Angyal, 1941)，但如果物体被认为是善意的，它也可以是积极的。

此外，最近的观点认为，敬畏的效价可能与其核心特征——顺应的需要相关(赵小红等, 2021)。在顺应的需要产生后，它可能会得到满足也可能不会得到满足。有两种情况可能会发生：一是刺激性占上风，观察者被浩瀚的事物所淹没，也就是说，不能参与/联系到这个现象。此时顺应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被淹没的观察者会体验到主客体的分离。这是一种不尽人意的体验，会导致一种困惑(bewilderment)的感觉；二是当观察者没有被(浩瀚的)现象所淹没时，也就是说，顺应的需要得到了满足。那么观察者就不会陷入这种主客体的分离，敬畏感被成功唤起(Weger & Wagemann, 2021)。学者认为一个人顺应需要的满足可能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敬畏既可以是可怕的(当无法理解时)，也可以是启蒙的(当顺应成功时)(赵小红等, 2021)。

已根据审稿人的建议在正文中增加了对这部分内容的分析，详细内容见下表，相应位置在文中用“绿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敬畏有不同的类型，包括美的敬畏、钦佩的敬畏、崇高的敬畏、超自然的敬畏与恐惧的敬畏；这些类型通常与敬畏的诱发因素有关，可以对敬畏的体验进行调节，从而引起不同的敬畏状态(周凌霄等, 2022; Keltner & Haidt, 2003)。 | 敬畏有不同的类型，研究者确定了敬畏的五大边缘特征，这些特征通常与敬畏的诱发因素有关，可以对敬畏的体验进行调节，从而引起不同种类的敬畏体验，包括美的敬畏、钦佩的敬畏、崇高的敬畏、超自然的敬畏与恐惧的敬畏(周凌霄等, 2022; Chirico & Yaden, 2018; Keltner & Haidt, 2003)。 |
| 事实上，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敬畏的解释同时包含了“敬”和“畏”的双重内涵，指既敬重又畏惧(赵欢欢等, 2019)。最近的研究中会把掺杂着恐惧的敬畏与以往积极形式的敬畏进行对比(Gordon et al., 2017; Jiang et al., 2018; Piff et al., 2015)。有研究者指出基于威胁的敬畏体验 | 更重要的是，关于威胁的敬畏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亲社会行为则存在更大争议，需要未来研究从理论与实证上予以澄清。具体来说，一些研究强调它与积极敬畏的相似性，认为基于威胁的敬畏同样可以导致更高的亲社会性(Piff et al., 2015; Seo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22)。然而另一些研 |

可能会产生与积极的敬畏体验不一致的效应，敬畏的黑暗面可能会通过小我对社会行为产生负面的效应(Gordon et al., 2017)。在消极的敬畏体验使自我变得渺小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为了追求集体利益而从事社会破坏性行为。同样通过对小我的影响，消极敬畏可能预测了针对内群体的有益行为，包括各类亲社会行为；而针对外群体，消极敬畏则可能预测了更多的有害行为，包括外群体偏见、攻击。例如，在非个体化的群体背景下，特定的宗教敬畏可能会削弱个体的自我，并煽动个人进行自杀式恐怖袭击(Bai et al., 2017)。此外，尽管在金钱捐赠方面，积极与消极敬畏均可以促进被试产生更多的捐赠行为(Guan et al., 2019)；但对于志愿时间的捐赠，两种敬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应，实验性地诱导积极的敬畏而不是消极的敬畏，可以促使个体付出更多的志愿时间(Guan et al., 2019; Rudd, Vohs, & Aaker, 2012)。鉴于现有研究具有的矛盾性，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检验这一效应的普遍性及边界条件。

究则认为，威胁的敬畏与恐惧、较低自我控制和较高的情境控制有关，这将导致较低的亲社会性；因为较低的控制感可能导致无力感的增强，当人们觉得他们缺乏足够的效能来改变现状，就可能不会产生亲社会行为(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et al., 2022)。对此，未来研究要深入考察不同类型的敬畏，尤其是基于威胁敬畏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以明确敬畏亲社会效应的普遍性。【4 小结与展望的第二自然段】

参考文献:

- Cao, F., Wang, X., & Wang, Z. (2020). Effects of awe on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healthy versus unhealthy food products.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 19(3), 264–276.
- Chaudhury, S. H., Garg, N., & Jiang, Z. X. (2022). The curious case of threat-awe: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conceptualization. *Emotion*, 22(7), 1653–1669.
- Fu, Y. N., Feng, R. D., Liu, Q., He, Y. M., Turel, O., Zhang, S. Y., & He, Q. H. (2022). Aw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11).
- Gordon, A. M., Stellar, J. E., Anderson, C. L., McNeil, G. D., Loew, D., & Keltner, D. (2017). The Dark Side of the Sublime: Distinguishing a Threat-Based Variant of Aw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2), 310-328.
- Guan, F., Chen, J., Chen, O. T., Liu, L. H., & Zha, Y. Z. (2019). Awe and prosocial tendency. *Current Psychology*, 38(4), 1033-1041.
- Jiao, L., & Luo, L. (2022). Dispositional Awe Positively Predicts Prosocial Tendencies: The Multiple Mediation Effects of Connectedness and Empat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24).
- Joye, Y., & Bolderdijk, J. W. (2015). An exploratory study into the effects of extraordinary nature on emotions, mood, and prosocial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5. doi:10.3389/fpsyg.2014.01577
- Keltner, D., & Haidt, J. (2003). Approaching awe, a moral,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emotion. *Cognition & Emotion*, 17(2), 297-314.

- Li, J. J., Dou, K., Wang, Y. J., & Nie, Y. G. (2019). Why Awe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s?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Self-Transcendence Meaning of Lif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 Lin, R. M., Chen, Y. P., Shen, Y. L., Xiong, X. X., Lin, N., & Lian, R. (2021). Dispositional Awe and Online Altruism: Testing a Moderated Mediating Model.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 Lin, R. M., Hong, Y. J., Xiao, H. W., & Lian, R. (2020). Dispositional awe and prosocial tendency: The mediating roles of self-transcendent meaning in life and spiritual self-transcendence.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48*(12).
- Luo, L., Zou, R., Yang, D., & Yuan, J. J. Awe experience triggered by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promotes prosociality through increased feeling of connectedness and empathy.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 Meng, L., & Wang, X. Awe in the workplace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 *Psych Journal*.
- Piff, P. K., Dietze, P., Feinberg, M., Stancato, D. M., & Keltner, D. (2015). Awe, the Small Self,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6), 883-899.
- Prade, C., & Saroglou, V. (2016). Awe's effects on generosity and helping.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1*(5), 522-530.
- Rudd, M., Vohs, K. D., & Aaker, J. (2012). Awe Expands People's Perception of Time, Alters Decision Making, and Enhances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10), 1130-1136.
- Seo, M. J., Yang, S. Y., & Laurent, S. M. No One Is an Island: Awe Encourages Global Citizenship Identification. *Emotion*.
- Septianto, F., Nasution, R. A., Arnita, D., & Seo, Y. (2022). The role of threat-based awe and construal level in charitable advertising.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56*(5), 1532-1555.
- Septianto, F., Seo, Y., & Paramita, W. (2022). The Role of Implicit Theories in Motivating Donations in Response to Threat-Based Awe.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 41*(1), 72-88.
- Wang, M., Qu, X., Guo, C., & Wang, J. (2022). Awe elicited by natural disasters and willingness to help people in afflicted areas: A meditational model. *Current Psychology*.
- Weger, U., & Wagemann, J. (2021). Towards a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of awe and wonder A first person phenomenological enquiry. *Current Psychology, 40*(3), 1386-1401.
- Yang, Y., Yang, Z. Y., Bao, T. X., Liu, Y. Z., & Passmore, H. A. (2016). Elicited Awe Decreases Aggression.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10*.

3. 关于真我假说，请作者更多增加实证支持。目前的文章中只介绍了 Jiang 和 Sedikides(2022)的一项研究，是否还有更多实证研究？若有，请作者予以补充。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目前真我假说仍处于发展之中，据我们所知，自 Jiang 和 Sedikides 在 2022 年证实了真实自我在敬畏与个体亲社会性之间的中介作用后，尚未有其他的实证研究对真我假说加以检验，这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此外，尽管无其他的实证支持，Jiang 和 Sedikides(2022)在他们开展的多项子研究中均发现了真实自我的中介作用。例如，在相关研究中，Jiang 和 Sedikides(2022, study14)检验了真我在敬畏和一般亲社会性之间所起到的作用，发现真实自我追求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真实自我追求中介了敬畏对一般亲社会性

的影响。此外，在实验室研究中，研究者进一步使用回忆任务来操纵敬畏，结果同样发现对真实自我的追求中介了敬畏对一般亲社会性的影响(Jiang & Sedikides, 2022, study11)。

参考文献：

Jiang, T., & Sedikides, C. (2022). Awe motivates authentic-self pursuit via self-transcendence: Implications for prosoci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3(3), 576–596.

4. 作者在讨论中提到“爱心善意冥想(Mantzios, Tariq, Altaf, & Giannou, 2021)、感恩日记(Geier & Morris, 2022)和善行(Haydon et al., 2022)等干预能显著地引起个体自我的改变，进而导致亲社会行为的发生。”这里所列举的几种干预措施不恰当，所引用的文献不能证明感恩日记这种方法可以干预自我；此外，对他人施加善行本身就是一种亲社会行为，不能用来干预亲社会行为。

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敬畏可以产生众多的积极效应，然而目前针对增强敬畏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的干预研究仍然是缺乏的。只有一项研究使用了干预方法，并观察到参加敬畏行走的老人报告了更多的敬畏体验，更少的日常困扰，以及更多的亲社会情绪(Sturm et al., 2022)。目前还不清楚其他干预方法，是否会产生类似的效果，特别是对敬畏体验水平低的人。因此，在此处提出几种干预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为未来更多干预方案的开发提供思路。但由于我们的疏忽，这些干预方案的列举是不恰当的，比如对他人施加善行本身就是一种亲社会行为，不能用来干预亲社会行为。因此，我们对这一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提供了一些其他的干预思路。例如，Waller 等人(2021)发现，经历了 360° 视频指导的冥想的被试，主要涉及正念呼吸练习，增加了敬畏的感觉。此外，Geier 和 Morris(2022)发现，写作任务是增强其他积极情绪(例如，感恩的有效方法。因此，正念训练或每日日记是否能长期有效地提升敬畏感，这需要在未来开展更多的干预研究加以探索，这对心理健康教育 and 心理治疗实践至关重要(Luo, Zou, Yang, & Yuan, 2022)。

已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在正文中列举的不恰当的干预方案进行替换，相应位置在文中用“绿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初步研究证据显示, 爱心善意冥想(Mantzios, Tariq, Altaf, & Giannou, 2021)、感恩日记(Geier & Morris, 2022)和善行(Haydon et al., 2022)等干预能显著地引起个体自我的改变, 进而导致亲社会行为的发生。 | 其他的证据显示, 正念训练或每日日记可能是有效的干预措施。例如, Waller 等人(2021)发现, 进行正念呼吸练习可以增加敬畏的感觉。此外, Geier 和 Morris(2022)发现, 写作任务是增强其他积极情绪(例如, 感恩)的有效方法。【4 的最后一自然段】 |

参考文献:

- Geier, M. T., & Morris, J. (2022). The impact of a gratitude intervention on mental well-being during COVID-19: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pplied Psychology: Health and Well-being*, 14(3), 937–948.
- Luo, L., Zou, R., Yang, D., & Yuan, J. (2022). Awe experience triggered by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promotes prosociality through increased feeling of connectedness and empathy.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 Sturm, V. E., Datta, S., Roy, A. R. K., Sible, I. J., Kosik, E. L., Veziris, C. R., Chow, T. E., Morris, N. A., Neuhaus, J., Kramer, J. H., Miller, B. L., Holley, S. R., & Keltner, D. (2020). Big smile, small self: Awe walks promote prosocial positive emotions in older adults. *Emotion*, 22(5), 1044–1058.
- Waller, M., Mistry, D., Jetly, R., & Frewen, P. (2021). Meditating in virtual reality 3: 360° video of perceptual presence of instructor. *Mindfulness*, 12(6), 1424–1437.

5. 作者根据 McAdams 的心理自我模型对小我与真我的作用做出了新的解释, 但是“人类的自我倾向于从三个不同的心理角度理解自己: 作为社会角色、能动者和自传作者。”此外, 作者提到“敬畏很可能对自我的不同层次都产生了作用, 这些作用共同促进了亲社会行为。”那么对于第三层次的自传自我呢? 敬畏会产生怎样的作用? 这一部分本文似乎没有提及。

答: 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在自我身份的第三层, 将自我描述为独特生活故事的自传体作者, 与 McAdams(1995)的人格第三层相呼应。在这个层次, 人格可以从个人不断发展和内化的叙事身份(narrative identity)来分析(McAdams & McLean, 2013; Singer, 2004)。叙事帮助人们在主题上整合过去、现在和未来, 为从生活的不同经历中获得意义服务。自我连续性是自传体作者的主要功能(McAdams, 2013), 自我连续性在叙述者使用自传体推理时是显而易见的, 自传体推理是将一个人的经历与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联系起来的能力(Habermas & Bluck, 2000; McLean & Fournier, 2008; Singer & Bluck, 2001)。这种叙事实践反映了“主体我”构建“客体”的最复杂的本体过程(McAdams, 2013)。

研究者认为, 从作为自传作者的角度出发, 同样帮助我们理解敬畏对自我的作用并帮

助我们补充敬畏促进亲社会性的心理机制。简言之，Perlin 和 Li(2021)认为敬畏可能会刺激顺应性的处理，这与心理成熟、成长和自我发展有关。而研究表明，越来越高的自我发展水平与亲社会人格特征有关(Westenberg & Block, 1993)。然而，目前仍没有直接的实证证据证明上述构想。

总之，从自我的第三层次出发，理解敬畏如何通过影响自我促进个体亲社会性，可能有助于补充现有的小我假说与真我假说，探明一条从敬畏通往亲社会性的新路径。但鉴于目前仍没有直接的实证证据证明上述构想，所以我们没有在本文中提及这部分的内容。

参考文献:

- Perlin, J. D., & Li, L. (2020). Why does awe have prosocial effects? New perspectives on awe and the small self.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2), 291–308.
- McAdams, D. P. (1995). What do we know when we know a pers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3*, 365–396.
- McAdams, D. P. (2013). The psychological self as actor, agent, and author.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8*, 272–295.
- McAdams, D. P., & McLean, K. C. (2013). Narrative identit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 233–238.
- McLean, K. C., & Fournier, M. A. (2008). The content and processes of 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 in narrative identit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2*, 527–545.
- Singer, J. A. (2004). Narrative identity and meaning making across the adult lifespan: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2*, 437–460.
- Singer, J. A., & Bluck, S. (2001). New perspectives o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he integration of narrative processing and 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5*, 91–99.
- Westenberg, P. M., & Block, J. (1993). Ego development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5*, 792–800.

6. 对于敬畏的概念，作者总结“敬畏是由对比自我更大的刺激的感觉所引起的(即浩瀚感)，而这种浩瀚感需要新的心理表征来理解(即顺应的需要)。”这里的概括不准。浩瀚感被认为可以来自在知觉上和/或概念上是巨大的刺激物，但并没有文献提及引发浩瀚感的刺激物一定是比自我更大的刺激。此外，当浩瀚感来自概念复杂的刺激(如相对论)时，将其概括为比自我更大的刺激，是不合适的。因此，这里的表述需要斟酌。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对于浩瀚感的定义：Keltner 和 Haid(2003)提出有两个特征构成了敬畏的原型案例的核心：浩瀚感和顺应的需要。其中浩瀚感指的是任何被体验为比自我或自我的一般经验水平或参考框架大得多的东西，这种感觉可以来自在知觉上和/或概念上是巨大的刺激物。

Weger 和 Wagemann(2021)进一步从内部(external vastness)(例如：回忆)与外部(internal

vastness)(例如：宇宙)两方面对浩瀚感进行解释。他们认为浩瀚感不是绝对既定的，而是一种取决于观察者个人框架(framing)的现象。例如，引起浩瀚感的刺激可以是一个小事件，但由于观察者将浩瀚的经验与之联系起来而被感知为浩瀚，从而引发敬畏；或者这种个人框架也可以减少这种浩瀚感，特别是对概念性的浩瀚，从而阻止敬畏的体验(Englich, Mussweiler, & Strack, 2006)。综上，浩瀚感是一种自我体验，它取决于观察者自身的参照框架，超出个体已有认知参考框架的任何次级物体或现象只要产生浩瀚的自我体验且满足顺应需求都可引发敬畏。

已根据相关文献对正文中不恰当的表达进行了修改，详细内容见下表，相应位置在文中用“绿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简而言之，敬畏是由对比自我更大的刺激的感觉所引起的(即浩瀚感)，而这种浩瀚感需要新的心理表征来理解(即顺应的需要)(赵小红 等, 2021; Keltner & Haidt, 2003; Monroy & Keltner, 2022)。 | 简而言之，敬畏产生于一种由比自我或自我的已有认知参照框架大得多的刺激所引起的感觉(即浩瀚感)，而这种浩瀚感需要新的心理表征来理解(即顺应的需要)(赵小红 等, 2021; Keltner & Haidt, 2003; Monroy & Keltner, 2022; Weger & Wagemann, 2021)。 |

参考文献:

- Englich, B., Mussweiler, T., & Strack, F. (2006). Playing dice with criminal sentences: The influence of irrelevant anchors on experts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2), 188-200.
- Keltner, D., & Haidt, J. (2003). Approaching awe, a moral,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emotion. *Cognition & Emotion*, 17(2), 297-314.
- Weger, U., & Wagemann, J. (2021). Towards a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of awe and wonder: A first person phenomenological enquiry. *Current Psychology*, 40(3), 1386-1401.

审稿专家 2 意见

文章讨论了关于敬畏的小我和真我理论，从 McAdam 自我理论的角度试图提供一个整合的理论框架进一步解释敬畏的亲社会性的研究结果，视角有新意，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价值。然而，在这篇文章中，仍有一些问题没有阐释清楚：

1. 敬畏对亲社会性的促进作用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如 Rudd et al.(2012)发现敬畏带来了更多与时间有关的助人行为，而没有带来更多与金钱有关的助人行为。Joye and Bolderdijk (2015)发现敬畏没有提高人们帮助受灾者、捐钱、捐物、献血的意愿，但是却强化了亲社会价值观。

答：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以往的许多研究关注敬畏和亲社会性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大多数研究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证明了敬畏对亲社会性的促进作用(详见表 1)。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研究未得到一致的结果(Joye & Bolderdijk, 2015; Luo, Zou, Yang, & Yuan, 2022; Meng & Wang, 2022; Rudd, Vohs, & Aaker, 2012)。例如，Joye 和 Bolderdijk (2015)发现敬畏没有提高人们帮助受灾者、捐钱、捐物、献血的意愿，但是却强化了亲社会价值观(SVO)。但他们仍认为接触令人敬畏的大自然可以促进个体做出亲社会性的决定。此外，一些早期研究也显示 SVO 能够成功地转化为更高的捐赠(Van Lange, Bekkers, Schuyt, & Van Vugt, 2007)。研究者认为他们所发现的无效影响很可能是因为在测量捐赠意愿时，他们使用了一种非常规的量表(使用九个逐渐变长的箭头分别代表逐渐升高的捐赠/帮助水平)，这种量表的使用对被试的选择造成了迷惑。此外，尽管 Rudd 等人(2012)发现敬畏感带来了更多与时间有关的助人行为，而没有带来更多与金钱有关的助人行为。研究者认为，他们的理论主要集中在敬畏改变对时间的感知的能力，而不是亲社会性，所以他们认为敬畏不会影响参与者的捐款意愿(Rudd et al., 2012)。但随着后续研究的发展，这种考虑被认为是不充分的，更多的研究发现了敬畏与金钱捐赠倾向之间的积极联系。如，Guan 等人(2019)发现积极和消极敬畏均能使人们更可能为福利案例捐出金钱；Prade 和 Saroglou(2016)即使在不限定奖金用途的情况下，敬畏体验也能够增加慷慨，促进人们自发地将奖金分配给家人、朋友和/或慈善机构。这种发现也拓展到了实际的捐款行为中，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那些具有较高特质敬畏的个体为抗击 COVID-19 捐赠出了更多的钱(Luo et al., 2022)。

总之，尽管以往的研究结论并非完全一致，但敬畏仍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它被认为对亲社会性有广泛的促进作用。这一效应在多种不同的形式的亲社会性测量中得到了支持。在这些研究中，敬畏被发现与个体的亲社会倾向密切相关(Li, Dou, Wang, & Nie, 2019; Lin, Hong, Xiao, & Lian, 2020; Fu et al., 2022; Jiao & Luo, 2022)。此外，它能够促进经济游戏中的慷慨(Piff, Dietze, Feinberg, Stancato, & Keltner, 2015)、自发的亲社会意图(Prade & Saroglou, 2016)和对时间(Guan, Chen, Chen, Liu, & Zha, 2019; Rudd et al., 2012)、金钱(Guan et al., 2019)甚至血液(Luo et al., 2022)的捐赠意愿以及在实验室(Meng & Wang, 2022; Yang,

Yang, Bao, Liu, & Passmore, 2016)、自然情境(Piff et al., 2015)和现实生活中(Luo et al., 2022)的实际亲社会行为。最近的一些研究进一步地拓展了这种效应的范围, 这些研究表明敬畏的影响似乎可以超越内群体的范畴或国家的利益, 对于世界性的和对外群体的亲社会倾向同样具有促进作用(Seo, Yang, & Laurent, 2022; Luo et al., 2022)。

表 1: 下表对关注敬畏和亲社会性之间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总结, 其中小部分不一致的结论用“紫色”予以了标注。

| 文献 | 因变量(对亲社会性的测量) | 结果 |
|--------------------|---|--|
| Piff et al. (2015) | Study 1: 慷慨程度(独裁者游戏中分配给伙伴的奖券) ² | 在经济游戏中, 具有敬畏特质的个体表现得更加慷慨(研究 1)。实验性地诱导敬畏使个体赞同更多的道德决定(研究 2), 对陌生人更慷慨(研究 3), 并报告更多的亲社会价值(研究 4)。在一个自然的敬畏诱导中, 参与者仰望一片高耸的树丛, 导致了更多的帮助(研究 5)。 |
| | Study 2: 道德决策(被试将自我利益置于集体规范和他人利益之上的意愿) ¹²³ | |
| | Study 3: 独裁者游戏中的慷慨程度 ² | |
| | Study 4: 亲社会价值(社会价值的三重优势测量法: 衡量自己和假设的他人之间资源分配的一般偏好) ² | |
| | Study 5: 实际帮助行为(被试帮助实验者捡起的笔的数量) ¹ | |
| Lin et al. (2021) | 网络利他(测量: 互联网利他行为量表, IABS) | 特质敬畏与在线利他主义呈正相关关系。 |
| Seo et al. (2022) | Study 4: 捐赠分配意向(将捐款分配给全球慈善机构或本地慈善机构的意向) ² | 在积极和消极敬畏条件下的被试均比在控制条件下分配更多的钱给全球慈善机构。 |
| Li et al. (2019) | 亲社会倾向(测量: 亲社会倾向测量, PTM) | 特质敬畏与亲社会行为倾向正相关。 |
| Guan et al. (2019) | Study 1: 亲社会倾向(测量: 亲社会倾向测量, PTM) | 特质敬畏与更大的亲社会倾向有关; 积极和消极的敬畏条件下比在中性条件下更有可能捐出他们的钱, 而且积极和消极的敬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与消极敬畏条件和中性相比, 在积极敬畏条件下更可能捐出时间, 消极敬畏和中立条件没有显著差异。 |
| | Study 2: 捐赠金钱的倾向(为福利案例捐赠金钱的数额) ² | |
| | Study 3: 捐赠时间的倾向(为研究人员提供帮助的时间) ¹ | |
| Lin et al. (2020) | 亲社会倾向(测量: 亲社会倾向测量, PTM) | 特质敬畏与亲社会行为倾向正相关。 |
| Rudd et al. (2012) | Study 2: 捐赠时间和金钱的意愿(为“支持有价值的事业”和“帮助慈善机构”而自愿花时间和捐钱的可能性和意愿) ¹² | 敬畏条件下比快乐条件下的更愿意自愿付出时间; 敬畏条件的被试并不比快乐条件下的被试更愿意捐钱。 |

| | | |
|----------------------------|--|--|
| Meng and Wang (2022) | 亲社会意愿(是否愿意以很低的报酬帮助研究人员进行另一个研究项目); 亲社会行为(是否点击链接完成了不相关的调查)1 | 敬畏情绪组的亲社会意向明显高于中立组和愉快情绪组; 敬畏组的亲社会行为比中立组和愉快情绪组要高(边缘显著)。 |
| Prade and Saroglou (2016) | Study 1: 自发的慷慨(如果赢得 10 万欧元, 自发分配给他人(家人、朋友和/或慈善机构)的钱的百分比)2 | 敬畏的体验增强了慷慨, 增加了被试与他人分享假设的倾向(实验 1); 和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意愿(实验 2)。 |
| | Study 2: 帮助意愿(面临假设的帮助情景时做出的反应)1 | |
| Joye and Bolderdijk (2015) | 捐赠意愿(捐赠食物、衣服、金钱和血液的意愿); 社会价值取向(SVO)(在自己和假想他人之间分配可能的分数的选择)12 | 自然敬畏对捐款/帮助的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但促进了亲社会价值观。 |
| Yang et al. (2016) | Study 2 和 3: 亲社会行为(七巧板帮助/伤害任务中为其伙伴选择完成的简单的谜题数量); 亲社会动机(想帮助对方赢得礼品卡的动机)1 | 敬畏增加了亲社会性(亲社会行为: 为“伙伴”选择的容易谜题的数量和亲社会性动机) |
| Luo et al. (2022) | Study 1: 亲社会行为(COVID-19 大流行中, 是否做志愿者、捐赠物资、金钱及捐赠了多少)1 | 特质敬畏可以预测被试是否充当志愿者或捐赠物资, 但不能预测他们是否捐赠金钱; 然而, 具有较高特质敬畏的个体倾向于捐赠更多的钱。 |
| | Study 2: 亲社会性(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成为志愿者和捐赠物资的意愿)。12 | 在纵向研究中, 敬畏感与亲社会性的长期增长呈正相关, 其衡量标准是更愿意成为志愿者和捐钱支持抗击 COVID-19。 |
| | Study 4: 亲社会性(献血意愿和在献血网站上注册的意愿)1 | 敬畏对献血意愿有显著的作用, 但对在献血网站上在线注册的意愿没有作用。 |
| Fu et al. (2022) | 亲社会倾向(测量: 亲社会倾向测量, PTM) | 纵向研究中, 敬畏感(T1)可以正向预测亲社会倾向(T2)。 |
| Jiao and Luo (2022) | 亲社会倾向(测量: 亲社会倾向测量, PTM) | 在每个具体的情境中, 特质敬畏对亲社会倾向的预测作用都很显著。 |

表 2: 已遵照专家的意见, 对文章中不严谨的表述进行了修改, 详细的内容见下表, 相应的修改在文中用“绿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让人意外的是, 尽管敬畏常常由非社会性的刺激所引发, 它却具有着深刻的社会效应。 | 让人意外的是, 尽管敬畏常常由非社会性的刺激所引发, 它却具有着深刻的社会效应。典型的敬畏被归类为积极情绪家族中的一员, 因为它最经常被体验为积极的价值(董蕊, 彭凯平, 喻丰, 2013; |

| | |
|--|--|
| | Shiota, Keltner, & Mossman, 2007)。作为一种积极的情绪，敬畏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好处。【2 的第一自然段】 |
| <p>更重要的是，敬畏可以预测各种形式的亲社会行为，包括经济游戏中的慷慨、更多的道德决策、自发的亲社会意图、自然情境中的帮助行为和对时间、金钱甚至血液的捐赠意愿(董蕊, 彭凯平, 喻丰, 2013; Guan, Chen, Chen, Liu, & Zha, 2019; Luo, Zou, Yang, & Yuan, 2022; Piff et al., 2015; Pizarro, et al., 2021; Prade & Saroglou, 2016)。</p> | <p>更重要的是，敬畏似乎对个体的亲社会性产生了广泛的促进作用。这一效应在多种不同的形式的亲社会性测量中得到了支持。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敬畏与个体的亲社会倾向密切相关(Li, Dou, Wang, & Nie, 2019; Lin, Hong, Xiao, & Lian, 2020; Fu et al., 2022; Jiao & Luo, 2022)。此外，它能够促进经济游戏中的慷慨(Piff, Dietze, Feinberg, Stancato, & Keltner, 2015)、自发的亲社会意图(Prade & Saroglou, 2016)和对时间(Guan, Chen, Chen, Liu, & Zha, 2019; Rudd et al., 2012)、金钱(Guan et al., 2019)甚至血液(Luo et al., 2022)的捐赠意愿。这一效应广泛存在于实验室(Meng & Wang, 2022; Yang, Yang, Bao, Liu, & Passmore, 2016)、自然情境(Piff et al., 2015)和社会情境之中(Luo et al., 2022)。【2 的第一自然段】</p> |
| <p>首先，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考察敬畏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是否具有普遍性。</p> | <p>首先，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考察敬畏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是否具有普遍性。虽然大多数研究证实了积极敬畏对亲社会性的促进作用，然而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发现(Joye & Bolderdijk, 2015; Luo, Zou, Yang, & Yuan, 2022; Meng & Wang, 2022)。例如，Joye 和 Bolderdijk (2015)发现敬畏强化了亲社会价值观，但是却没有提高人们帮助受灾者、捐钱、捐物、献血的意愿。鉴于现有研究具有的矛盾性，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检验这一效应的普遍性及边界条件。【讨论的第二自然段】</p> |

参考文献:

- Fu, Y. N., Feng, R. D., Liu, Q., He, Y. M., Turel, O., Zhang, S. Y., & He, Q. H. (2022). Aw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11).
- Guan, F., Chen, J., Chen, O. T., Liu, L. H., & Zha, Y. Z. (2019). Awe and prosocial tendency. *Current Psychology*, 38(4), 1033-1041.
- Jiao, L. M., & Luo, L. (2022). Dispositional awe positively predicts prosocial tendencies: The multiple mediation effects of connectedness and empat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24).
- Joye, Y., & Bolderdijk, J. W. (2015). An exploratory study into the effects of extraordinary nature on emotions, mood, and prosocial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5.

- Li, J. J., Dou, K., Wang, Y. J., & Nie, Y. G. (2019). Why awe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s?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self-transcendence meaning of lif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 Lin, R. M., Chen, Y. P., Shen, Y. L., Xiong, X. X., Lin, N., & Lian, R. (2021). Dispositional awe and online altruism: Testing a moderated mediating model.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 Lin, R. M., Hong, Y. J., Xiao, H. W., & Lian, R. (2020). Dispositional awe and prosocial tendency: The mediating roles of self-transcendent meaning in life and spiritual self-transcendence.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48*(12).
- Luo, L., Zou, R., Yang, D., & Yuan, J. J. (2022). Awe experience triggered by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promotes prosociality through increased feeling of connectedness and empathy.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 Meng, L., & Wang, X. (2022). Awe in the workplace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 *Psych Journal*.
- Piff, P. K., Dietze, P., Feinberg, M., Stancato, D. M., & Keltner, D. (2015). Awe, the small self,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6), 883-899.
- Prade, C., & Saroglou, V. (2016). Awe's effects on generosity and helping.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1*(5), 522-530.
- Rudd, M., Vohs, K. D., & Aaker, J. (2012). Awe expands people's perception of time, alters decision making, and enhances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10), 1130-1136.
- Seo, M. J., Yang, S. Y., & Laurent, S. M. No one is an island: Awe encourages global citizenship identification. *Emotion*.
- Van Lange, P. A. M., Bekkers, R., Schuyt, T. N. M., & Van Vugt, M. (2007). From games to giving: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predicts donations to noble cause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9*(4), 375-384.
- Yang, Y., Yang, Z. Y., Bao, T. X., Liu, Y. Z., & Passmore, H. A. (2016). Elicited awe decreases aggression.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10*.

2. 文章对小我的界定并不清楚，当然这也是以往关于敬畏小我理论常见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小我，自我渺小和减少对自己的关注是否等同？关于小我的界定，学界有不同的意见，如 (Tyson et al, 2021)。作者在提出整合框架前需要把小我概念界定清楚。Courtney Tyson, Matthew J. Hornsey & Fiona Kate Barlow (2021): What does it mean to feel small?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small self, *Self and Identity*, DOI: 10.1080/15298868.2021.1921018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1) 什么是小我，对小我的概念界定？

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我们十分赞同专家的观点，并已根据专家建议的文献以及对一些现有研究的分析(见表 1)对小我的概念加以界定。

目前，不同的研究者对小我的概念有不同的操作，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根据 Tyson(2022)的总结，现有文献通常以三种方式来操作小的问题：感知的自我大小(perceived self-size)、自我减弱感(self-diminishment)和相对于自我的浩瀚感(vastness relative to the self)。感知自我大小是由 Bai 等人(2017)引入的一个测量方法——包括五个项目。其中三个项目是图像性的：它们使用逐渐增长的圆圈、图形或签名来测量被试对自我尺寸大小的感知。此

外，这些项目由两个言语项目补充。“我觉得自己比较渺小”和“我觉得自己无足轻重”。Piff 等人(2015)通过两个维度测量小我的概念，即相对于自我的浩瀚感(对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的感知)和随之而来的自我减弱感(自己的存在和目标相对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自我减弱量表纳入了一个项目，该项目实际上是 Bai 等人(2017)测量中两个言语项目的组合：“我感到渺小和无足轻重”。此外，还包括两个项目，重点围绕个人问题和关切点，即“我觉得我自己的日常关切相对微不足道”和“在宏伟的计划中，我自己的问题和关切并不那么重要”以及一个关于相对于更大的力量感到渺小的项目，“相对于比自己更强大的东西，我感到渺小”；相对于自我的浩瀚感量表包括五个项目。“我觉得有比我自己更强大的东西存在”，“我觉得是某个更大的实体的一部分”，“我觉得我在某个宏大的东西面前”，“我觉得有比我自己更强大的东西存在”，以及“我觉得我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因此，根据 Tyson 等人(2022)的研究，我们认为小我是一种由比自我更浩瀚的刺激物的感知所导致的，一种渺小、自我减弱且无足轻重的感觉(Tyson, Hornsey, & Barlow, 2022)。

小我假说提出这种“小我”是敬畏体验促进亲社会反应的核心机制(Bai et al., 2017; Piff, Dietze, Feinberg, Stancato, & Keltner, 2015)。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小我的概念进行了不同的操作(即相对于自我的浩瀚感、自我减弱感和感知的自我大小)，但小我的中介作用仍得到了实证证据的支持。例如，研究发现观看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图或视频，站在自然中注视高耸的树木，以及每天进行敬畏之行，都有助于产生自我渺小感，并促进个体的亲社会性(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 Sturm et al., 2022)。具体而言，Piff 等人(2015)使用视频法来诱导敬畏感，被试被随机分配到敬畏、娱乐或中性条件中的一个，敬畏条件下，向被试呈现来自 BBC 地球系列的自然片段，该片段由风景优美的远景、山脉、平原、森林和宏大的峡谷所组成。而后，被试完成了对小我的测量，如“我觉得自己很渺小或无足轻重”或“我觉得有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存在”，这些项目反映了相对于自我的浩瀚感(对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的感知)和随之而来的自我减弱感(自己的存在和目标相对来说是无足轻重的)。最后，通过独裁者游戏考察被试的亲社会水平。结果发现，与娱乐和中性条件的被试相比，观看敬畏视频的被试表现得更加慷慨。更重要的是，中介分析表明，上述效应是通过小我来中介的。后续的研究(Bai et al., 2017)进一步采用了一种非言语的方法来测量小我的概念，被称之为感知到的自我大小(perceived self-size)，他们发现经历过敬畏的被试会使用更小的圆圈，画出更小的图形或签署更小的“我”来代表自己，进而促进积极的社会效应，并且这些起源于个人主义文化(即美国)的发现，同样也适用于集体主义文化(即中国)。总之，如上述研究(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所表明的那样，我们认为小我是一种由比自我更浩

瀚的刺激物的感知所导致的，一种渺小、自我减弱且无足轻重的感觉(Tyson et al., 2022)。实证证据也初步证实了“小我假说”的合理性，小我在敬畏与个体亲社会性之间起到了中介的作用。

(2) 自我渺小和减少对自己的关注是否等同？

自我渺小与减少对自己的关注不等同，减小对自我的关注是自我渺小所产生的效应之一，通过使自我变得渺小，敬畏会将注意力从自我身上转移。例如，Bai 等人(2017)通过回忆任务诱导敬畏状态，在他们的研究中被试被随机分配去回忆一个引起敬畏、羞耻或中性状态的特定经历。被试被提供了每种目标情绪的定义、例子和显示目标情绪原型面部表情的表情符号。此外，研究者使用了完整的 5 项感知自我大小量表测量基线的、敬畏体验后的感知自我尺寸；并使用注意力集中问卷(Woody, 1996)的自我关注子量表测量对自我的关注。结果发现，敬畏(与控制条件相比)可以显著预测自我关注水平，该效应由感知的自我尺寸变化所中介。研究表明敬畏通过使自我变得渺小，将人的注意力从自我身上转移开。

表 1：下表对关注敬畏和小我之间关系的部分研究进行了总结，支持了 Tyson(2021)的总结，现有文献通常以三种方式来操作小的问题：感知的自我大小(perceived self-size)、自我减弱感(self-diminishment)和相对于自我的浩瀚感(vastness relative to the self)。

| Study | Awe-IV | Empirical evidence of small self in response to awe |
|------------------------|--|---|
| Bai et al. (2017) | Study 2: daily events - definition provided to participants that includes vastness (pg. 190) | people experiencing awe report smaller self; spiritual experiences lead to smaller sense of self |
| | Study 3: life visits to grandiose sites at national parks | higher awe is correlated with smaller self-drawing |
| | Study 4: BBC nature video | higher awe is correlated with smaller self-drawing |
| | Study 5: BBC nature video | higher awe is correlated with smaller self-drawing; but perceived self size is now equivalent to perceived other size |
| Chirico et al. (2018a) | Watching vast immersive nature scenes | mountains induce stronger sense of small self, although in study called “sense of vastness” but see item-description on pg. 5 |
| Gallgher et al. (2015) | Study 1: simulated space experiment | comes up in participant report |
| | Study 2: virtual space experiment | comes up in participant report |
| Gordon et al. (2017) | Study 5: Positive/threat-based nature video with vast scenes | smaller sense of self in awe condition |
| Joye and Dewitte | High buildings (studies 1a & 1b) | awe is correlated with experienced smallness, as |

| | | |
|--------------------------------|---|---|
| (2016) | | measures by a 7-step rating on the words “small” and “submissive”. |
| Piff et al. (2015) | Study 2: Writing instruction to think of a natural “scene” (examples provided: sunset view from a high place, scene that was beautiful) | Awe increases sense of small self, as measured by one item |
| | Study 3: awe induced via BBC film Planet Earth | Awe increases sense of vastness/small self, as measured by four items |
| | Study 4: watching threatening natural stimuli(threat-awe) or watching droplets of colored water colliding with a bowl of milk (non-nature awe). | Awe increases sense of vastness/small self, as measured by ten items; the 5 self-diminishment items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we |
| Reinerman-Jones et al. (2013). | Awe induced via simulated flight/earth view experiment | Data from 2 participants providing descriptive evidence of small and insignificant self |
| Shiota et al. (2007) | Study 2: describe a beautiful nature scene | vastness/small-self measured via 4 items; increase in awe/nature condition |
| Yang et al. (2016) | Study 2: participants asked to think about the meaning of awe | Awe increases sense of small self, as measured by 10 items of vastness/small-self scale |
| | Study 3: BBC nature video | Awe increases sense of small self, as measured by 10 items of vastness/small-self scale |
| Jiang and Sedikides (2022) | Study 10: present pictures of awe, such as the Northern Lights, and ask subjects to recall awe experiences | Awe participants reported more self-smallness than control ones (self- drawing and two verbal measures) |

表 2: 已遵照专家的意见, 在正文部分作出了修改, 详细的内容见下表, 相应的修改在文中用“绿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小我假说认为, 诱发敬畏体验的浩瀚刺激物会导致个体产生一种“小我”(small self)的感觉, 推动个体的注意力从自我转移至他人, 进而促进了亲社会行为的产生(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 Shiota et al., 2007; Stellar et al., 2017)。 | 对诱发敬畏体验的浩瀚刺激物的感知会促进个体产生一种“小我”(small self)的感觉, 这是一种感到渺小、自我减弱并感到无足轻重的感觉(Tyson et al., 2022)。小我假说提出这种“小我”是敬畏体验促进亲社会反应的核心机制(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小我的概念进行了不同的操作(即相对于自我的浩瀚感、自我减弱感和感知的自我大小), 但小我的中介作用得到了实证证据的支持。【3.1 第一自然段】 |
| 例如, 研究发现观看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图或视频, 站在自然中注视高耸的树木, 以及每天进行敬畏之行, 都有助于产生自我渺小感, 并促进个体的亲社会性(Bai et al., 2017; Joye & Bolderdijk, 2015; Piff et al., 2015; Sturm et al., 2022)。具体而 | 例如, 研究发现观看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图或视频, 站在自然中注视高耸的树木, 以及每天进行敬畏之行, 都有助于产生自我渺小感, 并促进个体的亲社会性(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 Sturm et al., 2022)。具体而言, Piff 等人(2015)使用 |

| | |
|--|---|
| <p>言, Piff 等人(2015)使用视频法来诱导敬畏感,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敬畏、娱乐或中性条件中的一个, 敬畏条件下, 向被试呈现来自 BBC 地球系列的自然片段, 该片段由风景优美的远景、山脉、平原、森林和宏大的峡谷所组成。而后, 被试完成了对小我感的测量, 如“我觉得自己很渺小或无足轻重”。最后, 通过独裁者游戏考察被试的亲社会水平。结果发现, 与娱乐和中性条件的被试相比, 观看敬畏视频的被试表现得更加慷慨。更重要的是, 中介分析表明, 上述效应是通过小我来中介的。后续的研究(Bai et al., 2017)进一步采用了一种非言语的方法来测量小我的构念, 他们发现经历过敬畏的被试会使用更小的圆圈, 画出更小的图形或签署更小的“我”来代表自己, 进而促进亲社会行为; 并且这些起源于个人主义文化(即美国)的发现, 同样也适用于集体主义文化(即中国)。</p> | <p>视频法来诱导敬畏感,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敬畏、娱乐或中性条件中的一个, 敬畏条件下, 向被试呈现来自 BBC 地球系列的自然片段, 该片段由风景优美的远景、山脉、平原、森林和宏大的峡谷所组成。而后, 被试完成了对小我的测量, 如“我觉得自己很渺小或无足轻重”或“我觉得有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存在”, 这些项目反映了相对于自我的浩瀚感(对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的感知)和随之而来的自我减弱感(自己的存在和目标相对来说是无足轻重的)。最后, 通过独裁者游戏考察被试的亲社会水平。结果发现, 与娱乐和中性条件的被试相比, 观看敬畏视频的被试表现得更加慷慨。更重要的是, 中介分析表明, 上述效应是通过小我来中介的。后续的研究(Bai et al., 2017)进一步采用了一种非言语的方法来测量小我的构念, 被称之为感知到的自我大小(perceived self-size), 他们发现经历过敬畏的被试会使用更小的圆圈, 画出更小的图形或签署更小的“我”来代表自己, 进而促进积极的社会效应, 并且这些起源于个人主义文化(即美国)的发现, 同样也适用于集体主义文化(即中国)。总之, 如上述研究(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所表明的那样, 我们认为小我是一种由比自我更浩瀚的刺激物的感知所导致的, 渺小、自我减弱且无足轻重的感觉(Tyson et al., 2022)。实证证据也初步证实了这种小我感在敬畏的亲社会效应中起到的中介作用。【3.1 第一自然段】</p> |
|--|---|

参考文献:

- Bai, Y., Maruskin, L. A., Chen, S., Gordon, A. M., Stellar, J. E., McNeil, G. D., . . . Keltner, D. (2017). Awe, the diminished self, and collective engagement: Universals and cultural variations in the small 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2), 185-209.
- Chirico, A., Ferrise, F., Cordella, L., & Gaggioli, A. (2018). Designing awe in virtual reality: An experimental stud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2351.
- Gallgher, S., Reinerman-Jones, L., Janz, B., Bockelman, P., & Trempler, J. (2015). *A neurophenomenology of awe and wonder. Towards a non-reductionist cognitive scienc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Gordon, A. M., Stellar, J. E., Anderson, C. L., McNeil, G. D., Loew, D., & Keltner, D. (2017). The dark side of the sublime: Distinguishing a threat-based variant of aw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2), 310-328.
- Jiang, T. L., & Sedikides, C. (2022). Awe motivates authentic-self pursuit via self-transcendence: implications for

- prosoci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3(3), 576-596.
- Joye, Y., & Dewitte, S. (2016). Up speeds you down. Awe-evoking monumental buildings trigger behavioral and perceived freezing.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47, 112-125.
- Piff, P. K., Dietze, P., Feinberg, M., Stancato, D. M., & Keltner, D. (2015). Awe, the small self,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6), 883-899.
- Reinerman-Jones, L., Sollins, B., Gallagher, S., & Janz, B. (2013). Neurophenomenology: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exploring awe and wonder.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32(4), 295-309.
- Shiota, M. N., Keltner, D., & Mossman, A. (2007). The nature of awe: Elicitors, appraisals, and effects on self-concept. *Cognition & Emotion*, 21(5), 944-963.
- Sturm, V. E., Datta, S., Roy, A. R. K., Sible, I. J., Kosik, E. L., Veziris, C. R., . . . Keltner, D. (2022). Big smile, small self: Awe walks promote prosocial positive emotions in older adults. *Emotion*, 22(5), 1044-1058.
- Tyson, C., Hornsey, M. J., & Barlow, F. K. (2022). What does it mean to feel small?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small self. *Self and Identity*, 21(4), 387-405.
- Woody, S. R. (1996). Effects of focus of attention on anxiety levels and social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s with social phobia.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5(1), 61-69.
- Yang, Y., Yang, Z. Y., Bao, T. X., Liu, Y. Z., & Passmore, H. A. (2016). Elicited awe decreases Aggression.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10.

3. 与 Perlin and Li (2021)的文章类似，作者试图通过 McAdam 的 actor, agent, author 的角度去理解敬畏对自我的影响，并试图整合敬畏的小我和真我理论。我认为这个框架可以帮助理解敬畏对自我的影响，但却不是一个理想的能够整合敬畏小我和真我理论的框架。重要的是为什么小我属于 actor，不论在理论上，逻辑上和实证证据上都不具有说服力。在 actor 层面，"in which people play roles, follow scripts, enact routines, and manage the audience's impressions"(McAdam, 2013)。从这个角度，actor 层面也涉及真实自我的内容，参见 Sedikides, Woods 等人关于真实自我的研究。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我们十分赞同审稿专家的意见，小我与 actor、真实自我与 agent 之间可能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Perlin 和 Li(2021)认为自我渺小的含义可以在自我的三个层次上(actor, agent, author)都得到澄清。此外，真实自我的概念是十分复杂的。例如，心理学家们认为真实性(authenticity)这个词可以指代几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从整个领域来看，现有的真实性方法可分为四大类：自我一致性(self-congruence)、以人为本的方法(person-centered approach)、内在驱动的行为(intrinsically motivated behavior)和真实性的主观感受(subjective feelings of authenticity)(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从自我一致性的角度考虑，真实性被认为可以表现为人们的行为在不同场合或社会角色中的一致性程度，那么似乎 actor 层面也涉及真实自我的内容。

因此，我们对本文的理论框架进行了修改，尝试在对情绪的社会功能框架下系统地探讨了不同的自我因素(小我与真实自我)在敬畏的亲社会效应中所发挥的作用。情绪的社会功能方法关注情绪所具有的社会功能(Niedenthal & Brauer, 2012)。在这一框架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情绪会影响与自我相关的认知，从而使个体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直接环境中的关系动态(Campos, Campos, & Barrett, 1989; DeSteno & Salovey, 1997; Keltner & Haidt, 2003; Lazarus, 1991)。因此，这一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情绪如何通过对自我的影响促进个体适应特定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即情绪通过影响自我实现其社会功能的过程)。研究发现，短暂的情绪状态可以以系统的方式对自我产生影响，进而实现其社会功能(Oveis, Horberg, & Keltner, 2010; Tracy, Weidman, Cheng, & Martens, 2014)。例如，自豪感会引起对自我更加积极甚至膨胀的看法，使自我在等级制度中处于较高的位置，并用来表示个体对他人的权力和影响(Tracy & Robins, 2007)；而尴尬和羞耻感则降低了个人的等级感，使自我在等级制度中处于较低的地位，直至和解行为的出现以促进个体恢复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Feinberg, Willer, & Keltner, 2012)。可见，情绪的社会功能取向强调情绪可以通过影响自我这一核心中介促进人类在群体中生活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Bai et al., 2017)。那么，敬畏的亲社会效应是否是通过自我这一核心机制起作用的？研究者们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指出小我和真我这两种自我因素是解释敬畏对亲社会性促进作用的重要因素(Jiang & Sedikides, 2022; Piff et al., 2015; Shiota et al., 2007; Stellar, 2021)。

此外，正如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议，尽管小我与真实自我无法在 McAdams 的心理自我模型下进行统合，但这一模型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敬畏对自我的影响。对于小我与真我在敬畏促进亲社会行为中的作用，需要未来研究在理论和实证的层面进一步丰富与完善。小我研究强调敬畏会减少自我导向的关注，进而增加他人导向的关注，这种注意转移将自我导向的关注与他人导向的关注对立了起来(Perlin & Li, 2020)。然而，人类是在合作的、相互依赖的环境中进化的，在这种环境中，关注自我和关注他人是无法分离的，它们密切地交织在一起(Over, 2016)。人类的关注点不仅包括“我-关注”(即对自己福祉的自私关注)和“你-关注”(即对他人的亲社会关注)，还包括“我们-关注”(即对相互依赖的、与我们的利益有关的集体关注)(Tomasello, 2016, 2019)。因此，敬畏所增加的可能不是面向他人的“你-关注”，而是相互依赖的“我们-关注”；即敬畏通过将“我-关注”转移至“我们-关注”促进了亲社会行为。那么，这一观点是否成立，需要未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予以进一步考察。对于真我的研究需要关注的是，真实自我往往包含着许多相互矛盾的成分，有好的、社会期望的部分和坏的、违背社会期望的部分(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那么敬

畏如何通过真我来促进亲社会行为呢？从心理自我模型提出的能动自我角度来理解真实自我将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依据心理自我模型(McAdams, 2013, 2020)可知，能动的自我具有前瞻性和未来导向性，由不同层次的动机(包括长期目标、价值观、个人奋斗和具体个人事件等)组成，并会对个体所追求的目标产生强烈的影响。敬畏则促进了对个体能动自我中的高层次动机的关注，并减弱了对低层次动机的关注(Bai et al., 2021; Shiota et al., 2007; 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因为人们的社会理想动机往往比社会不理想动机在目标层级中更重要、更优先，所以通过促进目标层级中的高层次动机，敬畏激励了对真实自我中好的、社会期待的部分的追求，最终导致了亲社会行为。该观点虽然在动机的层面上细化了真我在敬畏亲社会效应中的作用，但是否经得起检验还需要未来实证研究予以深入考察。

已在正文修改了相关论述，详细内容见下表, 相应位置在文中用“绿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修改前的逻辑框架： 1.敬畏 2.敬畏的亲社会效应 3.敬畏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 3.1 小我假说 3.2 真我假说 3.3 小我与真我的整合机制 4.小结与展望 | 修改后的逻辑框架： 1.敬畏 2.敬畏的亲社会效应 3.敬畏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 3.1 小我假说 3.2 真我假说 4.小结与展望 |
| 为什么敬畏能促进亲社会行为？建立在实证证据基础上，研究者们先后提出了小我假说与真我假说予以回答。 | 依据情绪的社会功能取向 (social functional approach to emotions)的理论观点可知，情绪会影响自我相关的认知，从而使个体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Bai et al., 2017; Campos, Campos, & Barrett, 1989; DeSteno & Salovey, 1997; Keltner & Haidt, 2003; Lazarus, 1991)。研究发现，短暂的情绪状态可以以系统的方式对自我产生影响，进而实现其社会功能(Oveis, Horberg, & Keltner, 2010; Tracy, Weidman, Cheng, & Martens, 2014)。例如，自豪会引起个体对自我更加积极甚至膨胀的看法，进而促使个体展示权力并对他人施加影响 (Tracy & Robins, 2007)；而尴尬和羞耻感则会降低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直至和解行为的出现以促进个体恢复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Feinberg, Willer, & Keltner, 2012)。可见，情绪的社会功能取向强调情绪可以通过影响自我这一核心中介促 |

| | |
|--|--|
| | <p>进人类在群体中生活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Bai et al., 2017)。那么, 敬畏的亲社会效应是否是通过自我这一核心机制起作用的? 研究者们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并指出小我和真我这两种自我因素是解释敬畏对亲社会性促进作用的重要因素(Jiang & Sedikides, 2022; Piff et al., 2015; Shiota et al., 2007; Stellar, 2021)。【3 的第一自然段】</p> |
| <p>其次, 对于敬畏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 虽然小我研究和真我研究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但是它们各有其不足, 未来需要在统合性理论视角下展开更多的实证研究。本文提出的整合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小我假说和真我假设的不足。具体来说, 在社会角色自我层面上展开的思考有望弥补小我研究将自我导向的关注和他人导向的关注对立起来的不足。Perlin 和 Li(2020)认为, 小我研究强调敬畏会减少自我导向的关注, 进而增加他人导向的关注, 这种注意转移将自我导向的关注与他人导向的关注对立起来。而事实上, 人类是在合作的、相互依赖的环境中进化的, 在这种环境中, 关注自我和关注他人是无法分离的, 它们密切地交织在一起(Perlin & Li, 2020; Tomasello, 2016, 2019)。因此, 人类的关注点不仅包括“我-关注”(即对自己福祉的自私关注)和“你-关注”(即对他人的亲社会关注), 还包括“我们-关注”(即对相互依赖的、与我们的利益有关的集体关注)(Tomasello, 2016, 2019)。那么敬畏所增加的可能不是面向他人的“你-关注”, 而是相互依赖的“我们-关注”(Chen & Mongrain, 2021; Chirico & Yaden, 2018; Pizarro et al., 2021; Yaden et al., 2017)。敬畏正是通过将“我-关注”转移至“我们-关注”促进了亲社会行为。在能动自我的层面上思考敬畏对真实自我的作用将有望弥补真我研究的不足。真我研究认为一般的亲社会行为是与人们的真实自我和关键价值相一致的行为, 追求真实的动机的增加意味着亲社会动机的增加。然而, 人类的真实自我似乎往往包含着许多相互矛盾的动机, 有好的、社会期望的部分和坏的、违背社会期望的部分(Oyserman, Elmore, & Smith, 2012)。也就</p> | <p>第二, 对于小我与真我在敬畏促进亲社会行为中的作用, 需要未来研究在理论和实证的层面进一步丰富与完善。小我研究强调敬畏会减少自我导向的关注, 进而增加他人导向的关注, 这种注意转移将自我导向的关注与他人导向的关注对立了起来(Perlin & Li, 2020)。然而, 人类是在合作的、相互依赖的环境中进化的, 在这种环境中, 关注自我和关注他人是无法分离的, 它们密切地交织在一起(Over, 2016)。人类的关注点不仅包括“我-关注”(即对自己福祉的自私关注)和“你-关注”(即对他人的亲社会关注), 还包括“我们-关注”(即对相互依赖的、与我们的利益有关的集体关注)(Tomasello, 2016, 2019)。因此, 敬畏所增加的可能不是面向他人的“你-关注”, 而是相互依赖的“我们-关注”; 即敬畏通过将“我-关注”转移至“我们-关注”促进了亲社会行为。那么, 这一观点是否成立, 需要未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予以进一步考察。对于真我的研究需要关注的是, 真实自我往往包含着许多相互矛盾的成分, 有好的、社会期望的部分和坏的、违背社会期望的部分(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 那么敬畏如何通过真我来促进亲社会行为呢? 从心理自我模型提出的能动自我角度来理解真实自我将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依据心理自我模型(McAdams, 2013, 2020)可知, 能动的自我具有前瞻性和未来导向性, 由不同层次的动机(包括长期目标、价值观、个人奋斗和具体个人事件等)组成, 并会对个体所追求的目标产生强烈的影响。敬畏则促进了对个体能动自我中的高层次动机的关注, 并减弱了对低层次动机的关注(Bai et al., 2021; Shiota et al., 2007; 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因为人们的社会理想动机往往比社会不理想动机在目</p> |

是说，真实的自我不一定是亲社会的自我。那么敬畏为什么可以通过对真实自我的激励来促进亲社会行为呢？在能动自我的层面上思考，这可能是因为在人们的社会理想动机往往比社会不理想动机在目标层级中更重要，更优先 (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因此，通过促进目标层级中的高层次动机，敬畏激励了对真实自我中好的、社会期待的部分的追求，最终导致了亲社会行为。然而，这种整合机制目前还停留在理论假设层面，需要更多实证研究阐明其合理性。

标层级中更重要、更优先，所以通过促进目标层级中的高层次动机，敬畏激励了对真实自我中好的、社会期待的部分的追求，最终导致了亲社会行为。该观点虽然在动机的层面上细化了真我在敬畏的亲社会效应中发挥的作用，但是否经得起检验还需要未来实证研究予以深入考察。【4 小结与讨论的第三自然段】

参考文献:

- Bai, Y., Maruskin, L. A., Chen, S., Gordon, A. M., Stelar, J. E., McNeil, G. D., Peng, K., & Keltner, D. (2017). Awe, the diminished self, and collective engagement: Universals and cultural variations in the small 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2), 185–209.
- Bai, Y., Ocampo, J., Jin, G., Chen, S., Benet-Martinez, V., Monroy, M., Anderson, C., & Keltner, D. (2021). Awe, daily stress, and elevated lif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0*(4), 837–860.
- Campos, J. J., Campos, R. G., & Barrett, K. C. (1989). Emergent themes in the study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 and emotion regula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5*(3), 394–402.
- DeSteno, D. A., & Salovey, P. (1997). The effects of mood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self-concept. *Cognition & Emotion, 11*(4), 351–372.
- Feinberg, M., Willer, R., & Keltner, D. (2012). Flustered and faithful: Embarrassment as a signal of prosoci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1), 81–97.
- Jiang, T. L., & Sedikides, C. (2022). Awe motivates authentic-self pursuit via self-transcendence: Implications for prosoci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3*(3), 576–596.
- Jongman-Sereno, K. P., & Leary, M. R. (2019). The enigma of being yourself: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uthenticity.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3*(1), 133–142.
- Keltner, D., & Haidt, J. (2003). Approaching awe, a moral,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emotion. *Cognition & Emotion, 17*(2), 297–314.
- Lazarus, R. S. (1991). Progress on a cognitive motivational relation theory of emo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6*(8), 819–834.
- McAdams, D. P. (2013). The psychological self as actor, agent, and author.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8*(3), 272–295.
- McAdams, D. P. (2020). Psychopathology and the self: Human actors, agents, and autho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8*(1), 146–155.
- Niedenthal, P. M., & Brauer, M. (2012). Social functionality of human emo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3*, 259–285.
- Over, H. (2016). The origins of belonging: Social motivation in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71*, 20150072.
- Oveis, C., Horberg, E. J., & Keltner, D. (2010). Compassion, pride, and social intuitions of self-other similar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8*(4), 618–630.

- Perlin, J. D., & Li, L. (2020). Why does awe have prosocial effects? New perspectives on awe and the small self.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2), 291-308.
- Piff, P. K., Dietze, P., Feinberg, M., Stancato, D. M., & Keltner, D. (2015). Awe, the small self,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6), 883-899.
- Shiota, M. N., Keltner, D., & Mossman, A. (2007). The nature of awe: Elicitors, appraisals, and effects on self-concept. *Cognition & Emotion, 21*(5), 944-963.
- Stellar, J. E. (2021). Awe helps us remember why it is important to forget the self.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501*(1), 81-84.
- Tomasello, M. (2016). *A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moral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omasello, M. (2019). *Becoming human: A theory of ontogen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racy, J. L., & Robins, R. W. (2007). The self in self-conscious emotions: A cognitive appraisal approach. In J. L. Tracy, R. W. Robins, & J. P. Tangney (Eds.), *Th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eory and research* (pp. 3–20).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Tracy, J. L., Weidman, A. C., Cheng, J. T., & Martens, J. P. (2014). The fundamental emotion of success, power, and status. In M. M. Tugade, M. N. Shiot, & L. D. Kirby (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emotions* (p. 2014).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Van Cappellen, P., & Saroglou, V. (2012). Awe activates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feeling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4*(3), 223-236.

4. 研究发现敬畏不是通过小我影响真实自我的，以及敬畏通过小我促进亲社会性，并不能以此推知敬畏通过小我和真实自我并行中介影响亲社会性。

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我们十分赞同审稿专家的意见。对于敬畏促进亲社会性的心理机制，小我研究和真我研究分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从整体上看，两种机制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小我和真实自我都被认为是敬畏影响亲社会性的心理机制，并且初步的实证证据表明敬畏不是通过小我影响真实自我的(Jiang & Sedikides, 2022; Piff et al., 2015)。我们因此推论敬畏通过平行的路径引发了小我与真我的改变，进而导致了亲社会行为的产生。但这种推论是不合理的，仍存在其他可能的解释。例如，在敬畏与亲社会性间可能存在某些边界条件，在不同的边界条件下，敬畏通过触发不同的心理机制以影响个体的亲社会倾向的产生。

现有研究只能表明，小我和真实自我是两种独立的机制，敬畏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路径促进一般的亲社会性。其中，小我是被以往研究所认可的通向一般亲社会性的一条路径(Joye & Bolderdijk, 2015; Piff et al., 2015)；而在近期，研究者通过强掉对真实自我的追求探明了通向一般亲社会性的一条路径。

已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在正文中对相应的内容进行修改，相应位置在文中用“绿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p>心理自我模型进一步认为不同层次的自我总是同时出现，一个在心理上完全成熟的成年人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都是同时作为不同层次的自我而存在的(McAdams, 2013, 2020)。基于上述理论，个体的社会角色自我和能动自我总是作为不同层次的自我同时存在，因此我们预期敬畏会通过平行的路径同时引发了社会角色自我(使其更渺小)与能动自我(使其更真实)的变化进而导致了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初步的实证证据也表明，敬畏通过平行的路径引发了小我与真我的改变，进而导致了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具体来说，研究者在实验条件下向被试展示了六张预先测试过的、能引起敬畏感的图片。这些图片描绘了各种场景(例如，北极光，富士山顶上的银河系)。然后让被试回忆与图片中描述的任意一个场景有关的经历，并尽可能详细地写出至少五句话来描述这种经历，伴随的情绪，以及在经历中思考的问题。在控制条件下向被试展示了六张描绘日常生活场景的图片(例如，洗衣房、客厅)。然后，让他们回忆上次洗衣服的情景，并尽可能详细地写出至少五句话，描述当时的经历、伴随的情绪以及在经历中所思考的问题。接着，通过量表测量被试的小我、真我与亲社会性。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真我在敬畏与亲社会性之间起中介作用；而小我并不能中介敬畏对真我的影响，也就是说敬畏通过影响小我进而影响真我导致亲社会性的这条链式中介并不成立(Jiang & Sedikides, 2022)。此外，大量研究发现小我在敬畏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Bai et al., 2017; Joye & Bolderdijk, 2015; Piff et al., 2015; Sturm et al., 2022)。因此，基于已有的证据与 McAdams(2013)的自我模型似乎可以将小我假说与真我假说加以整合，由敬畏导致的小我与真我可能会通过平行的两条路径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p> | <p>真我假说克服了小我假说解释力不足的问题，那么真我假说能取代小我假说吗？亦或说，在解释敬畏的亲社会效应的路径中，小我与真我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初步研究证实，真我不能取代小我，小我与真我在敬畏的亲社效应中起到独立的中介作用 (Jiang & Sedikides, 2022)。具体来说，研究者在实验条件下向被试展示了六张预先测试过的、能引起敬畏感的图片。这些图片描绘了各种场景(例如，北极光，富士山顶上的银河系)。然后让被试回忆与图片中描述的任意一个场景有关的经历，并尽可能详细地写出至少五句话来描述这种经历，伴随的情绪，以及在经历中思考的问题。在控制条件下向被试展示了六张描绘日常生活场景的图片(例如，洗衣房、客厅)。然后，让他们回忆上次洗衣服的情景，并尽可能详细地写出至少五句话，描述当时的经历、伴随的情绪以及在经历中所思考的问题。接着，通过量表测量被试的小我、真我与亲社会性。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真我在敬畏与亲社会性之间起中介作用；而小我并不能中介敬畏对真我的影响，也就是说敬畏通过影响小我进而影响真我导致亲社会性的这条链式中介并不成立(Jiang & Sedikides, 2022)。此外，自我超越被认为是真实自我追求的先决条件，研究者发现敬畏对自我超越与自我渺小的影响是彼此独立的(Jiang & Sedikides, 2022)。总之，小我和真实自我是两种独立的机制，敬畏将通过真我与小我两种不同的路径促进亲社会行为。</p> <p>【3.4的第四自然段】</p> |

参考文献：

Jiang, T., & Sedikides, C. (2022). Awe motivates authentic-self pursuit via self-transcendence: Implications for prosoci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3(3), 576–596.

Joye, Y., & Bolderdijk, J. (2015). An exploratory study into the effects of extraordinary nature on emotions, mood, and prosocial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5, 1577.

Piff, P. K., Dietze, P., Feinberg, M., Stancato, D. M., & Keltner, D. (2015). Awe, the small self,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6), 883–899.

5. 研究讨论不充分。什么是第三次分配？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先后指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那么什么是第三次分配呢？与通过向市场提供生产要素所取得的收入的初次分配，以及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扶贫及社会保障统筹等方式来进行的再分配不同，**第三次分配是出于道德力量的分配。**

它是一个本土化的概念，最初由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提出，认为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就是第三次分配(厉以宁, 1993)。随着认识的深入，它的内涵不断丰富，当前研究者们普遍倾向于认为第三次分配主要是指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活动等方式**，进行扶贫济困、关怀弱势群体，以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配置的行为(白光昭, 2020; 梁朋, 2020)。可见，第三次分配的本质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它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历程的一个重要标杆和实践范畴，又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理论概念(王名等, 2020)。甚至，有研究者将第三次分配喻为是一只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温柔之手”，建立在自愿性的基础上，以自愿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苏京春, 2021)。**其中，慈善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基础及主要载体**(邓国胜, 2021)。

那么，在第三次分配战略的实施的大背景下，充分发挥敬畏对捐赠等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干预作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这将有助于推进第三次分配的战略实施，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这一问题提供心理学方案。

已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在正文中补充了关于第三次分配的内容，相应位置在文中用

“绿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那么，在第三次分配战略的实施下，如何激发出我国国民的捐赠等亲社会行为需要更深入的探索。 | 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非强制方式进行的再一次分配(厉以宁, 1993)。干预策略的开发可为推进以慈善捐赠作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战略提供科学心理学方案。【讨论的最后一段】 |

参考文献:

白光昭. (2020). 第三次分配：背景、内涵及治理路径. *中国行政管理*, (12), 120-124.

邓国胜. (2021). 第三次分配的价值与政策选择. *人民论坛*, (24), 42-45.

厉以宁. (1993). 发展市场经济与为人民服务.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10), 6.

梁朋. (2020). 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02), 33-36.

苏京春. (2021). 客观认识第三次分配. *金融博览*, (11), 16-17.

王名, 蓝煜昕, 王玉宝, 陶泽. (2020). 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 *中国行政管理*, (03), 101-105.

6. 小问题： Rivera et al., 2019 并没有发现一致的证据支持敬畏对意义感的提升作用。相反，他们认为敬畏总体来讲不会提升意义感，这是由于快乐和小我的竞争中介带来的。

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这里提及敬畏与生命意义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了举例证明，敬畏对于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都产生了好处。然而，正如专家指出的那样，Rivera 等人(2019)没有发现一致的证据支持敬畏对意义感的提升作用。然而，Dai 等人(2022)则发现在总体上敬畏增加了生命意义感，这主要是由目的追求的中介效应所驱动的，但他们同样认为敬畏将以一种复杂方式影响着生命意义感。

这一问题是由于我们的疏忽所导致的。因此，鉴于现有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我们对于这部分的所引用的参考文献予以修改。相应位置在文中用“绿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敬畏可以降低个体的自我意识(Piff et al., 2015; Shiota et al., 2007)，使人们感到与他人和集体紧密相连(Bai et al., 2017)，并增强生命意义感(Rivera, Vess, Hicks, & Routledge, 2020) | 敬畏可以降低个体的自我意识(Piff et al., 2015; Shiota et al., 2007)，使人们感到与他人和集体紧密相连(Bai et al., 2017)，并增强生命意义感(Dai, Jiang, & Miao, 2022)【2的第一自然段】 |

参考文献:

Dai, Y. W., Jiang, T. L., & Miao, M. (2022). Uncovering the effects of awe on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3(7), 3517-3529.

Rivera, G. N., Vess, M., Hicks, J. A., & Routledge, C. (2019). Awe and meaning: Elucidating complex effects of awe experiences on meaning in lif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0(2), 392-405.

7. 关于基于恐惧的敬畏讨论并不充分，建议查看相关最新研究。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进一步查阅了关注基于威胁的敬畏的最新研究，对本文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先前的多数研究都认为敬畏是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Cao, Wang, & Wang, 2020; Piff et al., 2015)。然而，在近期开展的部分研究关注了敬畏的消极方面——基于威胁的敬畏。这是一种带有恐惧色彩的敬畏，通常由自然灾害(如海啸和龙卷风)或专制的独裁者所诱发(Gordon et al., 2017)。基于威胁的敬畏将如何增加(或减少)亲社会性？目前的研究认为消极敬畏与亲社会性之间存在有两条不同的途径，每条途径各有不同的运作机制(Piff et al., 2015; Seo et al., 2022; 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 Wang et al., 2022)。一方面，部分研究主要强调它与积极敬畏的相似性，认为基于威胁的敬畏同样可以导致更高的亲社会性，这种效应是由小我感(觉得自己是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并觉得自己的问题和日常关注的问题变得无足轻重)所中介的(Piff et al., 2015; Seo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22)。另一方面，鉴于这种敬畏的消极变体与恐惧、较低自我控制和较高的情境控制有关(Chaudhury et al., 2022; Gordon et al., 2017)，研究者认为这种感觉可能导致较低的亲社会性，这种效应是由无力感所中介的(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et al., 2022)。较低的控制感可能导致无力感的增强(Gordon et al., 2017; 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这有助于阐明为什么基于威胁的敬畏会限制亲社会性。如果人们觉得他们缺乏足够的效能来改变现状，他们可能不会追求亲社会行为(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et al., 2022)。因此，高水平的威胁敬畏可能会减少亲社会行为，因为个人感到无能为力。对此，建构水平和内隐理论可能是有效的调节变量。研究发现向被试呈现高建构水平的广告(强调“为什么”)时，经历威胁敬畏的被试报告了更高的捐赠意向(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此外，当面临基于威胁的敬畏时，具有增长(相对于实体)理论的个体认为他们的捐赠有更高的效能，因此做出更多的捐赠(Septianto, Seo, et al., 2022)。自然灾害是基于威胁的敬畏的重要诱因(Gordon et al., 2017; Keltner &

Haidt, 2003; Piff et al., 2015); 这些灾害产生了巨大的受助需求。因此, 在未来利用调节变量以发挥威胁敬畏对于捐赠等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已遵照专家的意见, 参考相关最新研究对文章内容进行了补充, 相应的修改在文中用“绿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p>综上所述, 目前的多数实证研究都集中在敬畏的积极方面。然而, 在近期开展的部分研究关注了敬畏的消极方面——基于威胁的敬畏。研究发现消极敬畏同样可以促进亲社会行为(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1)。</p> | <p>综上所述, 先前的多数研究都认为敬畏是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Cao, Wang, & Wang, 2020; Piff et al., 2015)。然而, 在近期开展的部分研究关注了敬畏的消极方面——基于威胁的敬畏。这是一种带有恐惧色彩的敬畏, 通常由自然灾害(如海啸和龙卷风)或专制的独裁者所诱发(Gordon et al., 2017)。基于威胁的敬畏将如何增加(或减少)亲社会性? 以往的研究主要强调它与积极敬畏的相似性, 认为基于威胁的敬畏同样可以促进亲社会性(Guan et al., 2019; Piff et al., 2015; Seo, Yang, & Laurent, 2022; Wang, Qu, Guo, & Wang, 2022)。【2效应的第二自然段】</p> |
| <p>总之, 上述发现说明了敬畏可以以一种广泛的方式影响亲社会行为。</p> | <p>尽管我们主要关注敬畏积极效应, 上述研究仍为威胁敬畏的亲社会效应提供了直接的实证证据。这些研究也有一定的不足, 它们仅仅强调了基于威胁的敬畏与典型积极敬畏的相似性, 而没有探索这些变体之间的区别(Septianto, Nasution, Arnita, & Seo, 2022)。总之, 本文主要关注典型的、积极的敬畏, 目的是概述典型的积极敬畏的亲社会好处, 在大多数研究中这种敬畏被发现可以促进个体的亲社会性。【2效应的第二自然段】</p> |
| <p>事实上,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敬畏的解释同时包含了“敬”和“畏”的双重内涵, 指既敬重又畏惧(赵欢欢等, 2019)。最近的研究中会把掺杂着恐惧的敬畏与以往积极形式的敬畏进行对比(Gordon et al., 2017; Jiang et al., 2018; Piff et al., 2015)。有研究者指出基于威胁的敬畏体验可能会产生与积极的敬畏体验不一致的效应, 敬畏的黑暗面可能会通过小我对社会行为产生负面的效应(Gordon et al., 2017)。在消极的敬畏体验使自我变得渺小的情况下, 人们可能会为了追求集体利益而从事社会破坏性行为。同样通过对小我的影响, 消极敬畏可</p> | <p>更重要的是, 关于威胁的敬畏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亲社会行为则存在更大争议, 需要未来研究从理论与实证上予以澄清。具体来说, 一些研究强调它与积极敬畏的相似性, 认为基于威胁的敬畏同样可以导致更高的亲社会性(Piff et al., 2015; Seo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22)。然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 威胁的敬畏与恐惧、较低的自我控制和较高的情境控制有关, 这将导致较低的亲社会性; 因为较低的控制感可能导致无力感的增强, 当人们觉得他们缺乏足够的效能来改变现状, 就不会产生亲社会行为(Septianto, Nasution, et al.,</p> |

| | |
|---|---|
| <p>能预测了针对内群体的有益行为，包括各类亲社会行为；而针对外群体，消极敬畏则可能预测了更多的有害行为，包括外群体偏见、攻击。例如，在非个体化的群体背景下，特定的宗教敬畏可能会削弱个体的自我，并煽动个人进行自杀式恐怖袭击(Bai et al., 2017)。此外，尽管在金钱捐赠方面，积极与消极敬畏均可以促进被试产生更多的捐赠行为(Guan et al., 2019)；但对于志愿时间的捐赠，两种敬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应，实验性地诱导积极的敬畏而不是消极的敬畏，可以促使个体付出更多的志愿时间(Guan et al., 2019; Rudd, Vohs, & Aaker, 2012)。鉴于现有研究具有的矛盾性，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检验这一效应的普遍性及边界条件。</p> | <p>2022; Septianto, Seo, et al., 2022)。对此，未来研究要深入考察不同类型的敬畏，尤其是基于威胁敬畏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以明确敬畏亲社会效应的普遍性。【4 小结与展望的第二自然段】</p> |
|---|---|

参考文献:

- Cao, F., Wang, X., & Wang, Z. (2020). Effects of awe on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healthy versus unhealthy food products.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 19*(3), 264–276.
- Chaudhury, S. H., Garg, N., & Jiang, Z. X. (2022). The curious case of threat-awe: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conceptualization. *Emotion, 22*(7), 1653–1669.
- Gordon, A. M., Stellar, J. E., Anderson, C. L., McNeil, G. D., Loew, D., & Keltner, D. (2017). The dark side of the sublime: Distinguishing a threat-based variant of aw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2), 310–328.
- Guan, F., Chen, J., Chen, O., Liu, L., & Zha, Y. (2019). Awe and prosocial tendency. *Current Psychology, 38*(4), 1033–1041.
- Keltner, D., & Haidt, J. (2003). Approaching awe, a moral,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emo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17*(2), 297–314.
- Piff, P. K., Dietze, P., Feinberg, M., Stancato, D. M., & Keltner, D. (2015). Awe, the small self,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6), 883–899.
- Seo, M. J., Yang, S. Y., & Laurent, S. M. (2022). No one is an island: Awe encourages global citizenship identification. *Emotion*.
- Septianto, F., Nasution, R. A., Arnita, D., & Seo, Y. (2022). The role of threat-based awe and construal level in charitable advertising.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56*(5), 1532–1555.
- Septianto, F., Seo, Y., & Paramita, W. (2022). The role of implicit theories in motivating donations in response to threat-based awe.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 41*(1), 72–88.
- Wang, M., Qu, X., Guo, C., & Wang, J. (2022). Awe elicited by natural disasters and willingness to help people in afflicted areas: A meditational model. *Current Psychology*.

第三轮

审稿专家 1 意见：

作者已根据意见进行大量的修改，文章质量得到了大幅提高。同意发表！另请作者注意检查一些低级错误，如参考文献格式有些不规范，没页码的要给 doi，预出版的也要注明并给出 doi。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已经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对参考文献部分加以修改，详见参考文献“橙色”部分。

审稿专家 3 意见：

本综述对小我和真我在敬畏的亲社会效应中的机制作用展开了梳理，对该领域的研究者有较好的启示，作者对前一轮两位专家的修改意见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且做了细致的阐述。但文章还存在以下问题，部分修改意见并不能很好地回应和解答前面专家提出来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和归纳，如敬畏导致的亲社会行为的归类，五大类型敬畏与亲社会行为的结果，小我和真我在其中的关系及两者的关系这几个核心问题。

1. 第三次分配方案在第一次提到时，请做出相关阐释，而不是在最后出现时解释，前面出现时就让人费解。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已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做出了修改，在文中第一次提及第三次分配方案时对其主要含义做出了阐释，相应位置在文中用“橙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基于小我假说与真我假说，本文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回答，系统地探讨了自我不同方面在敬畏的亲社会效应中所发挥的作用，以期为促进捐赠等亲社会行为，更有效地推进第三次分配的战略实施提供心理学方案。 | 基于小我假说与真我假说，本文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回答，系统地探讨了自我不同方面在敬畏的亲社会效应中发挥的作用，以期为推进以慈善捐赠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战略的实施提出心理学建议。第三次分配是指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非强制方式进行的再一次分配(厉以宁, 1993)。其中，慈善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基础及主要载体(邓国胜, 2021)。那么，在国家大力推进第三次分配战略的 |

| | |
|--|---|
| | 大背景之下，充分发挥敬畏的积极作用并开发出有效的干预策略，可为推进以慈善捐赠作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战略的实施提供科学的心理学方案。 【引言】 |
|--|---|

参考文献:

邓国胜. (2021). 第三次分配的价值与政策选择. *人民论坛*, (24), 42-45.

厉以宁. (1993). 发展市场经济与为人民服务.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10), 6.

2. 文中在提到五大边缘特征时，也请做出适当解释。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已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做出了修改，对边缘特征的含义做出了阐释，相应位置在文中用“橙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敬畏有不同的类型，研究者确定了敬畏的五大边缘特征，这些特征通常与敬畏的诱发因素有关，可以对敬畏的体验进行调节，从而引起不同种类的敬畏体验，包括美的敬畏、能力的敬畏、美德的敬畏、超自然的敬畏与威胁的敬畏(周凌霄等, 2022; Chirico & Yaden, 2018; Keltner & Haidt, 2003)。 | 敬畏的核心特征决定了某种情绪能否被归类于敬畏家族，所有涉及到以上两个核心特征的情绪体验都可以被认为是敬畏家族中的一员(Keltner & Haidt, 2003)。此外，Keltner 和 Haidt(2003)还确定了敬畏的五大边缘特征，边缘特征则解释了不同的敬畏状态之间的差异，这些特征通常与敬畏的诱发因素有关，可以对敬畏的体验进行调节，从而引起不同种类的敬畏，导致了这种体验的多样性，包括美的敬畏、能力的敬畏、美德的敬畏、超自然的敬畏与威胁的敬畏(周凌霄等, 2022; Chirico & Yaden, 2018; Keltner & Haidt, 2003)。 【1 的第二段】 |

参考文献:

周凌霄, 李姗姗, 彭凯平, 王阳, 管芳. (2022). 敬畏体验量表的中文版修订.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9(5), 1138–1142.

Chirico, A., & Yaden, D. B. (2018). Awe: A self-transcendent and sometimes transformative emotion. In H. C. Lench (Ed.), *The function of emotions* (pp. 221–233).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Keltner, D., & Haidt, J. (2003). Approaching awe, a moral,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emotion. *Cognition and*

3. 基于美德的敬畏指的是个体被表现出美德或品格力量的人所引发的带有提升感的敬畏体验，例如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读到袁隆平的生平时产生的体验(Haidt, 2003)。

袁隆平的例子如果不属于这篇文献，麻烦文献引出应放在观点后面。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已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做出了修改，相应位置在文中用“橙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基于美德的敬畏指的是个体被表现出美德或品格力量的人所引发的带有提升感的敬畏体验，例如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读到袁隆平的生平时产生的体验(Haidt, 2003)。 | 基于美德的敬畏指的是个体被表现出美德或品格力量的人所引发的带有提升感的敬畏体验(Haidt, 2003)，例如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读到袁隆平的生平时产生的体验。 【1 的第二段】 |

参考文献：

Haidt, J. (2003). Elevation and the positive psychology of morality. In C. L. Keyes & J. Haidt (Eds.), *Flourishing: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the life well-lived* (pp. 275–289).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4. 对敬畏产生的亲社会行为能否归类，亲社会行为涉及很广，可以外显，可以内隐，哪些有一致的结论，哪些还存在争议。哪些还没有完全涉及，比如紧急救助行为。他们分别在亲社会行为范畴中属于什么关系。这一点和第二个专家的第一条意见类似，最后归纳出一个有意义的结论，让人一目了然。

答：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1) 在多项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特质敬畏与被试在亲社会倾向测量(PTM)上的得分呈正相关(Li, Dou, Wang, & Nie, 2019; Lin, Hong, Xiao, & Lian, 2020; Fu et al., 2022; Jiao & Luo, 2022)。

(2) 这一效应在实验研究中同样得到了广泛支持。只有极少数研究(16项研究中的3项)没有发现敬畏对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详见附表中的“红色”部分)。

(3) 在亲社会行为的一般领域内，研究者倾向于将面向他人行为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帮助、分享和安慰)分别反映了对三种不同消极状态(工具需求、未满足的物质欲望和情绪困扰)的反应(Kristen, 2014)。附表就这三种分类分别列出了敬畏在不同类别上的不同效用。对于帮助行为, 目前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研究支持了敬畏对帮助行为的促进作用(Guan et al., 2019; Piff et al., 2015; Rudd et al., 2012)。例如, 在自然情景中, Piff 等人(2015)通过让被试沉浸在一片高耸的桉树林中来诱导敬畏状态, 并与注视高大建筑物的条件进行了对比。他们的研究发现, 敬畏条件下的被试向实验者提供了更多的帮助, 表现为帮助假装无意掉落 11 根铅笔的实验者捡回了更多的笔。此外, 敬畏同样促进了人们捐赠出更多时间来帮助他人(Guan, Chen, Chen, Liu, & Zha, 2019)或慈善机构的倾向(Rudd et al., 2012); 而对于分享行为, 大部分的研究结果得到了一致的结论(Guan et al., 2019; Luo, Zou, Yang, & Yuan, 2022; Piff et al., 2015)。例如, 在 COVID-19 大流行的时代背景下, Luo 等人(2022)引导被试回忆并沉浸于某个在疫情期间让他感到敬畏的时刻, 结果发现, 回忆医务工作者不顾自己的健康, 坚持在艰难的环境中战斗等敬畏时刻的实验组被试比娱乐组和中性组被试, 捐赠物资的意愿更强、捐赠金钱的数量更多。在独裁者游戏中同样发现了敬畏对分享行为的促进作用(Piff, Dietze, Feinberg, Stancato, & Keltner, 2015)。只有极少数的研究在分享行为上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Joye and Bolderdijk, 2015; Luo et al., 2022; Rudd et al., 2012)。例如, Joye 和 Bolderdijk (2015)发现敬畏没有提高人们向受灾者分享金钱或物品的意愿, 但是却强化了亲社会价值观(SVO)(对于可能的分数的分享)。他们认为这里出现的无效影响很可能是因为受到了非常规的测量量表的干扰。而对于安慰行为, 目前尚未有研究加以探索。

下表就亲社会行为的三种分类(帮助、分享和安慰)列出了敬畏在不同类别上不同的效用, 只有极少数研究(16 项研究中的 3 项)中没有发现敬畏对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 这些研究的结果在下表中用“红色”标出。

| 类别 | 文献 | 因变量(对亲社会性的测量) | 结果 |
|----|----------------------|--|--|
| 帮助 | Piff et al. (2015) | Study 5: 实际帮助行为(被试帮助实验者捡起的笔的数量) | 在一个自然的敬畏诱导中, 参与者仰望一片高耸的树丛, 导致了更多的帮助(研究 5)。 |
| | Guan et al. (2019) | Study 3: 捐赠时间的倾向(为研究人员提供帮助的时间) | 与消极敬畏条件和中性相比, 在积极敬畏条件下 更可能捐出时间 。 |
| | Meng and Wang (2022) | 亲社会意愿(是否愿意以很低的报酬帮助研究人员进行另一个研究项目); 亲社会行为(是否点击链接完成了不相关的调查) | 敬畏情绪组的亲社会意向明显高于中立组和愉快情绪组; 敬畏组的亲社会行为比中立组和愉快情绪组要高(边缘显著)。 |
| | Prade and Saroglou | Study 2: 帮助意愿(面临假设的帮助情景时做出的反应) | 敬畏增加了和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意愿(实验 2)。 |

| | | | |
|----|----------------------------|--|---|
| | (2016) | | |
| | Yang et al. (2016) | Study 2 和 3: 亲社会行为(七巧板帮助/伤害任务中为为其伙伴选择完成的简单的谜题数量); 亲社会动机(想帮助对方赢得礼品卡的动机) | 敬畏增加了亲社会性(亲社会行为: 为“伙伴”选择的容易谜题的数量和亲社会性动机)。 |
| | Luo et al. (2022) | Study 2: 亲社会性(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成为志愿者和捐赠物资的意愿)。 | 在纵向研究中, 敬畏感与亲社会性的长期增长呈正相关, 其衡量标准是更愿意成为志愿者和捐钱支持抗击 COVID-19。 |
| | | Study 4: 亲社会性(献血意愿和在献血网站上注册的意愿) | 敬畏对献血意愿有显著的作用。 |
| 分享 | Piff et al. (2015) | Study 1: 慷慨程度(独裁者游戏中分配给伙伴的奖券) Study 3: 独裁者游戏中的慷慨程度 Study 4: 亲社会价值(社会价值的三重优势测量法: 衡量自己和假设的他人之间资源分配的一般偏好) | 在经济游戏中, 具有敬畏特质的个体表现得更加慷慨(研究 1), 对陌生人更慷慨(研究 3), 并报告更多的亲社会价值(研究 4)。 |
| | Seo et al. (2022) | Study 4: 捐赠分配意向(将捐款分配给全球慈善机构或本地慈善机构的意向) | 在积极和消极敬畏条件下的被试均比在控制条件下分配更多的钱给全球慈善机构。 |
| | Rudd et al. (2012) | Study 2: 捐赠时间和金钱的意愿(为“支持有价值的事业”和“帮助慈善机构”而自愿花时间和捐钱的可能性和意愿) | 敬畏条件下比快乐条件下的更愿意自愿付出时间; 敬畏条件的被试并不比快乐条件下的被试更愿意捐钱。 |
| | Prade and Saroglou (2016) | Study 1: 自发的慷慨(如果赢得 10 万欧元, 自发分配给他人(家人、朋友和/或慈善机构)的钱的百分比) | 敬畏的体验增强了慷慨, 增加了被试与他人分享假设的倾向(实验 1)。 |
| | Guan et al. (2019) | Study 2: 捐赠金钱的倾向(为福利案例捐赠金钱的数额) | 积极和消极的敬畏条件下比在中性条件下更有可能捐出他们的钱。 |
| | Joye and Bolderdijk (2015) | 捐赠意愿(捐赠食物、衣服、金钱和血液的意愿); 社会价值取向(SVO)(在自己和假想他人之间分配可能的分数的选择) | 自然敬畏对捐款/捐物的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但促进了亲社会价值观。 |
| | Luo et al. (2022) | Study 1: 亲社会行为(COVID-19 大流行中, 是否做志愿者、捐赠物资、金钱及捐赠了多少) | 特质敬畏可以预测被试是否充当志愿者或捐赠物资, 但不能预测他们是否捐赠金钱; 然而, 具有较高特质敬畏的个体倾向于捐赠更多的钱。 |

| | | | |
|----|---|--|--|
| 安慰 | 无 | | |
|----|---|--|--|

已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对敬畏产生的亲社会行为进行归类，详细内容见下表，相应位置在文中用“橙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p>更重要的是，敬畏似乎对个体的亲社会性产生了广泛的促进作用。这一效应在多种不同的形式的亲社会性测量中得到了支持。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敬畏与个体的亲社会倾向密切相关(Li, Dou, Wang, & Nie, 2019; Lin, Hong, Xiao, & Lian, 2020; Fu et al., 2022; Jiao & Luo, 2022)。此外，它能够促进经济游戏中的慷慨(Piff, Dietze, Feinberg, Stancato, & Keltner, 2015)、自发的亲社会意图(Prade & Saroglou, 2016)和对时间(Guan, Chen, Chen, Liu, & Zha, 2019; Rudd et al., 2012)、金钱(Guan et al., 2019)甚至血液(Luo, Zou, Yang, & Yuan, 2022)的捐赠意愿。这一效应广泛存在于实验室(Meng & Wang, 2022; Yang, Yang, Bao, Liu, & Passmore, 2016)、自然情境(Piff et al., 2015)和社会情境之中(Luo et al.)。具体而言，相关研究表明敬畏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亲社会倾向(Li, Dou, Wang, & Nie, 2019; Lin, Hong, Xiao, & Lian, 2020)。此外，即使是在实验中诱发出的敬畏情绪也会产生显著的亲社会性效应。例如，Piff 等人(2015)使用回忆法，通过让被试回忆最近遇到的自然景色，比如日落、在高处眺望到的风景或任何其他使人感到美丽的自然景观，来实验性地诱导敬畏状态，并将其与中性和自豪条件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回忆敬畏经历的被试表现得更加道德，在决策情境中更少地做出违反公认规范的自利行为，比如留下星巴克店员多找的零钱。在 COVID-19 大流行的时代背景下，研究者们(Luo et al.)引导被试回忆并沉浸于某个在疫情期间让他感到敬畏的时刻，结果发现，回忆医务工作者不顾自己的健康，坚持在艰难的环境中战斗等敬畏时刻的实验组被试比娱乐组和中性组被试，捐赠物资的意愿更强、捐赠金钱的数量更多。鉴于明确</p> | <p>更重要的是，敬畏似乎对个体的亲社会性产生了广泛的促进作用。在多项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特质敬畏与被试在亲社会倾向测量上的得分呈正相关(Li, Dou, Wang, & Nie, 2019; Lin, Hong, Xiao, & Lian, 2020; Fu et al., 2022; Jiao & Luo, 2022)。</p> <p>无论是在以帮助还是分享为主的亲社会行为中，敬畏的亲社会效应都得到了实验研究证据的支持。通常，亲社会行为可区分为帮助、分享和安慰等三种不同类别，分别反映了人们对工具需求、未满足的物质欲望和情绪困扰等三种不同消极状态的反应(Dunfield, 2014)。对于帮助行为，许多实验研究都支持敬畏对帮助行为的促进作用(Guan, Chen, Chen, Liu, & Zha, 2019; Piff et al., 2015; Rudd et al., 2012)。例如，在自然情景中，Piff 等人(2015)通过让被试沉浸在一片高耸的桉树林中来诱导敬畏状态，并与注视高大建筑物的条件进行了对比。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敬畏条件下的被试向实验者提供了更多的帮助，表现为帮助假装无意掉落 11 根铅笔的实验者捡回了更多的笔。此外，敬畏同样促进了人们捐赠出更多时间来帮助他人(Guan et al., 2019)或慈善机构的倾向(Rudd et al., 2012)。对于分享行为，大部分的研究结果得到了一致的结论(Guan et al., 2019; Luo, Zou, Yang, & Yuan, 2022; Piff et al., 2015)。例如，在 COVID-19 大流行的时代背景下，Luo 等人(2022)引导被试回忆并沉浸于某个在疫情期间让他感到敬畏的时刻，结果发现，回忆医务工作者不顾自己的健康，坚持在艰难的环境中战斗等敬畏时刻的实验组被试比娱乐组和中性组被试，捐赠物资的意愿更强、捐赠金钱的数量更多。在独裁者游戏中同样发现了敬畏对分享行为的促进作用(Piff et al., 2015)。只有极少数的研究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Joye and Bolderdijk, 2015; Luo et al., 2022; Rudd et</p> |

| | |
|---|---|
| <p>的亲社会性测量可能会夸大大人们在敬畏诱导后表现出的善良倾向，研究者进一步采取了一种内隐的方法测量被试的亲社会意图，他们同样发现对敬畏的诱导会增加自发的慷慨(自发地分享假设的彩票收益)和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亲社会意图(隐藏在与亲社会行为无关的情景中；Prade & Saroglou, 2016)。这些发现为敬畏的亲社会效应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p> | <p>al., 2012)。例如，Joye 和 Bolderdijk (2015)发现敬畏没有提高人们向受灾者分享金钱或物品的意愿，但是却强化了亲社会价值观(SVO)(对于可能得到的分数的分享)。但他们认为这里出现的无效影响很可能是因为受到了非常规测量的干扰而不反映真实的效应。鉴于上述研究中明确的亲社会性测量可能会夸大大人们在敬畏诱导后表现出的善良倾向，研究者进一步采取了一种内隐的方法测量被试的亲社会意图，他们同样发现对敬畏的诱导会增加自发的慷慨和在看似与亲社会行为无关的情景中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亲社会意图(Prade & Saroglou, 2016)。总之，上述发现为积极敬畏的亲社会效应提供了有力的证据。</p> <p>【2 效应的第一段和第二段】</p> |
|---|---|

参考文献:

- Dunfield, K. A. (2014). A construct divided: prosocial behavior as helping, sharing, and comforting subtyp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5*. doi:10.3389/fpsyg.2014.00958
- Fu, Y. N., Feng, R. D., Liu, Q., He, Y. M., Turel, O., Zhang, S. Y., & He, Q. H. (2022). Aw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11).
- Guan, F., Chen, J., Chen, O. T., Liu, L. H., & Zha, Y. Z. (2019). Awe and prosocial tendency. *Current Psychology, 38*(4), 1033-1041.
- Jiao, L. M., & Luo, L. (2022). Dispositional awe positively predicts prosocial tendencies: The multiple mediation effects of connectedness and empat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24).
- Joye, Y., & Bolderdijk, J. W. (2015). An exploratory study into the effects of extraordinary nature on emotions, mood, and prosocial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5*.
- Li, J. J., Dou, K., Wang, Y. J., & Nie, Y. G. (2019). Why awe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s?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self-transcendence meaning of lif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 Lin, R. M., Hong, Y. J., Xiao, H. W., & Lian, R. (2020). Dispositional awe and prosocial tendency: The mediating roles of self-transcendent meaning in life and spiritual self-transcendence.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48*(12).
- Luo, L., Zou, R., Yang, D., & Yuan, J. J. (2022). Awe experience triggered by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promotes prosociality through increased feeling of connectedness and empathy.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 Meng, L., & Wang, X. (2022). Awe in the workplace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 *Psych Journal*.
- Piff, P. K., Dietze, P., Feinberg, M., Stancato, D. M., & Keltner, D. (2015). Awe, the small self,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6), 883-899.
- Prade, C., & Saroglou, V. (2016). Awe's effects on generosity and helping.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1*(5), 522-530.
- Rudd, M., Vohs, K. D., & Aaker, J. (2012). Awe expands people's perception of time, alters decision making, and enhances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10), 1130-1136.

Seo, M. J., Yang, S. Y., & Laurent, S. M. No one is an island: Awe encourages global citizenship identification. *Emotion*.

Yang, Y., Yang, Z. Y., Bao, T. X., Liu, Y. Z., & Passmore, H. A. (2016). Elicited awe decreases aggression.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10*.

5. 通读全文，部分句子不完整。2.部分管敬畏常常由非社会性的刺激所引发，然而具有深刻的社会效应。少了“尽”字。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已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通读全文并对稿件的文字表述加以完善，详细内容见下表，相应位置在文中用“橙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管敬畏常常由非社会性的刺激所引发，它却具有深刻的社会效应。 | 尽管敬畏常常由非社会性的刺激所引发，它却具有深刻的社会效应。 【2 的第一段】 |
| 情绪评估表明，积极和消极的敬畏视频均能成功地唤起敬畏 | 情绪评估表明，积极和消极的视频能够成功地唤起不同类型的敬畏 【2 的第三段】 |

6. 他们同样发现对敬畏的诱导会增加自发的慷慨(自发地分享假设的彩票收益)和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亲社会意图(隐藏在与亲社会行为无关的情景中)(Prade & Saroglou, 2016)。这些发现为敬畏的亲社会效应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

是不是应该改为(隐藏在与亲社会行为无关的情景中； Prade & Saroglou, 2016)。根据期刊要求请核实一下。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已对此处做出了修改，相应位置在文中用“橙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他们同样发现对敬畏的诱导会增加自发的慷慨(自发地分享假设的彩票收益)和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亲社会意图(隐藏在与亲社会行为无关的情景中)(Prade & Saroglou, 2016)。 | 他们同样发现对敬畏的诱导会增加自发的慷慨和在看似与亲社会行为无关的情景中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亲社会意图(Prade & Saroglou, 2016)。 【2 效应的第二段】 |

7. 我同意第一位专家的意见，作者首先在文中提出五种类型的敬畏，这些敬畏对亲社会行为的结果和机制是否相同，有些敬畏常被研究，有些较少涉及，特别是威胁敬畏的独特性，威胁也可能带来的是自利，而不是利他，这背后与其他敬畏的机制差异是什么，有必要在文中做系统的梳理，归纳，并体现出来。这也是该篇综述的一个意义，不应该放小结展望部分。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根据敬畏的五种类型，我们对以往关注敬畏和亲社会性关系的研究进行分类总结(见下表)。我们发现尽管以往研究采取了多种敬畏诱导方法，例如回忆任务要求被试回忆并描述让他们感到敬畏的经历(Yang, Yang, Bao, Liu, & Passmore, 2016)，这使得敬畏的体验可以自由地变化。但是绝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由自然激发的敬畏上(可以被归类为基于美的敬畏或基于威胁的敬畏)。由美丽的自然景色诱发的敬畏通常被认为对亲社会性有促进作用(Guan, Chen, Chen, Liu, & Zha, 2019; Piff, Dietze, Feinberg, Stancato, & Keltner, 2015; Prade & Saroglou, 2016)；而威胁性自然刺激所引发的敬畏则可能会对个体的亲社会倾向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Septianto, Nasution, Arnita, & Seo, 2022; 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其他三种类型的敬畏相对来说还没有被探索。据我们所知，目前尚未有研究关注基于超自然的敬畏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仅有两项研究关注基于美德的敬畏和基于能力的敬畏，研究结果同样支持了敬畏对亲社会性的积极作用。例如，Luo 等人(2022)发现由医务工作者无私奉献的美德所诱发的敬畏可以提高进行志愿服务、捐款和献血的意愿(Luo, Zou, Yang, & Yuan)。Meng 和 Wang(2022)关注在工作场所中诱发的敬畏，他们的研究要求回忆并写下以前因组织或同事相关因素而产生的敬畏体验。后续的编码分析发现，与组织相关的敬畏激发因素包括美德、能力和成就、组织的地位和权力，以及工作场所的美；与同事相关的敬畏因素包括美德、能力和成就、奉献精神、魅力以及同事的地位和权力(Meng & Wang)。上述与组织或同事相关的敬畏体验提高了个体的亲社会意向与亲社会行为。因此，现有研究的限制使我们无法对五种类型的敬畏对亲社会行为的结果和背后机制加以比较。

然而，正如审稿专家的建议，由于威胁敬畏的独特性，它可能并不会对亲社会领域产生一致的效应，这背后与一般积极敬畏的机制差异是什么，有必要在文中做系统的梳理，归纳，并体现出来。因此，根据专家的建议和该领域目前的研究发展趋势，从敬畏的效价出发对积极敬畏和消极敬畏的亲社会效应及心理机制加以比较可能是一种更合理，涵盖更广的分类方式。具体而言，先前的多数研究都认为敬畏是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Cao, Wang,

& Wang, 2020; Piff et al., 2015)。然而，在近期开展的部分研究关注了敬畏的消极方面——基于威胁的敬畏。这是一种带有恐惧色彩的敬畏，通常由自然灾害(如海啸和龙卷风)或专制的独裁者所诱发(Gordon et al., 2017)。基于威胁的敬畏将如何增加(或减少)亲社会性？目前的研究认为消极敬畏与亲社会性之间存在有两条不同的途径，每条途径各有不同的运作机制(Piff et al., 2015; Seo et al., 2022; 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 Wang et al., 2022)。一方面，部分研究主要强调它与积极敬畏的相似性，认为基于威胁的敬畏同样可以导致更高的亲社会性，这种效应是由小我感(觉得自己是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并觉得自己的问题和日常关注的问题变得无足轻重)所中介的(Piff et al., 2015; Seo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22)。另一方面，鉴于这种敬畏的消极变体与恐惧、较低自我控制和较高的情境控制有关(Chaudhury et al., 2022; Gordon et al., 2017)，研究者认为这种感觉可能导致较低的亲社会性，这种效应是由无力感所中介的(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et al., 2022)。较低的控制感可能导致无力感的增强(Gordon et al., 2017; 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这有助于阐明为什么基于威胁的敬畏会限制亲社会性。如果人们觉得他们缺乏足够的效能来改变现状，他们可能不会追求亲社会行为(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et al., 2022)。因此，高水平的威胁敬畏可能会减少亲社会行为，因为个人感到无能为力。对此，建构水平和内隐理论可能是有效的调节变量。研究发现向被试呈现高建构水平的广告(强调“为什么”)时，经历威胁敬畏的被试报告了更高的捐赠意向(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此外，当面临基于威胁的敬畏时，具有增长(相对于实体)理论的个体认为他们的捐赠有更高的效能，因此做出更多的捐赠(Septianto, Seo, et al., 2022)。自然灾害是基于威胁的敬畏的重要诱因(Gordon et al., 2017; Keltner & Haidt, 2003; Piff et al., 2015)；这些灾害产生了巨大的受助需求。因此，在未来利用调节变量以发挥威胁敬畏对于捐赠等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根据敬畏的五种类型，下表对以往关注敬畏和亲社会性关系的研究进行分类总结。

| 敬畏类型 | 文献 | 对敬畏的测量/操纵 | 结果 |
|----------------|-----------------------------|--|--|
| 基于美的敬畏和基于威胁的敬畏 | Piff et al. (2015) | Study 2: 回忆任务(回忆令人敬畏的自然景象); Study 3: 视频诱导(观看了自然图像视频); Study 4: 视频诱导(消极敬畏: 威胁性的自然刺激 vs. 非自然敬畏: 彩色水滴与一碗牛奶的碰撞); Study 5: 现场实验(注视高耸的桉树林) | 在经济游戏中, 具有敬畏特质的个体表现得更加慷慨(研究 1)。实验性地诱导敬畏使个体赞同更多的道德决定(研究 2), 对陌生人更慷慨(研究 3), 并报告更多的亲社会价值(研究 4)。在一个自然的敬畏诱导中, 参与者仰望一片高耸的树丛, 导致了更多的帮助(研究 5)。 |
| | Seo, Yang, & Laurent (2022) | Study 4: 图像诱导(积极敬畏: 自然景观 vs. 消极敬畏: 威胁性自然灾害图片) | 在积极和消极敬畏条件下的被试均比在控制条件下分配更多的钱给全球慈善机构。 |
| | Guan et al. (2019) | Study 2: 视频诱导(积极敬畏: 自然刺激 vs. 消极敬畏: 威胁性的自然刺激); Study 3: 视频诱导(积极敬畏: 自然刺激 vs. 消极敬畏: 威胁性的自然刺激) | 特质敬畏与更大的亲社会倾向有关; 积极和消极的敬畏条件下比在中性条件下更有可能捐出他们的钱, 而且积极和消极的敬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与消极敬畏条件和中性相比, 在积极敬畏条件下更可能捐出时间, 消极敬畏和中立条件没有显著差异。 |
| | Prade & Saroglou (2016) | Study 1: 回忆任务(回忆令人敬畏的自然景象); Study 2: 视频诱导(观看自然图像视频) | 敬畏的体验增强了慷慨, 增加了与被试与他人分享假设的倾向(实验 1); 和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意愿(实验 2)。 |
| | Joye & Bolderdijk (2015) | 图像诱导(敬畏: 宏伟和戏剧性的山景图片, 也包括一些以雷暴、龙卷风、彩虹和日落为主的宏伟景观图片) | 自然敬畏对捐款/帮助的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但促进了亲社会价值观。 |
| | Yang et al. (2016) | Study 3: 视频诱导(观看自然图像视频) | 敬畏增加了亲社会性(亲社会行为: 为"伙伴"选择的容易谜题的数量和亲社会性动机) |
| | Meng & Wang (2022) | 回忆任务(回忆因组织或同事而产生的敬畏体验) | 敬畏情绪组的亲社会意向明显高于中立组和愉快情绪组; 敬畏组的亲社会行为比中立组和愉快情绪组要高(边缘 |
| 基于美德的敬畏和能力的敬畏 | | | |

| | | | |
|----------|-------------------------------|---|---|
| | | | 显著)。 |
| | Luo, Zou, Yang, & Yuan (2022) | Study 2: 敬畏的体验(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经历一般的、对医务工作者、对生命和对自然的敬畏频率进行评分); Study 3: 回忆任务(回忆并写下他们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由医务工作者的美德所诱发的积极敬畏经历); Study 4: 回忆任务(回忆并写下他们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由医务工作者的美德所诱发的积极敬畏经历) | Study 2: 在纵向研究中, 敬畏感与亲社会性的长期增长呈正相关, 其衡量标准是更愿意成为志愿者和捐钱支持抗击 COVID-19; Study 3: 总体上, 敬畏增加了对群体内和群体外的亲社会性, 但没有增加为内群体捐款意愿, 也没有增加与外群体合作的意愿; Study 4: 敬畏对献血意愿有显著的作用, 但对在献血网站上在线注册的意愿没有作用。 |
| 基于超自然的敬畏 | 暂无 | 暂无 | 暂无 |
| 无法进行分类的 | Fu et al. (2022) | 特质敬畏(测量: 特质性积极情绪量表, DPES) | 纵向研究中, 敬畏感(T1)可以正向预测亲社会倾向(T2)。 |
| | Jiao & Luo (2022) | 特质敬畏(测量: 特质性积极情绪量表, DPES) | 在每个具体的情境中, 特质敬畏对亲社会倾向的预测作用都很显著。 |
| | Lin et al. (2021) | 特质敬畏(测量: 中国大学生倾向性敬畏问卷, DAQ-CU) | 特质敬畏与在线利他主义呈正相关关系。 |
| | Luo, Zou, Yang, & Yuan (2022) | Study 1: 特质敬畏(测量: 特质性积极情绪量表, DPES) | 特质敬畏可以预测被试是否充当志愿者或捐赠物资, 但不能预测他们是否捐赠金钱; 然而, 具有较高特质敬畏的个体倾向于捐赠更多的钱。 |
| | Rudd, Vohs, & Aaker (2012) | Study 2: 书写任务(敬畏: 写下敬畏 vs. 快乐的个人经历) | 敬畏条件下比快乐条件下的更愿意自愿付出时间; 敬畏条件的被试并不比快乐条件下的被试更愿意捐钱。 |

已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做出了修改, 将威胁敬畏的效应与背后的心理机制放入正文中与积极敬畏形成比较, 相应位置在文中用“橙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p>综上所述可知, 先前的多数研究都认为敬畏是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Cao, Wang, & Wang, 2020; Piff et al., 2015)。然而, 在近期开展的</p> | <p>综上所述可知, 先前的多数研究都认为敬畏是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Cao, Wang, & Wang, 2020; Piff et al., 2015)。然而, 在近期开展的部分研究关注了</p> |

部分研究关注了敬畏的消极方面——基于威胁的敬畏。这是一种带有恐惧色彩的敬畏，通常由自然灾害(如海啸和龙卷风)或专制的独裁者所诱发(Gordon et al., 2017)。基于威胁的敬畏将如何增加(或减少)亲社会性? 以往的研究主要强调它与积极敬畏的相似性, 认为基于威胁的敬畏同样可以促进亲社会性(Guan et al., 2019; Piff et al., 2015; Seo, Yang, & Laurent, 2022; Wang, Qu, Guo, & Wang, 2022)。例如, Piff 等人(2015)探讨了消极的和非自然的敬畏体验对亲社会倾向的作用。研究过程中, 使用威胁性的自然刺激(龙卷风、火山)和非自然的刺激(彩色水滴与一碗牛奶的碰撞)诱发被试的敬畏状态。结果表明, 消极的敬畏条件和非自然的敬畏条件均可以显著地增加被试的亲社会倾向。后续研究者将消极形式和积极形式的敬畏加以对比。被试观看诱发积极敬畏的自然全景、诱发消极敬畏的自然灾害视频或中性对照视频。诱发消极敬畏的视频来自 BBC《地球星球》, 由在火山、龙卷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中拍摄的片段组成(Gordon et al., 2017; Jiang et al., 2018; Piff et al., 2015)。情绪评估表明, 积极和消极的敬畏视频均能成功地唤起敬畏, 但消极敬畏条件下被试感受到了更强烈的威胁水平。随后完成对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测量。结果表明, 在积极和消极敬畏条件下的被试均比在中性条件下的被试倾向于向失业的陌生人捐出更多的金钱, 并且两种条件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Guan et al., 2019)。尽管我们主要关注敬畏积极效应, 上述研究仍为威胁敬畏的亲社会效应提供了直接的实证证据。但这些研究也有一定的不足, 它们仅强调了基于威胁的敬畏与典型积极敬畏的相似性, 而没有探索这些变体之间的区别(Septianto, Nasution, Arnita, & Seo, 2022)。总之, 本文主要关注典型的、积极的敬畏, 目的是概述典型的积极敬畏的亲社会好处, 在大多数研究中这种敬畏被发现可以促进个体的亲社会性。

敬畏的消极方面——基于威胁的敬畏。这是一种带有恐惧色彩的敬畏, 通常由自然灾害(如海啸和龙卷风)或专制的独裁者所诱发(Gordon et al., 2017)。基于威胁的敬畏是否会增加(或减少)亲社会性? 一些研究者强调它与积极敬畏的相似性, 认为基于威胁的敬畏同样可以促进亲社会性(Guan et al., 2019; Piff et al., 2015; Seo, Yang, & Laurent, 2022; Wang, Qu, Guo, & Wang, 2022)。例如, Piff 等人(2015)探讨了消极的和非自然的敬畏体验对亲社会倾向的作用。研究过程中, 使用威胁性的自然刺激(龙卷风、火山)和非自然的刺激(彩色水滴与一碗牛奶的碰撞)诱发被试的敬畏状态。结果表明, 消极的敬畏条件和非自然的敬畏条件均可以显著地增加被试的亲社会倾向。后续研究者将消极形式和积极形式的敬畏加以对比。被试观看诱发积极敬畏的自然全景、诱发消极敬畏的自然灾害视频或中性对照视频。诱发消极敬畏的视频来自 BBC 的“地球星球”, 由在火山、龙卷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中拍摄的片段组成(Gordon et al., 2017; Jiang et al., 2018; Piff et al., 2015)。情绪评估表明, 积极和消极的视频能够成功地唤起不同类型的敬畏, 在消极敬畏条件下被试感受到了更强烈的威胁水平。随后完成对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测量。结果表明, 在积极和消极敬畏条件下的被试均比在中性条件下的被试倾向于向失业的陌生人捐出更多的金钱, 并且两种条件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Guan et al., 2019)。上述研究为威胁敬畏的亲社会效应提供了直接的实证证据。而另一些研究则更强调威胁敬畏与典型积极敬畏之间的区别。他们认为, 威胁的敬畏与恐惧、较低的控制和较高的情境控制有关, 这将导致较低的亲社会性(Gordon et al., 2017; Septianto, Nasution, Arnita, & Seo, 2022; 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例如, Septianto 等人(2022)使用慈善广告操纵基于威胁的敬畏, 通过在广告中加入(或不加入)洪水的图像来激发高(或低)的威胁性敬畏; 并通过在广告中强调“为什么”信息或“如何”信息操纵被试的建构水平。尽管威胁敬畏的主效应不显著, 但在低建构水平条件下, 研究者发现经历了高水平威胁敬畏的被试会做出更少的慈善捐赠。

| | |
|-------------|---|
| | 【2 效应的第三段】 |
| 威胁敬畏机制部分：无。 | <p>“大二”框架同样有助于理解小我与无力感在消极敬畏与亲社会性之间发挥的作用。与积极敬畏类似，在共生维度上，消极敬畏将通过小我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增加(Piff et al., 2015)；不同之处在于，在能动维度上，消极敬畏将导致无力感的增加或效能感的降低(能动的反面)，并因此导致亲社会行为的减少(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et al., 2022)。具体来说，消极敬畏与亲社会性之间存在有两条不同的途径，每条途径各有不同的运作机制(Piff et al., 2015; Seo et al., 2022; 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 Wang et al., 2022)。第一条是共生路径，强调与积极敬畏的相似性，基于威胁的敬畏同样可以导致更高的亲社会性，这一效应也是由小我所中介的(Piff et al., 2015; Seo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22)。另一条是能动路径，强调敬畏的消极变体与恐惧、较低自我控制和较高的情境控制有关，基于威胁的敬畏导致较低亲社会性，这一效应是由无力感所中介的(Chaudhury, Garg, & Jiang, 2022; 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et al., 2022)。也就是说，能动性的降低有助于阐明基于威胁的敬畏减少亲社会性的心理机制。如果人们觉得缺乏足够的效能来改变现状，就可能不会追求亲社会行为；因为此时个体不相信自己采取的措施(如捐款)能够有效地帮助受助者(Jin & He 2018)。</p> <p>【3.3 最后一段】</p> |

参考文献：

- Cao, F., Wang, X., & Wang, Z. (2020). Effects of awe on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healthy versus unhealthy food products.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 19(3), 264–276.
- Chaudhury, S. H., Garg, N., & Jiang, Z. X. (2022). The curious case of threat-awe: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conceptualization. *Emotion*, 22(7), 1653–1669.
- Fu, Y. N., Feng, R. D., Liu, Q., He, Y. M., Turel, O., Zhang, S. Y., & He, Q. H. (2022). Aw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11).
- Gordon, A. M., Stellar, J. E., Anderson, C. L., McNeil, G. D., Loew, D., & Keltner, D. (2017). The Dark Side of the Sublime: Distinguishing a Threat-Based Variant of Aw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2), 310-328.

- Guan, F., Chen, J., Chen, O. T., Liu, L. H., & Zha, Y. Z. (2019). Awe and prosocial tendency. *Current Psychology*, 38(4), 1033-1041.
- Jiao, L., & Luo, L. (2022). Dispositional Awe Positively Predicts Prosocial Tendencies: The Multiple Mediation Effects of Connectedness and Empat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24).
- Joye, Y., & Bolderdijk, J. W. (2015). An exploratory study into the effects of extraordinary nature on emotions, mood, and prosocial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5. doi:10.3389/fpsyg.2014.01577
- Keltner, D., & Haidt, J. (2003). Approaching awe, a moral,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emotion. *Cognition & Emotion*, 17(2), 297-314.
- Lin, R. M., Chen, Y. P., Shen, Y. L., Xiong, X. X., Lin, N., & Lian, R. (2021). Dispositional Awe and Online Altruism: Testing a Moderated Mediating Model.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 Luo, L., Zou, R., Yang, D., & Yuan, J. J. Awe experience triggered by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promotes prosociality through increased feeling of connectedness and empathy.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 Piff, P. K., Dietze, P., Feinberg, M., Stancato, D. M., & Keltner, D. (2015). Awe, the Small Self,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6), 883-899.
- Prade, C., & Saroglou, V. (2016). Awe's effects on generosity and helping.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1(5), 522-530.
- Rudd, M., Vohs, K. D., & Aaker, J. (2012). Awe Expands People's Perception of Time, Alters Decision Making, and Enhances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10), 1130-1136.
- Seo, M. J., Yang, S. Y., & Laurent, S. M. No One Is an Island: Awe Encourages Global Citizenship Identification. *Emotion*.
- Septianto, F., Nasution, R. A., Arnita, D., & Seo, Y. (2022). The role of threat-based awe and construal level in charitable advertising.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56(5), 1532-1555.
- Septianto, F., Seo, Y., & Paramita, W. (2022). The Role of Implicit Theories in Motivating Donations in Response to Threat-Based Awe.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 41(1), 72-88.
- Wang, M., Qu, X., Guo, C., & Wang, J. (2022). Awe elicited by natural disasters and willingness to help people in afflicted areas: A meditational model. *Current Psychology*.
- Yang, Y., Yang, Z. Y., Bao, T. X., Liu, Y. Z., & Passmore, H. A. (2016). Elicited Awe Decreases Aggression.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10.

8. 修改稿中缺乏 3.3, 3.4 部分, 与修改说明中不一致。

正因为这些部分的删除, 使得该综述最核心的部分未能得到充分的归纳, 整合, 小我和真我在五类型的敬畏与亲社会行为关系中的作用, 小我和真我之间又是一个什么关系, 缺乏一个大的东西去整合, 对这些东西进行充分的整合和梳理, 有利于深入揭示他们之间的本质关系, 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罗列。

答: 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小我假说和真我假说分别从自我的不同方面对于敬畏的亲社会效应的心理机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那么，在敬畏促进亲社会性的过程中，到底是小我起作用还是真我起作用？二者是什么关系？在对这一系列问题深入考察的基础上，研究者们认为当前的小我假说和真我假说可以在“大二”框架下进行完善与整合(Diehl, Owen, & Youngblade, 2004; Stell, 2018)。

“大二”，即能动(agency)与共生(communion)，有助于整合小我与真我在敬畏的亲社会效应中起到的作用。能动意为个体通过权力、控制等方式追求自身的独立；共生意为个体通过关爱、交流等方式追求融入群体和社会(Abele et al., 2016)。基于进化的视角，能动和共生抓住了人类生活中所面临的两个核心挑战：属于社会群体和追求个人目标(Azoulay, Wilner-Sakal, Tzabag, & Gilboa-Schechtman, 2022; Hogan, 1982)。能动与共生维度已被证实可以为分析人格、社会认知、价值观、动机等领域提供一个有效的框架(Abele & Wojciszke, 2014; Fiske, Cuddy, & Glick, 2007; Paulhus & John, 1998)。重要的是，作为人类行为的基本模式，能动与共生已经被证明可以映射到自我之上。对自我描述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它们可以被可靠地归类于能动或共生这两个维度之上(Abele & Bruckmüller, 2013; Diehl et al., 2004; Uchronski, 2008)。这表明能动和共生是自我的基本维度，并可以在个体的自我表征中被有意识地使用(Diehl et al., 2004)。理论及实证研究指出，小我属于共生维度，它反映了人类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属于社会群体)在自我中的解决；真我则是一种自主的、自我决定的自我，属于能动维度，它反映了人类面临的第二个挑战(追求个人目标)在自我中的解决(Diehl et al., 2004; Stell, 2018)。

小我通常被表征为一种亲和性、顺从性的自我，属于自我概念的共生维度(Diehl et al., 2004; Stell, 2018)。从理论起源上看，小我的提出基于敬畏的适应性与功能性取向(Keltner & Haidt, 2003; Weber, 1978)。该取向认为敬畏最初可能是作为一种对强大的、高地位的他人的尊敬性反应而出现的，而后逐渐拓展到其他具有浩瀚性特点的刺激上(Keltner & Haidt, 2003)。这种反应中涉及到将自己的利益和目标服从于强大的领导者的倾向，这具有适应性的意义，因为它通过非暴力手段构建了一种集体等级制度，对人类的生存很重要(Fiske, 1991; Keltner & Haidt, 1999)。小我研究认为上述理论特征的核心在于由敬畏诱发的小我感(Bai et al., 2017)。在敬畏体验中，与浩瀚性的刺激物的接触伴随着一种自我在比较中被减弱的感知，使体验者觉得自己拥有一个“小我”，促进个体面向他人并融入集体(Stellar et al., 2017)。这种自我表征被认为是一种亲和性、顺从性的自我，因而属于自我概念的共生维度。实证证据也支持小我可以被归类为敬畏对自我共生维度的作用(Keltner & Haidt, 2003; Perlin & Li, 2020; Stellar et al., 2017)。例如，Diehl等(2004)根据以往测量能动

与共生维度的量表总结出一份可用于编码自我特征的词汇清单，在该清单中反映小我的“服从的”、“谦逊的”等形容词被认为是共生维度的典型代表。可见，小我是一种共生性自我表征。

Appendix C

Communion Words

| | | | | |
|-------------------|---------------|-------------------------------|---------------------------|---------------|
| Loving | Grateful | Praising | Intimate (seeks intimacy) | Tactful |
| Sentimental | | | | |
| Unite with others | Conscientious | Sincere | Caring | Neat |
| Nurturing | Creative | Talkative/sharing experiences | Encouraging | Home-oriented |
| Cooperative | Religious | Timid | Sharing | Considerate |
| Communicate | Appreciative | Cheerful | Charming | Dependent |
| Affectionate | Contented | Flatterable | Enticing | Fearful |
| Altruistic | Emotional | Loyal | Kind | Forgiving |
| Gentle | Fickle | Tender | Sensitive | Privolous |
| Loyal | Friendly | Role model | Sympathetic | Jolly |
| Sociable | Helpful | Understanding | | |
| Modest | | | | Submissive |
| | | | | Worrying |
| | | | | Compassionate |
| | | | | Gullible |
| | | | | Shy |
| | | | | Yielding |
| | | | | Interested |
| | | | | Warm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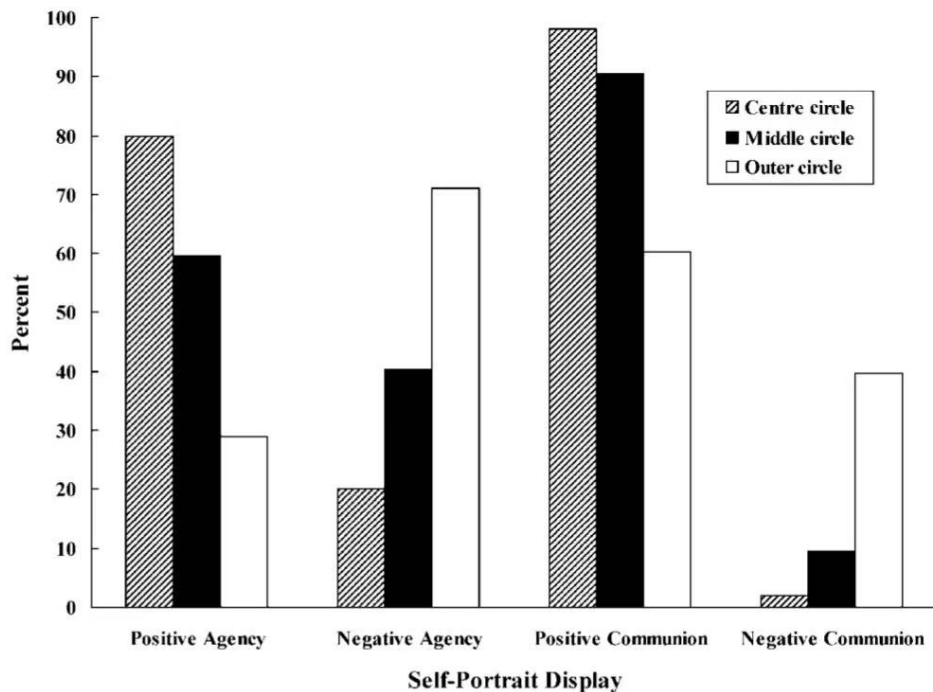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agency- and communion-related attributes across circles of the self-portrait display.

真我通常被表征被认为是独特的、自我决定的，属于自我的能动维度(Maslow, 1962; Tyson et al., 2022)。从理论起源上看，真我假说的提出试图解释一个小我假说难以解释的问题，即敬畏的变革性能力(Jiang & Sedikides, 2022)。真我假说认为，敬畏可以影响人们的目标和价值，并促进自我的改变和成长(Danvers & Shiota, 2017; Nelson-Coffey et al., 2019)。改变和成长则被视为是自我能动维度的重要方面(Baken, 1966)。此外，当个体得以成为他真正的自我，感到自己是的活动和感知的创造性中心，就更有自我决定权，更具能动性，比其他时候更具有“自由意志”(Maslow, 1964)。该观点强调了由敬畏激发的真实自我具有的独特性和自我决定性，表明真我应当被归类为一种能动的自我表征。实证性研究发现，特

质敬畏与能动呈正相关，并与个体的从众倾向呈负相关(Stell, 2018)。可见，真我是一种能动性的自我表征。

小我与真我的关系：能动与共生属于自我的两个不同维度，二者在一个互动的、相互平衡的、相互促进的方式中发展；那些平衡地整合了能动和共生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深刻的亲社会动机(Frimer, Walker, Dunlop, Lee, & Riches, 2011; Mansfield & McAdams, 1996)。这意味着，积极敬畏可以同时自我的两个维度上促进亲社会性：在共生维度上，敬畏促进了小我的产生，进而导致亲社会行为；在能动维度上，敬畏促进了真我的产生，进而导致亲社会行为。初步实证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发现小我无法中介敬畏对真实自我追求的影响(Jiang & Sedikides, 2022)。这一结果表明小我无法解释真我所发挥的作用，真我的作用在小我的效应之外也能得到很好的证实。这从实证上验证了真我假说的确指出了敬畏通向一般亲社会性的另一条路径，即能动的路径。因此，敬畏将在自我的能动维度(通过真我的中介)和共生维度(通过小我的中介)上共同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

“大二”框架同样有助于理解小我与无力感在消极敬畏与亲社会性之间发挥的作用。与积极敬畏类似，在共生维度上，消极敬畏将通过小我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增加(Piff et al., 2015)；不同之处在于，在能动维度上，消极敬畏将导致无力感的增加或效能感的降低(能动的反面)，并因此导致亲社会行为的减少(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et al., 2022)。具体来说，消极敬畏与亲社会性之间存在有两条不同的途径，每条途径各有不同的运作机制(Piff et al., 2015; Seo et al., 2022; 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 Wang et al., 2022)。第一条是共生路径，强调与积极敬畏的相似性，基于威胁的敬畏同样可以导致更高的亲社会性，这一效应也是由小我所中介的(Piff et al., 2015; Seo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22)。另一条是能动路径，强调敬畏的消极变体与恐惧、较低自我控制和较高的情境控制有关，基于威胁的敬畏导致较低亲社会性，这一效应是由无力感所中介的(Chaudhury et al., 2022; 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et al., 2022)。也就是说，能动性的降低有助于阐明基于威胁的敬畏减少亲社会性的心理机制。如果人们觉得缺乏足够的效能来改变现状，就可能不会追求亲社会行为；因为此时个体不相信自己采取的措施(如捐款)能够有效地帮助受助者(Jin & He 2018)。

已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做出了修改，增加了 3.3，在能动-共生维度上，整合自我的不同方面在两种类型的敬畏(积极 vs. 消极)与亲社会行为关系中的作用，相应位置在文中用“橙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修改前的框架： 3.3 无 | 修改后的框架： 3.3 “大二”视角下的小我与真我的整合机制【详见 3.3】 |

参考文献：

- Abele, A. E., & Bruckmüller, S. (2013). The big two of agency and communion i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In J. Forgas & J. Laszlo (Eds.), *Social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pp. 173–184).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Abele, A. E., Hauke, N., Peters, K., Louvet, E., Szymkow, A., & Duan, Y. (2016). Facets of the fundamental content dimensions: Agency with competence and assertiveness-communion with warmth and moral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Article 1810.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6.01810>
- Abele, A. E., & Wojciszke, B. (2014). Communal and agentic content in social cognition: a dual perspective model.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0, 195–255.
- Azoulay, R., Wilner-Sakal, M., Tzabag, R., & Gilboa-Schechtman, E. (2022).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self-concept: The effects of interpersonal motivations and inclusionary status on spontaneous self-descriptions of communion and agency.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20(3). doi:10.1177/14747049221120095
- Bai, Y., Maruskin, L. A., Chen, S., Gordon, A. M., Stelar, J. E., McNeil, G. D., Peng, K., & Keltner, D. (2017). Awe, the diminished self, and collective engagement: Universals and cultural variations in the small 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2), 185–209.
- Bakan, D. (1966). *The Duality of Human Existence. An Essay on Psychology and Religion*. Chicago, IL: Rand McNally.
- Danvers, A. F., & Shiota, M. N. (2017). Going off script: Effects of awe on memory for script-typical and -irrelevant narrative detail. *Emotion*, 17(6), 938–952.
- Diehl, M., Owen, S., & Youngblade, L. (2004). Agency and communion attributes in adults' spontaneous self-represent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8(1), 1–15.
- Fiske, A.P. (1991). *Structures of social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 Fiske, S. T., Cuddy, A. J. C., & Glick, P. (2007). Universal dimensions of social cognition: warmth and competenc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1(2), 77-83.
- Frimmer, J., Walker, L., Dunlop, W., Lee, B., & Riches, A. (2011). The integration of agency and communion in moral personality: Evidence of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1), 149–163.
- Hogan, R. (1982). “A socioanalytic theory of personality,” in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ed M. Page (Lincoln, OR: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336–355.
- Keltner, D., & Haidt, J. (1999). Social functions of emotions at four levels of analysis. *Cognition & Emotion*, 13(5), 505–521.
- Keltner, D., & Haidt, J. (2003). Approaching awe, a moral,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emo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17(2), 297–314.
- Mansfield, E. D., & McAdams, D. P. (1996). Generativity and themes of agency and communion in adult autobiograph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2, 721–731.
- Maslow, A. H., & Pi, K. D. (1964). *Religions, values, and peak-experiences*. Columbus, OH: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Nelson-Coffey, S. K., Ruberton, P. M., Chancellor, J., Cornick, J. E., Blascovich, J., & Lyubomirsky, S. (2019). The proximal experience of awe. *PLOS ONE*, *14*(5), Article e0216780. doi: 10.1371/journal.pone.0216780
- Paulhus, D. L., and John, O. P. (1998). Egoistic and moralistic biases in self-perception: the interplay of self-deceptive styles with basic traits and motiv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6*, 1025–1060.
- Perlin, J. D., & Li, L. (2020). Why does awe have prosocial effects? New perspectives on awe and the small self.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2), 291–308.
- Piff, P. K., Dietze, P., Feinberg, M., Stancato, D. M., & Keltner, D. (2015). Awe, the small self,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6), 883–899.
- Septianto, F., Nasution, R. A., Arnita, D., & Seo, Y. (2022). The role of threat-based awe and construal level in charitable advertising.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56*(5), 1532–1555.
- Septianto, F., Seo, Y., & Paramita, W. (2021). The role of implicit theories in motivating donations in response to threat-based awe.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 *41*(1), 72–88.
- Stell, A. J. (2018). *Awe as a Self-transcending Emo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ussex, Brighton.
- Stellar, J. E., Gordon, A. M., Piff, P. K., Cordaro, D., Anderson, C. L., Bai, Y., Maruskin, L. A., & Keltner, D. (2017). Self-transcendent emotions and their social functions: Compassion, gratitude, and awe bind us to others through prosociality. *Emotion Review*, *9*(3), 200–207.
- Tyson, C., Hornsey, M. J., & Barlow, F. K. (2022). What does it mean to feel small?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small self. *Self and Identity*, *21*(4), 387–405.
- Uchronski, M. (2008). Agency and communion in spontaneous self-descriptions: Occurrence and situational malleab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8*(7), 1093–1102.
- Wang, M., Qu, X., Guo, C., & Wang, J. (2022). Awe elicited by natural disasters and willingness to help people in afflicted areas: A meditational model. *Current Psycholog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22-03227-3>
- Weber, M.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Based on 4th German edition, various translator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9. 在 3.2 最后一段，提出小我和真我的独立关系时，敬畏通过真我起作用，小我不中介敬畏对真我的影响，链式中介不成立。这只是结论，作者未能很好地揭示链式中介背后的逻辑，为什么是小我在真我前面，他们之间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可用来借鉴参考整合自我和真我的关系。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1) 在理论上解释小我与真我的关系。

能动与共生属于自我的两个不同维度，二者在一个互动的、相互平衡的、相互促进的方式中发展；那些平衡地整合了能动和共生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深刻的亲社会动机(Frimer, Walker, Dunlop, Lee, & Riches, 2011; Mansfield & McAdams, 1996)。这意味着，积极敬畏可以同时自我的两个维度上促进亲社会性：在共生维度上，敬畏促进了小我的产生，进而

导致亲社会行为；在能动维度上，敬畏促进了真我的产生，进而导致亲社会行为。

(2) 为什么在探索性的研究中将小我放在真我前面？

鉴于在理论提出上，真我假说试图通过从能动的视角出发解释了一个小我假说难以解释的问题，即敬畏所具有的强大的促进心理成长的潜力。Jiang 和 Sedikides(2022)认为真我假说是小我假说的一个补充机制，它指出了敬畏通向一般亲社会性的另一条路径：敬畏通过加强真实自我的追求来鼓励一般的亲社会性。研究者想要进一步用实证数据探索真我能否在小我的效应之外发挥作用，并限制小我的作用。因此，他们在探索性的中介研究中把小我放在真我之前，目的在于想知道小我是否能解释真我。探索性的实证数据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的观点，研究者发现自我渺小无法中介敬畏对真实自我追求的影响(Jiang & Sedikides, 2022)。这一结果限制了小我的作用，表明小我无法解释真我所发挥的作用，真我的作用在小我的效应之外也能得到很好的证实。这一结果从实证上验证了真我假说的确指出了敬畏通向一般亲社会性的另一条路径。我们认为，这是一条能动的路径。最终，敬畏将在自我的两个基本维度上共同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在共生维度上，通过促进小我感；在能动维度上，通过促进真我感。

已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做出了修改，在理论上解释了小我与真我的关系，相应位置在文中用“橙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无。 | 能动与共生属于自我的两个不同维度，二者在一个互动的、相互平衡的、相互促进的方式中发展；那些平衡地整合了能动和共生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深刻的亲社会动机(Frimer, Walker, Dunlop, Lee, & Riches, 2011; Mansfield & McAdams, 1996)。这意味着，积极敬畏可以同时在这自我的两个维度上促进亲社会性：在共生维度上，敬畏促进了小我的产生，进而导致亲社会行为；在能动维度上，敬畏促进了真我的产生，进而导致亲社会行为。初步实证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发现小我无法中介敬畏对真实自我追求的影响(Jiang & Sedikides, 2022)。这一结果表明小我无法解释真我所发挥的作用，真我的作用在小我的效应之外也能得到很好的证实。这从实证上验证了真我假说的确指出了敬畏通向一般亲社会性的另一条路径，即能动的路径。因此，敬畏将在自我的能动维度(通过真我的中介)和共生维度(通过小我的中 |

| | |
|--|---------------------------------|
| | 介)上共同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 【3.3 的最后一段】 |
|--|---------------------------------|

参考文献:

- Frimer, J., Walker, L., Dunlop, W., Lee, B., & Riches, A. (2011). The integration of agency and communion in moral personality: Evidence of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1), 149–163.
- Jiang, T., & Sedikides, C. (2022). Awe motivates authentic-self pursuit via self-transcendence: Implications for prosoci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3(3), 576–596.
- Mansfield, E. D., & McAdams, D. P. (1996). Generativity and themes of agency and communion in adult autobiograph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2, 721–731.

10. 实践意义部分--**敬畏的操作和小我、真我的改变都可以涉及**，其应用环境也可以具体一点，操作性和应用性可更强一点。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1) 敬畏的操作。

“敬畏之行”：该干预为期 8 周，每周进行 15 分钟的户外散步，通过引导被试努力挖掘出在散步中体验到的惊奇感受，并尽量每周更换一个新的地点来培养敬畏感。研究显示，“敬畏之行”有助于“小我”的体验，并促进了更多的亲社会积极情绪。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在散步过程中产生瞬间的情绪体验变化之外，这种干预措施的效果甚至拓展到了散步的背景之外，鼓励了日常生活中的同情心等亲社会情感的转变。这一发现对于塑造日常生活中的亲社会行为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此外，**虚拟现实技术**(Chirico & Gaggioli, 2019)也被证明是促进敬畏的一种手段。该技术能够在虚拟的环境中产生存在感，这种特殊体验能够增加敬畏的强度，进而促进亲社会行为。其他的证据显示，正念训练或每日日记可能是有效的干预措施。例如，Waller 等人(2021)发现，进行**正念呼吸练习**可以增加敬畏的感觉。**每日日记法**也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干预方式，该方法通过向被试介绍敬畏的定义并指导其完成每日敬畏日记描述当天所经历的敬畏体验来增加敬畏情绪(Bai et al., 2022)。

(2) 针对敬畏的心理机制：

“小我”：在研究中常常被降格为敬畏影响亲社会性的中介变量(Tyson et al., 2022)，目前少有敬畏领域之外的研究关注“小我”，因此缺少对此变量的干预方法。

“真我”：真我的心理机制表明，如果想要使亲社会行为得到最有效的实施，它需要符合一个人的真实自我(Schmader & Sedikides, 2018)。因此，慈善组织可能需要分析其潜在捐赠者的真实自我追求并据此定制他们的慈善活动，使其符合潜在捐赠者的真实自我追求，或部分满足其追求(Jiang & Sedikides, 2022)。

(3) 针对基于威胁的敬畏：由于自然灾害是基于威胁的敬畏的重要诱因(Gordon et al., 2017; Keltner & Haidt, 2003; Piff et al., 2015)。这些灾害产生了巨大的受助需求。因此发挥威胁敬畏对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个有效的干预措施是定制高建构水平的慈善广告，在慈善广告中向捐赠者强调与“为什么捐赠”有关的信息。研究发现向被试呈现高建构水平的广告时，经历威胁敬畏的被试将报告出更高的捐赠意向(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已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做出了修改，增加了干预方案的操作性和应用性，相应位置在文中用“橙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p>第三，该领域的研究有助于探明情感对人类亲社会性的核心作用，对未来开发出促进捐赠等亲社会行为的有效干预方案具有启发意义。目前，已有学者开发出了一种被称为“敬畏之行”的干预(Sturm et al., 2022)。该干预为期 8 周，每周进行 15 分钟的户外散步，通过引导被试努力挖掘出在散步中体验到的惊奇感受，并尽量每周更换一个新的地点来培养敬畏感。研究显示，与纯粹的日常散步相比，“敬畏之行”有助于“小我”的体验，并促进了更多的亲社会积极情绪。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在散步过程中产生瞬间的情绪体验变化之外，这种干预措施的效果甚至拓展到了散步的背景之外，鼓励了日常生活中的同情心等亲社会情感转变。这一发现对于塑造日常生活中的亲社会行为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此外，虚拟现实技术(Chirico & Gaggioli, 2019)也被证明是促进敬畏的一种手段。该技术能够在虚拟的环境中产生存在感，这种特殊体验能够增加敬畏的强度，进而促进亲社会行为。其他的证据显示，正念</p> | <p>第三，该领域的研究有助于探明情感对人类亲社会性的核心作用，对未来开发出促进捐赠等亲社会行为的有效干预方案具有启发意义。目前，已有学者开发出了一种被称为“敬畏之行”的干预(Sturm et al., 2022)。该干预为期 8 周，每周进行 15 分钟的户外散步，通过引导被试努力挖掘出在散步中体验到的惊奇感受，并尽量每周更换一个新的地点来培养敬畏感。研究显示，“敬畏之行”有助于“小我”的体验，并促进了更多的亲社会积极情绪。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在散步过程中产生瞬间的情绪体验变化之外，这种干预措施的效果甚至拓展到了散步的背景之外，鼓励了日常生活中的同情心等亲社会情感的转变。这一发现对于塑造日常生活中的亲社会行为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此外，虚拟现实技术(Chirico & Gaggioli, 2019)也被证明是促进敬畏的一种手段。该技术能够在虚拟的环境中产生存在感，这种特殊体验能够增加敬畏的强度，进而促进亲社会行为。其他的证据显示，正念训练或每日日记可能是有效的干预措施。例如，Waller 等人(2021)发现，进行正</p> |

| | |
|---|---|
| <p>训练或每日日记可能是有效的干预措施。例如, Waller 等人(2021)发现, 进行正念呼吸练习可以增加敬畏的感觉。此外, Geier 和 Morris(2022)发现, 写作任务是增强其他积极情绪(例如, 感恩)的有效方法。除了对敬畏本身进行干预外, 针对敬畏引发小我与真我的转变进而促进亲社会性的核心机制, 开发出以自我转变为核心的干预方案应该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该领域研究对我国第三次分配的实施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 通过个人收入转移、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非强制方式进行的再一次分配(厉以宁, 1993)。干预策略的开发可为推进以慈善捐赠作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战略提供科学心理学方案。</p> | <p>念呼吸练习可以增加敬畏的感觉。每日日记法也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干预方式, 该方法通过向被试介绍敬畏的定义并指导其完成每日敬畏日记描述当天所经历的敬畏体验来增加敬畏情绪(Bai et al., 2017)。除了对敬畏本身进行干预外, 针对敬畏引发小我与真我的转变进而促进亲社会性的核心机制, 开发出以自我转变为核心的干预方案应该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真我的心理机制表明, 如果想要使亲社会行为得到最有效的实施, 它需要符合一个人的真实自我(Schmader & Sedikides, 2018)。因此, 慈善组织可能需要分析其潜在捐赠者的真实自我追求并据此定制他们的慈善活动, 使其与潜在捐赠者的真实自我追求相交, 或部分满足其追求(Jiang & Sedikides, 2022)。此外, 由于自然灾害是基于威胁的敬畏的重要诱因, 这些灾害产生了巨大的受助需求, 一个有效的干预措施是定制高建构水平的慈善广告。研究发现向被试呈现高建构水平(强调“为什么”)的广告时, 经历威胁敬畏的被试将报告出更高的捐赠意向(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总之, 该领域干预方案的开发将有助于充分利用敬畏对捐赠等亲社会行为的积极作用, 从而为推进以慈善捐赠作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战略提供科学心理学方案。</p> <p>【4的最后一段】</p> |
|---|---|

参考文献:

Bai, Y., Maruskin, L. A., Chen, S., Gordon, A. M., Stellar, J. E., McNeil, G. D., Peng, K., & Keltner, D. (2017). Awe, the diminished self, and collective engagement: Universals and cultural variations in the small 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2), 185–209.

Chirico, A., & Gaggioli, A. (2019). When virtual feels real: Comparing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presence in virtua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2*(3), 220–226.

Gordon, A. M., Stellar, J. E., Anderson, C. L., McNeil, G. D., Loew, D., & Keltner, D. (2017). The dark side of the sublime: Distinguishing a threat-based variant of aw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2), 310–328.

Jiang, T., & Sedikides, C. (2022). Awe motivates authentic-self pursuit via self-transcendence: Implications for prosoci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3*(3), 576–596.

Keltner, D., & Haidt, J. (2003). Approaching awe, a moral,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emo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17*(2), 297–314.

Piff, P. K., Dietze, P., Feinberg, M., Stancato, D. M., & Keltner, D. (2015). Awe, the small self, and prosocial

-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6), 883–899.
- Schmader, T., & Sedikides, C. (2018). State authenticity as fit to environment: The implications of social identity for fit, authenticity, and self-segreg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2(3), 228–259.
- Septianto, F., Nasution, R. A., Arnita, D., & Seo, Y. (2022). The role of threat-based awe and construal level in charitable advertising.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56(5), 1532–1555.
- Tyson, C., Hornsey, M. J., & Barlow, F. K. (2022). What does it mean to feel small?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small self. *Self and Identity*, 21(4), 387–405.
- Waller, M., Mistry, D., Jetly, R., & Frewen, P. (2021). Meditating in virtual reality 3: 360° video of perceptual presence of instructor. *Mindfulness*, 12(6), 1424–1437.

11. 审稿专家的批注：

(1) 体验敬畏事件被认为是使个体产生成长和改变的最快和最有力的方法之一(Chirico & Yaden, 2018; Keltner & Haidt, 2003; Stellar et al., 2017)，指的是啥？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答：Keltner 和 Haidt(2003)在他们的开创性工作中指出，敬畏常常对个人产生转化作用，指敬畏可以影响人们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并促进“个人变化和成长” (第 312 页)。

(2) 由于激发了对真实自我的追求，敬畏继而影响了两种亲社会行为：一方面，促进了一般的亲社会性，即旨在造福他人或集体的行为。与自利相反么？

答：不一定，真实自我是复杂的。研究者认为真实自我往往包含着许多相互矛盾的成分，有好的、社会期望的部分和坏的、违背社会期望的部分(Allport, 1968; Emmons, King, & Sheldon, 1993; Festinger, 1962; Oyserman, Elmore, & Smith, 2012)。但是，人们的社会理想动机往往比社会不理想动机在他们的目标层级中更重要、更优先。并且当人们相信他们的行为符合那些在他们的目标优先级排名中较高而不是较低的目标时，他们似乎感觉最真实(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

(3) Jiang 和 Sedikides(2022, study14)检验了真我在敬畏和两类亲社会性之间所起到的作用，发现在两种亲社会行为中，真实自我追求的中介效应均是显著的，由敬畏引发的真实自我追求导致了一般亲社会性的增加和不真实亲社会性的减少。是否考虑助人成本？

答：这里主要考虑的是亲社会行为是否符合一个人的真实自我。如果帮助行为不符合一个人的真实自我，即使是对自己 and 他人都有利的帮助行为(比如说任人唯亲)，被试也不会倾向于去选择。我认为这反映了一种能动与自主，追求真实自我的被试重视自主性(内在动机)，不会盲目地为了迎合他人或集体而做出违背自己真实动机的亲社会行为。

第四轮

审稿专家 3 意见：

作者在修改中对核心问题重新做了充分的修改说明，并尝试从共生和能动的角度做了整合，重新进行了归纳，本论文还存在以下问题：

1. 摘要部分需要调整，对心理机制整合部分和未来研究方向归纳还不到位。

批注 1：同时影响？并列中介？谨慎用词，这里整合机制没有提及。

批注 2：未来研究方向适当清晰，而不只是干预措施。

答：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已根据专家的意见对本文的中英文摘要加以调整，对整合心理机制和未来研究方向部分进行了重新归纳，相应位置在文章中用“粉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p>敬畏是一种对浩瀚的刺激以及现有心理结构无法适应的刺激的情感反应。尽管敬畏常常由非社会性的刺激所引发，但它却具有深刻的社会效应。大量实证证据显示，敬畏可以促进各种形式的亲社会行为。小我假说认为，诱发敬畏体验的浩瀚刺激会导致自我的渺小感，推动个体的注意力从自我转移至他人，进而促进了亲社会行为；真我假说则认为，敬畏有助于促进个体的注意力从日常的世俗关注向更大的精神存在转移，这激发了个体对真我的追求，进而促进了造福他人和社会的亲社会行为。小我与真我属于自我的不同维度，敬畏通过同时影响不同维度的自我，最终促进了亲社会行为的产生。未来需要针对敬畏本身及其心理机制开发出更多的促进捐赠等亲社会行为的干预措施，以期第三次分配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心理学方案。</p> | <p>敬畏是一种对浩瀚的刺激以及现有心理结构无法适应的刺激的情感反应。尽管敬畏常常由非社会性的刺激所引发，但它却具有深刻的社会效应。大量实证证据显示，敬畏可以促进各种形式的亲社会行为。小我假说认为，诱发敬畏体验的浩瀚刺激会导致自我的渺小感，推动个体的注意力从自我转移至他人，进而促进了亲社会行为；真我假说则认为，敬畏有助于促进个体的注意力从日常的世俗关注向更大的精神存在转移，这激发了个体对真我的追求，进而促进了造福他人和社会的亲社会行为。小我与真我属于自我的不同维度，敬畏将通过小我与真我的平行中介同时在自我的不同维度上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未来需要进一步考察敬畏的亲社会效应的普遍性、探索其边界条件、在理论和实证的层面对现有的小我假说和真我假说加以完善并针对敬畏本身及其心理机制开发出更多的促进捐赠等亲社会行为的干预措施，以期第三次分配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心理学方案。</p> <p>【中文摘要】</p> |
| <p>Awe is an emotional response to vast stimuli that expand the current frames of reference and require a new schema to accommodate. Although awe is often triggered by nonsocial stimuli, it has</p> | <p>Awe is an emotional response to vast stimuli that expand the current frames of reference and require a new schema to accommodate. Although awe is often triggered by nonsocial stimuli, it has profound social</p> |

| | |
|--|---|
| <p>profound social effects. A large body of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awe can promote various forms of prosocial behavior. The small-self hypothesis suggests that the vastness of stimuli that induce awe leads to a sense of self-diminishment, driving the shift of an individual's attention from the self to others, which in turn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 The authentic-self hypothesis suggests that awe promotes a shift in the individual's attention from everyday mundane concerns to a larger spiritual existence, inspiring the individual to pursue his or her authentic self, which in turn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 that benefits others and the collective. The small self and the authentic self are situated in different layers of the self, and awe ultimately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 by simultaneously influencing the different layers of the self. In response to awe itself and it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more interventions that promote prosocial behaviors such as donation need to be developed in the future,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psychological solutions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strategy.</p> | <p>effects. A large body of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awe can promote various forms of prosocial behavior. The small-self hypothesis suggests that the vastness of stimuli that induce awe leads to a sense of self-diminishment, driving the shift of an individual's attention from the self to others, which in turn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 The authentic-self hypothesis suggests that awe promotes a shift in the individual's attention from everyday mundane concerns to a larger spiritual existence, inspiring the individual to pursue his or her authentic self, which in turn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 that benefits others and the collective. The small self and the authentic self are situated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he self, and awe ultimately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self through parallel mediation model of the small self and authentic self. In the future, researchers nee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generality of the prosocial effects of awe, explore its boundary conditions, refine the existing small-self and authentic-self hypotheses at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evels, and develop more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prosocial behaviors such as donations with respect to awe itself and it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in order to provide psychological solutions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strategy.</p> <p>【英文摘要】</p> |
|--|---|

2. 在敬畏的亲社会行为中在第二段和第三段的结尾建议适当总结，见论文批注。

答：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1) 积极敬畏突然冒出来，前面没有铺垫，修改意见中提到美德，美，能力，大自然等属于积极敬畏范畴，前面罗列证据时，可以具体到敬畏类型，解释他们到共同属性，最后下个结论这几种类型的积极敬畏的亲社会行为有有力证据，这样逻辑更清晰。

首先，在第一段提及：典型的敬畏被归类为积极情绪家族中的一员，因为它最经常被体验为积极的价值(董蕊 等, 2013; Shiota, Keltner, & Mossman, 2007)。作为一种积极的情绪，敬畏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好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它可以促进个体的亲社会性。

其次，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在第二段罗列出基于美、美德和能力的敬畏促进个体亲社会行为的例子。**基于自然之美的：**“在自然情景中，Piff 等人(2015)通过让被试沉浸在一片高耸的桉树林中来诱导敬畏状态，并与注视高大建筑物的条件进行了对比。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敬畏条件下的被试向实验者提供了更多的帮助，表现为帮助假装无意掉落 11 根铅笔的实验者捡回了更多的笔。”**基于能力的：**“一项在组织背景下展开的研究同样发现，对在工作场所中经历的敬畏的回忆，其中包括了对组织或同事能力的敬畏，增加了被试以较低报酬帮助研究人员进行另一项研究的意向，以及后续的真实帮助行为(Meng & Wang, 2022)。”**基于美德的：**“在 COVID-19 大流行的时代背景下，Luo 等人(2022)引导被试回忆并沉浸于某个在疫情期间让他感到敬畏的时刻，结果发现，回忆医务工作者不顾自己的健康，坚持在艰难的环境中战斗等敬畏时刻的实验组被试比娱乐组和中性组被试，捐赠物资的意愿更强、捐赠金钱的数量更多。这一结果支持了基于美德的敬畏对分享行为的促进作用。”

最后，说明这几种敬畏的共同属性，即它们都具有积极的效价：总之，上述发现为不同类型敬畏的亲社会效应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包括对自然之美、对他人的美德和能力的敬畏。这些敬畏都不涉及到威胁、恐惧或害怕的感觉，研究者认为它们具有一个积极的情感基调(Gordon et al., 2017; Keltner & Haidt, 2003)。这些研究支持了积极敬畏对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

(2) 段落结尾加入一句总结句子，威胁的消极敬畏对亲社会行为有不同的作用，可能是存在不同的机制，再引出下面的心理机制。

已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在第三段的结尾加入总结句：“总之，基于威胁的敬畏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这背后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心理机制。”

已根据专家的意见在第二段和第三段的结尾进行了适当总结，相应位置在文章中用“粉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此外，敬畏同样促进了人们捐赠出更多时间来帮助他人(Guan et al., 2019)或慈善机构的倾向(Rudd et al., 2012)。对于分享行为，大部分的研究结果得到了一致的结论(Guan et al., 2019; Luo, Zou, Yang, & Yuan, 2022; Piff et al., | 此外，敬畏同样促进了人们捐赠出更多时间来帮助他人(Guan et al., 2019)或慈善机构的倾向(Rudd et al., 2012)。一项在组织背景下展开的研究同样发现，对在工作场所中经历的敬畏的回忆，其中包括了对组织或同事能力的敬畏，增加了被试以较 |

| | |
|---|---|
| <p>2015)。例如，在 COVID-19 大流行的时代背景下，Luo 等人(2022)引导被试回忆并沉浸于某个在疫情期间让他感到敬畏的时刻，结果发现，回忆医务工作者不顾自己的健康，坚持在艰难的环境中战斗等敬畏时刻的实验组被试比娱乐组和中性组被试，捐赠物资的意愿更强、捐赠金钱的数量更多。</p> | <p>低报酬帮助研究人员进行另一项研究的意向，以及后续的真实帮助行为(Meng & Wang, 2022)。对于分享行为，大部分的研究结果得到了一致的结论(Guan et al., 2019; Luo, Zou, Yang, & Yuan, 2022; Piff et al., 2015)。例如，在 COVID-19 大流行的时代背景下，Luo 等人(2022)引导被试回忆并沉浸于某个在疫情期间让他感到敬畏的时刻，结果发现，回忆医务工作者不顾自己的健康，坚持在艰难的环境中战斗等敬畏时刻的实验组被试比娱乐组和中性组被试，捐赠物资的意愿更强、捐赠金钱的数量更多。这一结果支持了基于美德的敬畏对分享行为的促进作用。</p> <p>【2 的第二段】</p> |
| <p>总之，上述发现为积极敬畏的亲社会效应提供了有力的证据。</p> | <p>总之，上述发现为不同类型敬畏的亲社会效应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包括对自然之美、对他人的美德和能力的敬畏。这些敬畏都不涉及到威胁、恐惧或害怕的感觉，被研究者们认为具有积极的情感基调(Gordon et al., 2017; Keltner & Haidt, 2003)。这些研究支持了积极敬畏对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p> <p>【2 的第二段】</p> |
| <p>无。</p> | <p>总之，基于威胁的敬畏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在这背后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心理机制。</p> <p>【2 的第三段】</p> |

参考文献:

董蕊, 彭凯平, 喻丰. (2013). 积极情绪之敬畏. *心理科学进展*, 21(11), 1996–2005.

Gordon, A. M., Stellar, J. E., Anderson, C. L., McNeil, G. D., Loew, D., & Keltner, D. (2017). The dark side of the sublime: Distinguishing a threat-based variant of aw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2), 310–328.

Guan, F., Chen, J., Chen, O., Liu, L., & Zha, Y. (2019). Awe and prosocial tendency. *Current Psychology*, 38(4), 1033–1041.

Keltner, D., & Haidt, J. (2003). Approaching awe, a moral,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emo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17(2), 297–314.

Luo, L., Zou, R., Yang, D., & Yuan, J. (2022). Awe experience triggered by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promotes

prosociality through increased feeling of connectedness and empathy,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Meng, L., & Wang, X. (2022). Awe in the workplace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 *Psych Journal*.

Piff, P. K., Dietze, P., Feinberg, M., Stancato, D. M., & Keltner, D. (2015). Awe, the small self,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6), 883–899.

Rudd, M., Vohs, K. D., & Aaker, J. (2012). Awe expands people's perception of time, alters decision making, and enhances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10), 1130–1136.

Shiota, M. N., Keltner, D., & Mossman, A. (2007). The nature of awe: Elicitors, appraisals, and effects on self-concept. *Cognition and Emotion*, 21(5), 944–963.

3. 在心理机制部分，强调敬畏的变革能力，说小我无法解释，要用真我，可在真我假说的论据中，一种是促进一般社会行为，一种是减少不真实的亲社会性，这两种行为和敬畏的变革能力有啥关系，文中无从体现。

答：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1) 变革能力的具体含义：

敬畏被认为具有变革性(transformative)能力，它让人经历了人生中一个关键时刻，启动了一个改变的过程(Chirico & Yaden, 2018; Keltner & Haidt, 2003; Maslow, 1962; Stellar et al., 2017)。Keltner 和 Haidt(2003)在他们的开创性研究中指出，敬畏可以改变人，重新定位人们的目标和价值观，引发敬畏的事件可能是个人成长和改变最迅速、最有力方法之一。其他定性和理论工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这种情绪为个体提供了反思自己人生并重新评估自我价值的机会(Bonner & Friedman, 2011; Schneider, 2009)。总之，敬畏的体验可能会促使人们开放地探索外部世界并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Danvers & Shiota, 2017; Nelson-Coffey et al., 2019)。简而言之，就是成长。那么这些成长和转变的过程实际上如何展开，特别是怎样影响敬畏的亲社会效应？这些问题不能被小我机制强调的注意力转移所解释(Perlin & Li, 2020)。换言之，如果自我减弱并感到无足轻重，是什么驱使个体进行反思并发起变革追求呢？研究者认为由敬畏引发的真实自我可能是实现自我转变、个人成长和心理成熟的关键(Jiang & Sedikides, 2022)。

(2) 真我假说如何应对小我假说的不足？即真我假说怎样体现变革能力，怎么解释成长和转变的过程。

对真实自我的追求可能通过自我反思和探索的过程体现成长。关注敬畏与生命意义的研究者推测敬畏会暂时减少生活中的连贯性，并激励人们寻找生命的意义，其中包括了对真实自我的寻求(Danvers et al., 2016)。Perlin 和 Li(2020)认为对意义和真实自我的寻求实际反映了一种深入的自我探索和自我改变的过程，并进一步认为当人们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探索时，注意力被引向自我的更深层、更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说，对个人感到有价值 and 重要的东西的探索。因此，由敬畏激发的真实自我追求可能迫使我们重新探索和评估最深切的个人目标与关键价值，让我们意识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由此实现自我成长与转变。但这些变革性的过程是如何与不同类型的亲社会行为具体联系起来的呢？

(3) 在敬畏的亲社会领域来讲，变革性的过程是如何与不同类型的亲社会行为具体联系起来的呢？通过强调关键价值。

研究者认为通过强调个人的关键价值并激励人们采取相应的行为(Erickson, 1995; Schmader & Sedikides, 2018; Sedikides et al., 2019)，对真实自我的追求将进而影响两种类型的亲社会行为(Jiang & Sedikides, 2022)。一方面，有助于一般的亲社会性，因为这被认为与人们的真实自我和关键价值有广泛的联系。事实上，真实性被发现与关心他人利益正面相关(Kasser & Ryan, 1996; Koltko-Rivera, 2006; Lenton, Bruder et al., 2013)。类似地，Jiang 和 Sedikides(2022)认为由敬畏引发的真实自我追求也会阻碍不真实的亲社会行为，这是因为提醒个体其真实自我，就会让他们不愿意以与之抵触的方式行为。

此外，在能动维度上思考敬畏对自我的影响，将有助于解释敬畏对一般亲社会性和不真实亲社会性的不同效应，特别是对不真实的亲社会性。真我作为一种自主的、自我决定的自我，属于自我的能动维度(Maslow, 1962)，对两类亲社会行为的不同效应具体反映了真实自我所具有的能动性，特别是对不真实的亲社会性。具体而言，敬畏对不真实亲社会性的阻碍作用表明，如果某种行为违背了一个人的真实自我和关键价值，尽管这种行为将有利于他人或集体，个体也不会选择去做。这反映了由真实性激发的亲社会性是自主的、自我决定的而非一种受控的行为(Van den Bosch & Taris, 2018)。那么敬畏的亲社会效应一定不是仅仅基于自我渺小感和对他人的注意力转移；相反，通过诱发真实自我，这些亲社会效应可能是基于一个人对他真正的自己和自己的核心动机的深化理解(Perlin & Li, 2020)。总之，这证明了真我将通过一条能动的路径将敬畏与亲社会行为相联系。

已根据专家的意见对变革能力做出更详细的解释并对变革能力和两类亲社会行为的关

系加以补充，相应位置在文章中用“粉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p>然而，随着研究深入，研究者发现在回答一些问题时“小我”的解释力存在不足。问题之一在于，敬畏具有变革性(transformative)能力，它可以改变人，重新定位人们的目标和价值观，体验敬畏事件被认为是使个体产生成长和改变的最快和最有力的方法之一(Chirico & Yaden, 2018; Keltner & Haidt, 2003; Stellar et al., 2017)，但这些成长和改变的过程又是如何展开的呢？研究者认为这些效应并不能归结于小我机制所强调的注意力转移(Perlin & Li, 2020)。换言之，如果自我被削弱并感到无足轻重，那么又是什么驱使个人参与反思并发起转变性的探索？对此，小我的中介作用不能给出满意的回答。</p> | <p>然而，随着研究深入，研究者发现在回答一些问题时“小我”的解释力存在不足。问题之一在于，敬畏具有变革性(transformative)能力，它让人经历了人生中一个关键时刻，启动了一个改变的过程(Chirico & Yaden, 2018; Keltner & Haidt, 2003; Maslow, 1962; Stellar et al., 2017)。Keltner 和 Haidt(2003)指出，敬畏可以改变人，重新定位人们的目标和价值观，引发敬畏的事件可能是个人成长和改变最迅速、最有力方法之一。其他定性和理论工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敬畏为个体提供了反思自己人生并重新评估自我价值的机会(Bonner & Friedman, 2011; Schneider, 2009)。总之，敬畏的体验可能会促使人们开放地探索外部世界并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Danvers & Shiota, 2017; Nelson-Coffey et al., 2019)。简而言之，就是成长。但这些成长和改变的过程实际上如何展开，是怎样影响敬畏的亲社会效应？这些问题不能被小我机制强调的注意力转移所解释(Perlin & Li, 2020)。换言之，如果自我减弱并感到无足轻重，是什么驱使个体进行反思并发起变革追求呢？对此，小我的中介作用不能给出满意的回答。</p> <p>【3.1的第二段】</p> |
| <p>由于激发了对真实自我的追求，敬畏继而影响了两种亲社会行为：一方面，促进了一般的亲社会性，即旨在造福他人或集体的行为。这是因为，这些行为与人们的真实自我大体一致；而另一方面，阻碍了不真实的亲社会性，即有利于他人或集体但违背真实自我的行为，例如写一封违背自己对候选者真实看法的推荐信(Schmader & Sedikides, 2018; Sedikides et al., 2019)。</p> | <p>因此，由敬畏激发的真实自我追求可能迫使我们重新探索和评估最深切的个人目标与关键价值，让我们意识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由此实现自我成长与转变。通过强调个人的关键价值并激励人们采取相应的行为(Erickson, 1995; Schmader & Sedikides, 2018; Sedikides et al., 2019)，对真实自我的追求继而影响了两种亲社会行为：一方面，促进了一般的亲社会性，即旨在造福他人或集体的行为。因为这被认为与人们的真实自我和关键价值有广泛的联系。事实上，真实性被发现与关心他人利益正面相关(Koltko-Rivera, 2006; Lenton, Bruder, Slabu, & Sedikides, 2013)。而另一方面，阻</p> |

| | |
|----|---|
| | <p>碍了不真实的亲社会性，即有利于他人或集体但违背真实自我的行为，例如写一封违背自己对候选人真实看法的推荐信 (Schmader & Sedikides, 2018; Sedikides et al., 2019)。这是因为提醒个体其真实自我，就会让他们不愿意以与之抵触的方式行为。</p> <p>【3.2 的第一段】</p> |
| 无。 | <p>能动路径将有助于解释敬畏对一般亲社会性和不真实亲社会性的不同效应，特别是对不真实的亲社会性。具体而言，敬畏对不真实亲社会性的阻碍作用表明，如果某种行为违背了一个人的真实自我和关键价值，尽管这种行为将有利于他人或集体，个体也不会选择去做。这反映了由真实自我激发的亲社会行为是一种自主的、自我决定的而非受控的行为 (Van den Bosch & Taris, 2018)。那么敬畏的亲社会效应一定不是仅仅基于自我渺小感和对他人的注意力转移；相反，通过诱发真实自我，这些亲社会效应可能同时基于一个人对他真正的自己和自己的核心动机的深理解 (Perlin & Li, 2020)。这同样证明了真我将通过一条能动的路径将敬畏与亲社会行为相联系。因此，敬畏将在自我的能动维度 (通过真我的中介) 和共生维度 (通过小我的中介) 上通过两条平行的路径共同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p> <p>【3.3 的倒数第三段】</p> |

参考文献：

- Bakan, D. (1966). *The Duality of Human Existence. An Essay on Psychology and Religion*. Chicago, IL: Rand McNally.
- Bonner, E. T., & Friedman, H. L. (2011). A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awe: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39(3), 222–235. <https://doi.org/10.1080/08873267.2011.593372>
- Chirico, A., & Yaden, D. B. (2018). Awe: A self-transcendent and sometimes transformative emotion. In H. C. Lench (Ed.), *The function of emotions* (pp. 221–233).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Danvers, A. F., O’Neil, M. J., & Shiota, M. N. (2016). The mind of the “happy warrior”: Eudaimonia, awe, and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In J. Vittersø (Ed.), *International handbooks of quality-of-life. Handbook of eudaimonic well-being* (pp. 323–335).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 Danvers, A. F., & Shiota, M. N. (2017). Going off script: Effects of awe on memory for script-typical and -irrelevant narrative detail. *Emotion, 17*(6), 938–952. <https://doi.org/10.1037/emo0000277>
- Erickson, R. J. (1995). The importance of authenticity for self and society. *Symbolic Interaction, 18*(2), 121–144. <https://doi.org/10.1525/si.1995.18.2.121>
- Maslow, A. H. (1962).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 Nelson-Coffey, S. K., Ruberton, P. M., Chancellor, J., Cornick, J. E., Blascovich, J., & Lyubomirsky, S. (2019). The proximal experience of awe. *PLOS ONE, 14*(5), Article e0216780.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6780>
- Jiang, T., & Sedikides, C. (2022). Awe motivates authentic-self pursuit via self-transcendence: Implications for prosoci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3*(3), 576–596. <https://doi.org/10.1037/pspi0000381>
- Koltko-Rivera, M. E. (2006). Rediscovering the later version of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Self-transcendence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ory, research, and unification.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0*(4), 302–317. <https://doi.org/10.1037/1089-2680.10.4.302>
- Keltner, D., & Haidt, J. (2003). Approaching awe, a moral,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emo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17*(2), 297–314.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0302297>
- Lenton, A. P., Bruder, M., Slabu, L., & Sedikides, C. (2013). How does “being real” feel? The experience of state authentic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1*(3), 276–289.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2012.00805.x>
- Perlin, J. D., & Li, L. (2020). Why does awe have prosocial effects? New perspectives on awe and the small self.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2), 291–308. <https://doi.org/10.1177/1745691619886006>
- Schmader, T., & Sedikides, C. (2018). State authenticity as fit to environment: The implications of social identity for fit, authenticity, and self-segreg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2*(3), 228–259. <https://doi.org/10.1177/1088868317734080>
- Schneider, K. J. (2009). *Awakening to awe: Personal stories of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Jason Aronson.
- Sedikides, C., Lenton, A. P., Slabu, L., & Thomaes, S. (2019). Sketching the contours of state authenticity.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3*(1), 73–88. <https://doi.org/10.1037/gpr0000156>
- Stellar, J. E., Gordon, A. M., Piff, P. K., Cording, D., Anderson, C. L., Bai, Y., Maruskin, L. A., & Keltner, D. (2017). Self-transcendent emotions and their social functions: Compassion, gratitude, and awe bind us to others through prosociality. *Emotion Review, 9*(3), 200–207. <https://doi.org/10.1177/1754073916684557>
- Van den Bosch, R., & Taris, T. (2018). Authenticity at work: Its relations with worker motivation and well-being. *Frontiers in Communication, 3*, Article 21. <https://doi.org/10.3389/fcomm.2018.00021>

4. 在整合机制小结部分，对前面两个机制到底从哪些方面解释敬畏的亲社会行为机制，只是变革能力，但又无从体现，还是什么别的方面，对哪些方面还未涉及，需要先做很好的归纳总结，见论文批注。

答：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1) 小我假说主要从注意的层面解释敬畏的亲社会行为机制。

敬畏这种经常由非社会刺激引发的情绪会导致亲社会的结果？普遍的解释是，敬畏使自我变小(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 Shiota et al., 2007; Stellar et al., 2017)。Piff 等人(2015)的小我假说认为，对所看到的东西的浩瀚的感知会导致一个人的自我相对于刺激物是小的感知。因此，敬畏有助于“将注意力转移到更大的实体和减少个人的自我”(Piff et al., 2015, 第 884 页)。根据这一立场，敬畏通过减少对自己导向的关注来促进亲社会性，这反过来使更多的注意力可以用于他人导向的关注(Perlin & Li, 2020)。

(2) 小我假说的不足之一是：无法解释敬畏的变革能力，也就是说敬畏促进成长和转变的过程实际上如何展开？

随着研究深入，研究者发现在回答一些问题时“小我”的解释力存在不足。问题之一在于，敬畏被认为具有变革性(transformative)能力，它让人经历了人生中一个关键时刻，启动了一个改变的过程(Chirico & Yaden, 2018; Keltner & Haidt, 2003; Maslow, 1962; Stellar et al., 2017)。Keltner 和 Haidt(2003)在他们的开创性研究中指出，敬畏可以改变人，重新定位人们的目标和价值观，引发敬畏的事件可能是个人成长和改变最迅速、最有力方法之一。其他定性和理论工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这种情绪为个体提供了反思自己人生并重新评估自我价值的机会(Bonner & Friedman, 2011; Schneider, 2009)。总之，敬畏的体验可能会促使人们开放地探索外部世界并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Danvers & Shiota, 2017; Nelson-Coffey et al., 2019)。简而言之，就是成长。那么这些成长和转变的过程实际上如何展开？这些问题不能被小我机制强调的注意力转移所解释(Perlin & Li, 2020)。换言之，如果自我减弱并感到无足轻重，是什么驱使个体进行反思并发起变革追求呢？研究者认为由敬畏引发的真实自我可能是实现自我转变、个人成长和心理成熟的关键(Jiang & Sedikides, 2022)。

(3) 真我假说如何应对小我假说的不足？即真我假说怎样体现变革能力，怎么解释成长和转变的过程。

对真实自我的追求可能通过自我反思和探索的过程体现成长。关注敬畏与生命意义的研究者推测敬畏会暂时减少生活中的连贯性，并激励人们寻找生命的意义，其中包括了对真实自我的寻求(Danvers, O’Neil, & Shiota, 2016)。Perlin 和 Li(2020)认为对意义和真实自我的寻求实际反映了一种深入的自我探索和自我改变的过程，并进一步认为当人们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探索时，注意力被引向自我的更深层、更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说，对个人感到

有价值和重要的东西的探索。因此，由敬畏激发的真实自我追求可能迫使我们重新探索和评估最深切的个人目标与关键价值，让我们意识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由此实现自我成长与转变。

(4) 其他未涉及的方面：

更广泛地说，敬畏的自我渺小效应在三个方面受到了批评(Perlin & Li, 2020)。首先，自我导向和他人导向的关注并不是互斥的。将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并不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人身上，反之亦然。其次，关注他人不一定会增加有利于他人的动机。第三，与以上的论点类似，小我不能轻易解释敬畏的变革能力。如果可以的话，正如 Tyson 等人(2021)所得出的结论，小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我心理扩张(而非缩小)”(第 1 页)。

已根据专家的意见对真我假说如何具体体现敬畏的变革能力，以及一些其他未涉及的方面加以补充，相应位置在文章中用“粉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p>针对“小我”的上述不足，研究者们提出真我假说来解释敬畏的亲社会效应(Jiang & Sedikides, 2022)。该假说指出，敬畏激发了个体对真实自我的追求，真我会提醒个体，他们的关键价值得到了维护，并激励他们采取相应的行为，如关注他人利益的行为(Schmader & Sedikides, 2018; Sedikides, Lenton, Slabu, & Thomaes, 2019)。真实自我(authentic self)被定义为一个人与真实或真正的自我相一致的感知，即一个人自我是真实或不加修饰的感觉(Sedikides et al., 2019)。敬畏体验有助于促进自我超越，将个体的注意力从日常的平凡琐事转向更大的精神存在(Chirico & Yaden, 2018; Jiang et al., 2018; Yaden et al., 2017)；这提供了一种自我疏离或角色疏离的机会，使个体得以与自己保持心理距离，从而为反思留下空间，最终促进了对真我的追求(Emmerich & Rigotti, 2017; Kross & Ayduk, 2017)。</p> | <p>针对“小我”的上述不足，研究者们提出了真我假说，他们认为由敬畏引发的真实自我可能是实现自我转变、个人成长和心理成熟的关键(Jiang & Sedikides, 2022)。真实自我(authentic self)被定义为一个人与真实或真正的自我相一致的感知，即一个人自我是真实或不加修饰的感觉(Sedikides et al., 2019)。该假说指出，敬畏激发了个体对真实自我的追求，真我会提醒个体，他们的关键价值得到了维护，并激励他们采取相应的行为，如关注他人利益的行为(Schmader & Sedikides, 2018; Sedikides, Lenton, Slabu, & Thomaes, 2019)。具体而言，敬畏体验有助于促进自我超越，将个体的注意力从日常的平凡琐事转向更大的精神存在(Chirico & Yaden, 2018; Jiang et al., 2018; Yaden et al., 2017)；这提供了一种自我疏离或角色疏离的机会，使个体得以与自己保持心理距离，从而为反思留下空间，最终促进了对真我的追求(Emmerich & Rigotti, 2017; Kross & Ayduk, 2017)。对真实自我的追求可能通过自我反思和探索的过程体现成长。一些研究者推测敬畏会激励人们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其中包括了对真实自我的寻求(Danvers, O'Neil, & Shiota, 2016)。Perlin 和 Li(2020)认为这</p> |

| | |
|-----------|---|
| | <p>种对意义和真实自我的寻求实际反映了一种深入的自我探索和改变的过程，并进一步认为当人们进行自我反思和探索时，注意力被引向自我的更深层、更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说，对个人感到有价值 and 重要的东西的探索。因此，由敬畏激发的真实自我追求可能迫使我们重新探索和评估最深刻的个人目标与关键价值，让我们意识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由此实现自我成长与转变。</p> <p>【3.2 的第一段】</p> |
| <p>无。</p> | <p>更广泛地说，敬畏的自我渺小效应在三个方面受到了批评(Perlin & Li, 2020)。首先，自我导向和他人导向的关注并不是互斥的。将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并不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人身上，反之亦然。其次，关注他人不一定会增加有利于他人的动机。第三，与以上的论点类似，小我不能解释敬畏的变革能力。如果可以的话，正如 Tyson 等人(2021)所得出的结论，小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我心理扩张，而非缩小”。</p> <p>【3.1 的第二段】</p> |

参考文献:

- Bakan, D. (1966). *The Duality of Human Existence. An Essay on Psychology and Religion*. Chicago, IL: Rand McNally.
- Bonner, E. T., & Friedman, H. L. (2011). A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awe: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39(3), 222–235. <https://doi.org/10.1080/08873267.2011.593372>
- Chirico, A., & Yaden, D. B. (2018). Awe: A self-transcendent and sometimes transformative emotion. In H. C. Lench (Ed.), *The function of emotions* (pp. 221–233).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Danvers, A. F., O’Neil, M. J., & Shiota, M. N. (2016). The mind of the “happy warrior”: Eudaimonia, awe, and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In J. Vittersø (Ed.), *International handbooks of quality-of-life. Handbook of eudaimonic well-being* (pp. 323–335).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 Danvers, A. F., & Shiota, M. N. (2017). Going off script: Effects of awe on memory for script-typical and -irrelevant narrative detail. *Emotion*, 17(6), 938–952. <https://doi.org/10.1037/emo0000277>
- Maslow, A. H. (1962).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 Nelson-Coffey, S. K., Ruberton, P. M., Chancellor, J., Cornick, J. E., Blascovich, J., & Lyubomirsky, S. (2019). The proximal experience of awe. *PLOS ONE*, 14(5), Article e0216780.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6780>

Jiang, T., & Sedikides, C. (2022). Awe motivates authentic-self pursuit via self-transcendence: Implications for prosoci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3(3), 576–596. <https://doi.org/10.1037/pspi0000381>

Keltner, D., & Haidt, J. (2003). Approaching awe, a moral,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emo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17(2), 297–314.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0302297>

Perlin, J. D., & Li, L. (2020). Why does awe have prosocial effects? New perspectives on awe and the small self.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2), 291–308. <https://doi.org/10.1177/1745691619886006>

Schneider, K. J. (2009). *Awakening to awe: Personal stories of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Jason Aronson.

Stellar, J. E., Gordon, A. M., Piff, P. K., Cording, D., Anderson, C. L., Bai, Y., Maruskin, L. A., & Keltner, D. (2017). Self-transcendent emotions and their social functions: Compassion, gratitude, and awe bind us to others through prosociality. *Emotion Review*, 9(3), 200–207. <https://doi.org/10.1177/1754073916684557>

Tyson, C., Hornsey, M. J., & Barlow, F. K. (2022). What does it mean to feel small?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small self. *Self and Identity*, 21(4), 387–405. <https://doi.org/10.1080/15298868.2021.1921018>

5. 作者从共生和能动角度整合机制，大篇幅论证了共生与小我，能动与真我的关系，积极敬畏通过共生维度小我和能动维度真我促进亲社会行为，消极敬畏共生小我促进亲社会行为，通过能动(作者未提及真我? 为何?)路径减少亲社会行为，也就是说能动维度有不同功能，其底层逻辑是什么，如何解释? 消极敬畏的不同亲社会行为功能是因为不同路径，什么情况下选择哪条路径，能否做进一步说明? 这些是作者用这个角度去整合机制时需要阐释清楚的核心问题。

答：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1) 消极敬畏共生小我促进亲社会行为，通过能动路径减少亲社会行为，也就是说能动维度有不同功能，其底层逻辑是什么，如何解释?

与积极敬畏类似，在共生维度上，消极敬畏将通过小我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增加(Piff et al., 2015); 但不同之处在于，在能动维度上，消极敬畏将导致无力感的增加或效能感的降低(能动的反面)，并因此导致亲社会行为的减少(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et al., 2022)。在能动维度上，消极敬畏与积极敬畏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其底层逻辑在于：基于威胁的敬畏与积极敬畏的区别，这种情绪具有一些独特心理特征。尽管基于威胁的敬畏同时结合了敬畏和恐惧(Chaudhury, Garg, & Jiang, 2022; Gordon et al., 2017)，但这种消极的敬畏体验以威胁性为主要特征，会导致控制和确定性的减少、恐惧和焦虑的感觉增加和交感神经系统的唤醒增加(Gordon et al., 2017)。更重要的是，基于威胁的敬畏形式在引

起无力感方面可能特别有效(Gordon et al., 2017; 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在积极的背景下, 敬畏对自我的影响可能是令人愉快的(Stellar et al., 2016); 但在威胁的背景下, 敬畏对自我的影响是更消极和基于恐惧的, 自我控制感和确定性的降低最终将导致个人觉得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没有什么权力感, 引起无能为力的感觉(Gordon et al., 2017), 即降低了能动取向(Brinol et al., 2007)。

因此, 不同于积极敬畏领域中得到的一致结论, 两种途径导致基于威胁的敬畏对亲社会行为产生了不同的效应: 尽管通过在共生维度上促进小我感, 人们在经历基于威胁的敬畏时希望做出亲社会的行为, 但由于威胁的存在, 行动者同时在能动取向上体验到无力感, 觉得他们缺乏足够的效力来做出改变, 此时他们仍可能不会追求亲社会行为(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et al., 2022)。值得注意的是, 对亲社会性的不一致效应是基于威胁的敬畏所独有的, 而不是积极的敬畏。在积极敬畏的情况下, 因为没有威胁会降低行为者的能动倾向。因此, 无论从自我的能动维度还是共生维度上出发, 他们都被预期应该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性。

总之, 鉴于基于威胁的敬畏与积极形式的敬畏在其评价、情感体验、生理学相关因素和对无力感的影响方面的差异, 消极敬畏将在能动维度上表现出与积极敬畏不同的功能。基于威胁的敬畏和积极的敬畏之间的亲社会效应差异应该部分地被它们在能动维度上的作用差异所解释。

(2) 消极敬畏的不同亲社会行为功能是因为不同路径, 什么情况下选择哪条路径, 能否做进一步说明?

鉴于这种矛盾性的存在, 个体最终的亲社会决定可能取决于他们对相关威胁性感受的关注与应对。比如, 个体所持有的内隐理论可能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 因为内隐理论被认为可以决定个人如何处理与威胁和挑战有关的信息(Dweck & Leggett, 1988; Yeager & Dweck, 2012)。具体而言, 持有增长论的个体认为威胁和挑战代表着成长的机会, 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克服, 在对威胁和挑战的反应中, 他们对自己完成特定任务时的行动效能表现出更积极的判断(Martocchio, 1994)。因此, 当遇到诱发威胁敬畏的刺激物时, 持有增长论(相对于实体论)的行动者更有可能期望他们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更高的效能, 相信他们的行为可以为实现他们的亲社会目标而发挥作用, 这增加了他们在经历基于威胁的敬畏时的亲社会行为(Septianto, Seo, et al., 2022)。

(3) 作者未提及真我？为何？

在这里未提及真我的主要原因在于：据我们所知，目前尚未有研究关注基于威胁的敬畏对真我的影响。

那么这种消极的敬畏变体是否会激励人们的真实自我？鉴于消极敬畏在能动维度上表现出与积极敬畏不同的功能，它可能不会激发真实自我。具体而言，基于威胁的敬畏以威胁性为主要特征，它与积极形式的敬畏在其评价、情感体验、生理学相关因素和对无力感的影响方面都表现出差异(详见上文)，研究者认为消极敬畏将在能动维度上表现出与积极敬畏不同的功能，即降低了个体的能动水平(Septianto, Seo, et al., 2022)。因此真我研究者认为基于威胁的敬畏可能不会唤起真实自我的追求(Jiang & Sedikides, 2022)。此外，威胁敬畏具有的消极效价可能导致它对真我的无效影响。研究者认为典型的敬畏很可能与追求真实的自我有关，或激发了对真实自我的追求(Ihm et al., 2019)。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典型的敬畏是一种以积极效价为主的情绪，而积极的情绪(Heppner et al., 2008; Lenton, Slabu et al., 2013)会产生真实性。此外，典型的敬畏是一种趋近导向的情绪，而趋近动机(Emmerich & Rigotti, 2017; Impett et al., 2013)，包括促进定向(Kim et al., 2019)，会促成真实性。这些假设都建立在敬畏的积极效价之上，基于此，基于威胁的敬畏作为一种带有消极色彩的敬畏可能不会激励人们的真实自我。总之，基于威胁的敬畏被归类为一种消极的、以威胁性为主要特征的情绪，将在能动维度上表现出与积极敬畏不同的功能，即不会促进真实的自我。

已根据专家的意见在正文部分对这些核心问题加以补充，相应位置在文章中用“粉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无。 | 在能动维度上，消极敬畏表现出与积极敬畏不同的功能，核心原因在于：这种消极的敬畏体验以威胁性为主要特征，会导致控制和确定性的减少、恐惧和焦虑的感觉增加和交感神经系统的唤醒增加(Gordon et al., 2017)。那么在威胁的背景下，敬畏对自我的影响是更消极和基于恐惧的，自我控制感和确定性的降低最终引发个体的无能为力感(Gordon et al., 2017)，即降低了个体的能动取向(Brinol et al., 2007)。因此，不同于积极敬畏领域中得到的一致结论，基于威胁的敬畏对亲社会 |

| | |
|----|---|
| | <p>行为产生了不同的效应：一方面，通过在共生维度上促进小我感，人们希望做出亲社会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威胁的存在，行动者同时在能动性取向上体验到无力感，觉得缺乏足够的效力来做出改变，进而抑制了亲社会行为的产生(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et al., 2022)。</p> <p>【3.3的最后一段】</p> |
| 无。 | <p>鉴于这种矛盾性的存在，消极敬畏的亲社会效应取决于个体对威胁性感受的关注与应对。例如，持有增长论的个体认为威胁和挑战代表着成长的机会，在对威胁和挑战的反应中，他们对自己完成特定任务时的行动效能表现出更积极的判断(Martocchio, 1994)。因此，当遇到诱发威胁敬畏的刺激物时，持有增长论(相对于实体论)的行动者更有可能期望他们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更高的效能，这增加了他们在经历基于威胁的敬畏时的亲社会行为(Septianto, Seo, et al., 2022)。</p> <p>【3.3的最后一段】</p> |

参考文献：

- Briñol, P., Petty, R. E., Valle, C., Rucker, D. D., & Becerra, A. (2007). The effects of message recipients' power before and after persuasion: A self-valida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6), 1040–1053.
- Bullard, O., Penner, S., & Main, K. J. (2019). Can implicit theory influence construal level.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9(4), 662–670.
- Chaudhury, S. H., Garg, N., & Jiang, Z. X. (2022). The curious case of threat-awe: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conceptualization. *Emotion*, 22(7), 1653–1669.
- Dweck, C. S., & Leggett, E. L. (1988). A social-cognitive approach to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95(2), 256–273.
- Emmerich, A. I., & Rigotti, T. (2017). Reciprocal relations between work-related authenticity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work ability and depressivity: A two-wave stud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Article 307.
- Gordon, A. M., Stellar, J. E., Anderson, C. L., McNeil, G. D., Loew, D., & Keltner, D. (2017). The dark side of the sublime: Distinguishing a threat-based variant of aw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2), 310–328.
- Heppner, W. L., Kernis, M. H., Nezlek, J. B., Foster, J., Lakey, C. E., & Goldman, B. M. (2008). Within-person relationships among daily self-esteem, need satisfaction, and authenticity.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11), 1140–1145.
- Hong, J. & Lee, A.Y. (2010). Feeling mixed but not tor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nstrual level in mixed emotions appeal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7(3), 456-472.
- Ihm, E. D., Paloutzian, R. F., van Elk, M., & Schooler, J. W. (2019). Awe as a meaning-making emotion: On the evolution of awe and the origin of religions. In J. R. Feierman & L. Oviedo (Eds.), *The evolution of religion, religiosity and theology* (pp. 138–153). Routledge.

- Impett, E. A., Javam, L., Le, B. M., Asyabi-Eshghi, B., & Kogan, A. (2013). The joys of genuine giving: Approach and avoidance sacrifice motivation and authenticity.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4), 740–754.
- Jiang, T., & Sedikides, C. (2022). Awe motivates authentic-self pursuit via self-transcendence: Implications for prosoci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3(3), 576–596.
- Kim, J., Chen, K., Davis, W. E., Hicks, J. A., & Schlegel, R. J. (2019). Approaching the true self: Promotion focus predicts the experience of authenticit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78, 165–176.
- Labroo, A. A. & Patrick, V. M. (2008). Psychological distancing: why happiness helps you see the big pictur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5(5), 800-809.
- Lenton, A. P., Slabu, L., Sedikides, C., & Power, K. (2013). I feel good, therefore I am real: Testing the causal influence of mood on state authenticity. *Cognition and Emotion*, 27(7), 1202–1224.
- Martocchio, J. J. (1994). Effects of conceptions of ability on anxiety, self-efficacy, and learning in training.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9(6), 819–825.
- Piff, P. K., Dietze, P., Feinberg, M., Stancato, D. M., & Keltner, D. (2015). Awe, the small self,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6), 883–899.
- Septianto, F. & Lee, M. S. (2019). Emotional responses to plastic waste: matching image and message framing in encouraging consumers to reduce plastic consumption. *Australasian Marketing Journal*, 28(1), 18-29.
- Septianto, F., Nasution, R. A., Arnita, D., & Seo, Y. (2022). The role of threat-based awe and construal level in charitable advertising.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56(5), 1532–1555.
- Septianto, F., Seo, Y., & Paramita, W. (2021). The role of implicit theories in motivating donations in response to threat-based awe.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 41(1), 72–88.
- Trope, Y. & Liberman, N. (2010). Construal-level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117(2), 440-463.
- Williams, L. E., Stein, R. & Galguera, L. (2014). The distinct affective consequences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construal level.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0(6), 1123-1138.
- Yeager, D. S. & Dweck, C. S. (2012). Mindsets that promote resilience: When students believe that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can be developed.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47(4), 302–314.

6. 参考文献格式不规范，有些有 doi，有些没有。

答：感谢审稿专家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已经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对参考文献的 doi 加以补充，相应位置用“粉色”予以了标注。

7. 对批注的回答：

(1) “小我假说和真我假说分别从自我的不同方面对于敬畏促进亲社会效应的心理机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批注内容：对前面总结可以更为细致，小我和真我到底分别解释的敬畏的亲社会行为哪些不同方面，只是变革性？变革性未在文中体现，还是其他方面？其实还有消极敬畏减少亲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未提及。

答：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首先，小我和真我到底分别解释的敬畏的亲社会行为哪些不同方面？需要更加细致的总结。

已根据专家的意见补充了更细致的总结，相应位置在文章中用“粉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小我假说和真我假说分别从自我的不同方面对于敬畏促进亲社会效应的心理机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 小我假说和真我假说分别从自我注意和自我成长的角度对敬畏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3.3 的第一段】 |

其次，消极敬畏减少亲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未提及。

已根据专家的意见补充了消极敬畏减少亲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相应位置在文章中用“粉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无。 | 为什么基于威胁的敬畏会对亲社会性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效应？“大二”框架同样有助于理解背后的机制。与积极的敬畏类似，在共生维度上，消极敬畏将通过小我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增加(Piff et al., 2015)。具体来说，威胁的敬畏同样由一个被评价为巨大的刺激物诱发(Shiota et al., 2007)，它被认为可以促进小我感，提高对他人的关注(Piff et al., 2015)，这将导致更高的亲社会性。然而，与积极敬畏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能动维度上，基于威胁的消极敬畏将导致无力感的增加或效能感的降低(能动的反面)，并因此导致亲社会行为的减少(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et al., 2022)。具体而言，当试图适应一个巨大的、有威胁的刺激时，基于威胁的敬畏会伴随着恐惧感(Gordon et al., 2017)。恐惧与较低的控制感有关(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这种感觉导致了无力感的增强(Gordon et al., 2017; Septianto et al., 2021)，降低了个人对其行动效能的感知(Brinol et al., 2007)。如果人们觉得他们缺乏足够的效能来改变现状(即他们不相信他们采取的措施可以有效地促进帮助)，他们可能不会追求亲社会行为(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et |

| | |
|--|---|
| | <p>al., 2022)。因此，高水平的威胁敬畏导致个体产生无力感，进而减少亲社会行为。</p> <p>【3.3 的倒数第二段】</p> |
|--|---|

参考文献:

- Briñol, P., Petty, R. E., Valle, C., Rucker, D. D., & Becerra, A. (2007). The effects of message recipients' power before and after persuasion: A self-valida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6), 1040–1053.
- Chaudhury, S. H., Garg, N., & Jiang, Z. X. (2022). The curious case of threat-awe: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conceptualization. *Emotion*, 22(7), 1653–1669.
- Gordon, A. M., Stellar, J. E., Anderson, C. L., McNeil, G. D., Loew, D., & Keltner, D. (2017). The dark side of the sublime: Distinguishing a threat-based variant of aw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2), 310–328.
- Keltner, D., Gruenfeld, D. H., & Anderson, C. (2003). Power,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2), 265–284.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10.2.265>
- Piff, P. K., Dietze, P., Feinberg, M., Stancato, D. M., & Keltner, D. (2015). Awe, the small self,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6), 883–899.
- Seo, M. J., Yang, S. Y., & Laurent, S. M. (2022). No one is an island: Awe encourages global citizenship identification. *Emotion*.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37/emo0001160>
- Septianto, F., Nasution, R. A., Arnita, D., & Seo, Y. (2022). The role of threat-based awe and construal level in charitable advertising.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56(5), 1532–1555.
- Septianto, F., Seo, Y., & Paramita, W. (2021). The role of implicit theories in motivating donations in response to threat-based awe.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 41(1), 72–88.
- Shiota, M. N., Keltner, D., & Mossman, A. (2007). The nature of awe: Elicitors, appraisals, and effects on self-concept. *Cognition and Emotion*, 21(5), 944–963.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0600923668>
- Wang, M., Qu, X., Guo, C., & Wang, J. (2022). Awe elicited by natural disasters and willingness to help people in afflicted areas: A meditational model. *Current Psycholog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22-03227-3>

(2) “那么，在敬畏促进亲社会性的过程中，到底是小我起作用还是真我起作用？二者是什么关系？”

批注内容：这句话前面都有答案，小我和真我都起作用，重点是两者什么关系，如并列中介，同时起作用，还是链式中介，哪个先哪个后？

答：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已根据专家的意见删去多余的文字并补充二者的关系，相应位置在文章中用“粉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p>小我假说和真我假说分别从自我的不同方面对于敬畏的亲社会效应的心理机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那么，在敬畏促进亲社会性的过程中，到底是小我起作用还是真我起作用？二者是什么关系？在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的基础上，研究者认为当前的假说可以在“大二”框架下进行完善与整合(Stell, 2018)。</p> | <p>小我假说和真我假说分别从自我注意和自我成长的角度对敬畏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那么，在敬畏促进亲社会性的过程中二者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在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的基础上，研究者认为当前的假说可以在“大二”框架下进行完善与整合(Stell, 2018)。基于“大二”框架，敬畏将通过小我与真我的平行中介同时在自我的不同维度上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p> <p>【3.3 的第一段】</p> |

第五轮

审稿人 3 意见：

作者对核心问题做了较为细致的修改和完善，对部分核心问题也进行了重新分析和整合。建议需改以下几个小地方。

1. 摘要需要融入整合部分的内容，未能充分体现本论文价值，注意中英文翻译。

专家批注的内容：

(1)摘要部分没有将整合的那部分内容放进来，大二视角。未能充分体现本论文的价值；

(2)“未来需要进一步考察敬畏的亲社会效应的普遍性、探索其边界条件、在理论和实证的层面对小我假说和真我假说加以完善并针对敬畏本身及其心理机制开发出更多的促进捐赠等亲社会行为的干预措施，以期第三次分配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心理学方案。”这句话分段，过长。

答：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已根据专家的意见在摘要中补充了整合机制相关内容以充分体现本文的价值并将过长的句子进行修改，同时对英文摘要做出相应的修改，相应位置在文章中用“紫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摘要 | 修改后的摘要 |
|--|---|
| <p>敬畏是一种对浩瀚的刺激以及现有心理结构无法适应的刺激的的情感反应。尽管敬畏常常由非社会性的刺激所引发，但它却具有深刻的社会效应。大量实证证据显示，敬畏可以促进各种形式的亲社会行为。小我假说认为，诱发敬畏体验的浩瀚刺激会导致自我的渺小感，推动个体的注意力从自我转移至他人，进而促进了亲社会行为；真我假说则认为，敬畏有助于促进个体的注意力从日常的世俗关注向更大的精神存在转移，这激发了个体对真我的追求，进而促进了造福他人和社会的亲社会行为。小我与真我属于自我的不同维度，敬畏将通过小我与真我的平行中介同时在自我的不同维度上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未来需要进一步考察敬畏的亲社会效应的普遍性、探索其边界条件、在理论和实证的层面对小我假说和真我假说加以完善并针对敬畏本身及其心理机制开发出更多的促进捐赠等亲社会行为的干预措施，以期为第三次分配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心理学方案。</p> | <p>敬畏是一种对浩瀚的刺激以及现有心理结构无法适应的刺激的的情感反应。大量实证证据显示，敬畏可以促进各种形式的亲社会行为。至于其中的心理机制，小我假说认为，诱发敬畏体验的浩瀚刺激会导致自我的渺小感，推动个体的注意力从自我转移至他人，进而促进了亲社会行为；真我假说则认为，敬畏有助于促进个体的注意力从日常的世俗关注向更大的精神存在转移，激发了个体对其真实自我的追求，进而促进了亲社会行为。小我与真我假说可以在“大二”框架下进行整合，即敬畏在自我的能动维度(真我)和共生维度(小我)上通过两条平行的路径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未来研究需要更深入地探讨敬畏的亲社会效应的心理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促进捐赠等亲社会行为的干预措施，以期为第三次分配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心理学方案。</p> <p>【中文摘要】</p> |
| <p>Awe is an emotional response to vast stimuli that expand the current frames of reference and require a new schema to accommodate. Although awe is often triggered by nonsocial stimuli, it has profound social effects. A large body of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awe can promote various forms of prosocial behavior. The small-self hypothesis suggests that the vastness of stimuli that induce awe leads to a sense of self-diminishment, driving the shift of an individual's attention from the self to others, which in turn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 The authentic-self hypothesis suggests that awe promotes a shift in the individual's attention from everyday mundane concerns to a larger spiritual existence, inspiring the individual to pursue his or her authentic self, which in turn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 that benefits others and the collective. The small self and the authentic self are situated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he self, and awe ultimately</p> | <p>Awe is an emotional response to vast stimuli that challenge the current frames of reference and require a new schema to accommodate. A large body of empirical studies have highlighted that awe engenders various forms of prosocial behavior. Regarding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implicated, the small-self hypothesis posits that the vastness of stimuli that evokes awe elicits feelings of self-smallness, which diverts the individual's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self and towards others, thus promoting prosocial behavior; the authentic-self hypothesis suggests that awe helps to facilitate a shift in the individual's attention from regular mundane concerns to a larger spiritual presence, which stimulates the individual's pursuit of his or her authentic self, thus promoting prosocial behavior. These research hypotheses can be integrated within the 'Big Two' framework, which suggests that awe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 through two parallel paths in the dimension of agency (authentic self) and communion (small self). Future</p> |

| | |
|--|---|
| <p>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self through parallel mediation model of the small self and authentic self. In the future, researchers nee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generality of the prosocial effects of awe, explore its boundary conditions, refine the existing small-self and authentic-self hypotheses at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evels, and develop more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prosocial behaviors such as donations with respect to awe itself and it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in order to provide psychological solutions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strategy.</p> | <p>research need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prosocial effects of awe and, on this basis, develop efficacious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prosocial behavior, such as dona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psychological strategies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strategy.</p> <p>【英文摘要】</p> |
|--|---|

2. 通读全文，注意语句的流畅性，见审改稿批注。

答：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

已根据专家的意见对本文中不通顺和不恰当的语句加以修改，相应位置在文章中用“紫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p>然而，也少数研究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Joye & Bolderdijk , 2015; Rudd et al., 2012)。</p> | <p>然而，也有少数研究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Joye & Bolderdijk , 2015; Rudd et al., 2012)。</p> <p>【2的第二段】</p> |
| <p>总之，如上述研究(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所表明的那样，我们认为小我是一种由比自我更浩瀚的刺激物的感知所导致的，自我渺小、减弱且无足轻重的感觉(Tyson et al., 2022)。实证证据也初步证实了小我感在敬畏的亲社会效应中起到了中介的作用。</p> | <p>总之，如上述研究(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所表明的那样，小我是一种由比自我更浩瀚的刺激物的感知所导致的，自我渺小、减弱且无足轻重的感觉(Tyson et al., 2022)。实证证据也初步证实了小我感在敬畏的亲社会效应中起到了中介的作用。</p> <p>(删去了“我们认为”)</p> <p>【3.1的第一段】</p> |
| <p>基于进化的视角，能动和共生抓住了人类生活中所面临的两个核心挑战：属于社会群体和追求个人目标(Azoulay, Wilner-Sakal, Tzabag, & Gilboa-Schechtman, 2022; Bakan, 1966; Hogan, 1982)。</p> | <p>基于进化的视角，能动和共生抓住了人类生活中所面临的两个核心挑战：追求个人目标和属于社会群体(Azoulay, Wilner-Sakal, Tzabag, & Gilboa-Schechtman, 2022; Bakan, 1966; Hogan, 1982)。</p> <p>【3.3的第二段】</p> |
| <p>此外，当个体得以成为他真正的自我，感到自</p> | <p>此外，当个体得以成为他真正的自我，感到自己</p> |

| | |
|---|--|
| <p>己是的活动和感知的创造性中心，就更有自我决定权，更具能动性，比其他时候更具有“自由意志”(Maslow, 1962)。</p> | <p>是活动和感知的创造性中心，就更有自我决定权，更具能动性，比其他时候更具有“自由意志”(Maslow, 1962)。</p> <p>(删去了多余的“的”)</p> <p>【3.3的第四段】</p> |
| <p>对外部压力的遵从往往被认为与真实性相反。</p> | <p>对外部压力的遵从往往被认为与真实性相反(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p> <p>【3.3的第四段】</p> |
| <p>在能动维度上，消极敬畏表现出与积极敬畏不同的功能，核心原因在于：这种消极的敬畏体验以威胁性为主要特征，会导致控制和确定性的减少、恐惧和焦虑的感觉增加和交感神经系统的唤醒(Gordon et al., 2017)。</p> | <p>在能动维度上，消极敬畏表现出与积极敬畏不同的功能，核心原因在于：这种消极的敬畏体验以威胁性为主要特征，会导致控制感和确定性的减少、恐惧和焦虑的感觉增加和交感神经系统的唤醒(Gordon et al., 2017)。</p> <p>【3.3的最后一段】</p> |
| <p>小我与真我属于自我的不同维度，敬畏将通过小我与真我的平行中介同时在自我的不同维度上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p> | <p>小我与真我假说可以在“大二”框架下整合，即敬畏在自我的能动维度(真我)和共生维度(小我)上通过两条平行的路径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p> <p>【4的第一段】</p> |

3. 请核实，根据杂志要求修改格式。

专家批注的内容：两个括号并列，请核实，参考杂志文献格式。

答：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稿和宝贵意见。已根据专家的意见对两个并列的括号进行修改，相应位置在文章中用“紫色”予以了标注。

| 修改前的内容 | 修改后的内容 |
|---|--|
| <p>简而言之，敬畏产生于一种由比自我或自我的已有认知参照框架大得多的刺激所引起的感觉(即浩瀚感)，而这种感觉需要新的心理表征来理解(即顺应的需要)(赵小红 等, 2021; Keltner & Haidt, 2003; Monroy & Keltner, 2022; Weger & Wagemann, 2021)。</p> | <p>简而言之，敬畏产生于一种由比自我或自我的已有认知参照框架大得多的刺激所引起的感觉，即浩瀚感；而这种感觉需要新的心理表征来理解，即顺应的需要(赵小红 等, 2021; Keltner & Haidt, 2003; Monroy & Keltner, 2022; Weger & Wagemann, 2021)。</p> <p>【1的第一段】</p> |

第六轮

编委 1 意见：

本文我看过了，我觉得修改可以，可以送交主编终审

编委 2 意见：

我同意发表这篇文章

主编意见：

第三次分配方案在第一次提到有点突兀，请加过渡句子。

修后发表